

國 際 叢 書

劉 炳 藜 趙 演 編 譯

蘇
俄
經
濟
生
活

華 書 局 印 行

國
際
蘇
俄
經
濟
生
活

劉炳
藜
編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1933

譯序

一二八戰爭把我由滬西與開北之間的靜僻的鄉村趕到繁囂的上海市中來了。在損失了數年來由教書和撰述所得的所有的書籍和什物之後，我只得把一切負擔暫時撇開，獨自靜居到一個狹小的樓房中；由此常常跑到距離所不甚遠的關稅圖書館中去參閱最近出版的關於經濟與政治的重要著述。在那裏閱讀了十幾冊經濟巨著之後，發現了柯爾文·胡佛 (Colvin B. Hoover) 所著的蘇俄經濟生活 (The Economic Life of Soviet Russia)。這書共有十三章，近二十萬言，係一九三一年出版。著者係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會員，這書就是他親自跑到俄國考察其經濟生活後的報告。當時為興趣和饑餓所驅迫，使我不能不暫時停止政治經濟巨著的閱讀，而開始翻譯此書藉作糊口之計。原書二十萬言，可是書局的意思，是希望把他減縮成十萬言的中文。我便在這個預定之下開始工作。

剛剛寫到興味正濃的時候，因為滬戰的停止，便有許多學校開始授課，我又被邀為原學校的講師；又因種種瑣事，使我不能不把譯書工作暫時擱置。一擱便擱了幾個月。暑期在

京中遇到舊友趙涵川（演）先生，便爲述及我譯這書的經過，他允爲我完成，所以這書終於由兩人寫成了。——我所譯的是第二、三、五、六、七各章，以及第八章的一部份（至第一章雖然譯下了却掉了草稿），其餘都由涵川着筆，並且由他總校閱一次，我在此特別感謝他！

在趙先生譯述的中間，又因爲他夫人的病以及其他著述工作的繁忙，以致一再耽擱，經過好幾個月始克完成。待稿子交到中華書局的時候，已近一九三二年年末了。後來又因爲字句的商酌耽擱了不少時候，直到今日才得與世相見，這在我要算是放下了一付重担！因爲有字數的限制，所以原書中不甚重要的地方略去了不少，甚至統計表也刪去了一些。但是無論怎樣刪削，結果還有十三萬言。譯本字數雖然減少，但於原書並無損傷，不過譯文側重意譯，故字句之間不免略有出入處，這是應該特別聲明的。

在這動盪的偉大的時代，國人對於國外情勢，尤其對於蘇俄的經濟生活，曾特別加以注意；本書的出版，於增加國人的對外情勢，尤其對蘇俄的經濟生活的了解，或者不無相當裨益罷。譯畢，因綴數言以爲序。

一九三三，二，五，劉炳藜於上海。

蘇俄經濟生活目錄

譯序

第一章	蘇聯經濟的一般特徵	一
第二章	工業的組織	一四
第三章	生產力與投資	四六
第四章	農業	七二
第五章	國內貿易	一二六
第一節	緒論	一二六
第二節	批發貿易	一三七
第三節	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之規定	一四三
第四節	私人貿易	一四六

第六章	國外貿易	一五三
第七章	銀行制度	一七〇
第一節	國家銀行	一七〇
第二節	工電長期信用銀行	一八八
第三節	全俄合作銀行	一九一
第四節	農業信用放款制度	一九三
第五節	N. S. S. H. 的市立信用放款制度	一九七
第六節	國外貿易銀行	二〇一
第七節	儲蓄銀行	二〇二
第八節	私人銀行	二〇二
第八章	貨幣	二〇三
第九章	合作制度	二二四

第一節	緒言	二二四
第二節	生產合作社	二三一
第三節	農業合作制度	二三八
第十章	勞動	二四三
第十一章	社會保險	二七五
第一節	緒言	二七五
第二節	疾病保險	二七七
第三節	醫藥治療	二七八
第四節	保險	二七九
第五節	生產優待	二八一
第六節	喪葬費	二八三
第七節	失業保險	二八三

第八節 年老保險·····	二八七
第十二章 計劃經濟·····	二八九
第十三章 俄國共產主義與人類幸福·····	三二三

蘇俄經濟生活

第一章 蘇聯經濟的一般特徵

蘇聯的經濟制度，不單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變相，不單對於經濟上資本主義的操縱者加以嚴格的限制。蘇聯經濟制度乃是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牠的偉大和重要，超乎歷來的一切經濟制度。在這一點上，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英國工黨所理想的那種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工黨固然相信社會主義，最後終可打倒資本主義，但他們的黨，若在議會中得了權柄之後，是否真就想或者真就能破壞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代以一種根本不同的制度，很是疑問。然而共產黨在俄國，却已實現其使命。

在蘇俄，私有的財產，除了極私人的用品外，已不復存在為一種社會制度。衣服，傢具，書籍，家用雜物以及蘇維埃政府的公債，雖然仍可為財產權之目的物。但是這種個人的財產



權，也不是絕對的。例如，富農和私商所有的這類財產，也可以不經合法的手續，而被政府取去。蘇維埃經濟制度，已能使不論任何人，無法在蘇俄集蓄一點小財產；據遺產法的規定，縱令個人可以得到較多的財產，也不能遺傳與子孫。

在工業界，在商業界，現在乃至於農業界，一切財產的私有和活動，已經完全消滅，或者，也正在破壞的途上。在蘇聯，利潤、利息以及租金的私相授受，已逐漸縮減，差不多到了消滅的程度。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後，雖有少數人得建築房屋出租，但房租和利息，已不復是一種重要的經濟範疇。到現在，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已經消滅，所以利潤的私相授受，已不復存在。『剝削階級者』(exploiting classes)以及投機家之類，他們的財源本來全靠上述的這種利潤，現在已完全被政府所奪取。現在工人們應該得到他們勞動的充分報償。照共產黨的理論，『剩餘價值』已不復存在，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已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興了。

但是，假若私人利潤消滅了的話，工業又怎樣地推進呢？那種引誘人生產的利潤，又用什麼來代替呢？第一點我們應該知道在蘇聯，普通工人的生產動機，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

的生產動機並無大異。我們若說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生產所以較為有效是因為他們是爲自己而工作，而非爲政府工作，這自然是笑話。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爲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或蘇聯中，大多數工人，都只是些僱傭勞動者。可是講到工業的領袖來，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此，此地就有一個問題發生，卽是，要如何才能得到有才能的管理者呢？要拿什麼東西，才能够引誘這些人員，極力的有効地去管理他們的工業呢？是不是以社會服務的動機，代替自私自利的動機，已經可能了嗎？

我們在此，描述一下蘇俄工業上管理者們的地位，是頗爲有趣的，這不單只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重要，而且也因爲這可以反映出蘇聯整個的經濟及社會制度的一些顯著特徵來。

最先，我們應該明白的，是蘇俄工業的整個觀點和資本主義工業的觀點，根本不同。當軍事共產主義的初期，工業被共產黨拿到手裏來行的時候，生產費用與生產之間的關係，曾起極大的混亂。當時有些人的意見，以爲生產不是爲市場而生產，單是爲生產物品而生

產，於是，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計較生產費用的觀點，便可完全置之不顧了。但是，自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這種意見便完全改變。貨幣的使用，大部分已經恢復，工業也重復為市場而生產，計較生產費用的觀點，重又漸漸恢復過來。可是，不論是在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或是廢除新經濟政策的現在，利潤的獲取，終歸不是蘇維埃工業的第一目的。蘇維埃的工業，雖希望有利潤的獲得，但這種利潤，終歸不是生產的根本目的。蘇俄工業的管理者，非常知道：假若他採用了較有效的方法及種種節省方法，因而增加了他所管工業的利潤，則這些利潤，政府必用二種方法使其減少：或者減低生產品的賣價，或者抬高工人的工資。這兩件事情，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相當範圍內，也是這樣辦法。因為節省和方法改進的結果，當然可以使價格降低，工資增加。而在蘇聯，不單靠自然而然地，逐漸達到這個目的，並且還用積極的方法，期其實現。更進一步，工廠的經理，也很知道，他這個工業所獲得的利潤，也許會被政府提去，轉給之於託辣斯中的其他工廠，或用之於全不同的工業上。總之，無論如何，他不能憑其股東的資格，來分取利潤。工業上負責的經理，也許是一個共產黨，但即使他不是，他

也知道他在工業管理上的成功，是用利潤以外的他種標準來評量。因為他所實施的計劃，其中除了利潤而外，尚有其他許多項目。政府叫他來管理這一工廠的時候，預限他的生產，在一定時間內，有一定的分量，有一定的品質。若果他生產的分量，適合預限，或者超過。他生產的時間，適合規定的時間，或者在更短期間。又品質方面，或者適合規定的標準，或者更爲優良，這種種因素，在評定他的管理的成績上，實較利潤的多少，更爲重要。除此以外，勞働環境改進的程度，也是測量工業管理成績的一個標準。其中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績評量法，却很近似資本主義的方法。即是減少生產費用，也是蘇俄的最大願望。生產費的減少，自然是資本主義者增加利潤的一種方法。但是，蘇俄管理工業的人，並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用以減少生產費的一切方法都拿來應用。第一點工資是不能減少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時間工資（即以時計算者）更不能減少。反而非增加不可——至少每年都要增加一點。他也可以像資本主義者一樣，當勞工的生產力增加時，可以把件工的工資減少，但採用這種方法的限制，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更爲嚴厲。可是，蘇俄督促工人增加速力的辦

法，雖也許沒有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有效果，但是却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的用力。

物品買賣的價值，本是決定資本主義專業利潤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蘇俄的工業管理者，並不留意於此。他們並不必關心於買賤賣貴。他們完全沒有買賣的問題。因為他努力從事於生產，還來不及應付哩！

蘇聯工業管理者，努力生產的動機，是非常強烈。因為若有成績，報酬很大，但若失敗，責罰亦極嚴厲。大多數負責的管理者，現在都是黨員。因而管理成功即是可昇擢，昇擢即可握權力。權力的欲望，在典型的共產黨員胸中，是熊熊地燃燒着。資本主義世界的精力，用於求財富，求社會地位，求生活的舒適，而在蘇俄，則用於求權力。

蘇維埃工業管理者的責任，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者一樣重大，假若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則他的威權，也是一樣重大。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昇擢的機會，較諸資本主義國家，是無限的大。舊日遺留下來的少數小資產階級管理者，現在已很快地被淘汰了。偉大的資本建設和工業擴張的計劃刻又在進行中。新近農業的集團化，更需要無數服務的人員。舊時服

務的階級，又早已被排斥了。地主，小資產階級，新興農業資產階級，舊知識階級，都被放逐了，被排擠了，或殺戮了。因此，具有才能的人，只要他是一個黨員，其獲得極力的機會，真是無限。

● 蘇維埃工業管理者的前程，並不全靠他能否履行其生產的計劃而定。他自己很知道，只要他是一個活動的黨員，並常常保持着正統的共產信仰，那麼，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政府沒有不用他的。若果他在這一種工業上，沒有成績，政府就調他到別一種工作去。他的活動力以及他對於共產的正統信仰，便是他忠實的證據，所以，即使他在生產上沒有成績，也不會因此而實際受責罰。假若他在管理工廠以前，是做同業公會的工作，那麼，管理工業，沒有成績時，他仍可回去做原來的工作，或者去做一種政治工作，不必要管理工廠的那種能力的。再者，一般黨員兼任工業管理者，也和其他在高位的黨員一樣，大部分的時間，是用來做黨務工作。

除開這種純粹的黨務工作而外，他還要用大多部分的精力，和他自己工廠的工人，和託辣斯全體工人的代表，和託辣斯及辛的嘉的管理者，和縣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和他自己

工廠內糾察隊的隊員，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人員，舉行無窮無盡的委員會。尤其是現在的時期，已由工人的直接管理，轉變為單獨負責管理的制度，這類委員會，更無從減少。因為，工廠管理的實權，既由工人手中奪去，則至少要把工人管理的一切外表特徵，暫時保持着，方能使工人不生反感。所以每一個工廠，每一個辦事室，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組織，都附設得有一個委員會。會議室照例有一張鋪着紅桌布的檯子，檯子上照例有水瓶和杯子。看到這種景象，使人想起他們在無數會議上所浪費的精力和時間，真叫人不堪再視。這種情形，將來也許可望改正。若管理者或專門人員，都變成爲黨員，或者，至少受過黨的訓練，那麼，這種以爲工人們，非藉外觀的虛飾，來緩和他們感情不可的心理，會逐漸減縮。而這種無謂的會議，也就可以省去一大部分了。在現在看起來，這種狀況，實是妨礙工業效率的一重要因子。

行政人員和工人工作時間的浪費，對於生產乃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像這些委員會，空費行政人員的精力，且發生以談話即工作的傾向，這對於蘇維埃工業的進步，實是一個極大的障礙。

管理工業有成績的時候，管理者所得的報酬，並不單是權力欲望的滿足而已。假若一個託辣斯有了利潤，則管理者就可得利潤百分之一的又四分之一。反之，假若管理者是一個黨員，他的薪水，就每月只得二百二十五盧布。可是最重要的報酬，並不在金錢，而是在得到一個行政的地位。

工業管理者使生產效率增高之後，所得的物質報酬，是一部汽車，並附以一個開車的汽車夫，聽他自由使用。其次，他有最優先的機會，去選擇最好的住宅。所謂最好的住宅，並不是豪華奢侈的東西。只不過為那管理者，保持工作效率上，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東西而已。可是在蘇俄這種國家，住宅的質與量都受非常的限制時，能夠選擇到這種住宅，也就是極重大的一件事了。再其次，他又到各處去參加會議，都可以由政府出旅行費。在他的這一部門之內，他可以得到別人所不能得到的機會，求自己的進步，如訂閱專門雜誌之類。甚至可用公費，由政府派遣到資本主義國家，研究生產的方法。

假若他本人或家屬有病的時候，他可以得到政府較優先的待遇。也可以到別處去消

遣假期的時候，可以得到優良的住居。假若他爲業務的關係，可以住在大城市中，如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等地，他還可以加入一種「商業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往往都是設在從前富商的公館內，會員只限於蘇維埃的工業管理者和工程師。

這一切物質的利益，總計起來，當然不算什麼。若和資本主義國家這類人員所得的比較起來，自是輕微之極。不過，他們這些人，從前都是無產階級者，大半生都在窮苦中過日子，所以，一旦得此優待，當然覺得很好了。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却，這些物質的利益，確比一般民衆所得的好，而且在目前環境之下，那算是最大限度的利益。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相對的報酬，重要於絕對的報酬。更進一步，黨員管理者的薪水上的限制，並不如我們所設想那樣，是一種大障礙。蘇俄，現在已實行比例分配的辦法，因而金錢已大減其重要性。例如，同業公會的會員，可以得到半價的戲票；一個人若登記爲工人，他分配所得的麵包和肉，可以有雙倍。合作商店開設在工廠附近，工廠的工人即爲該商店的會員。所得食物，普通都比供給辦事員及一般公衆的爲好。工業行

政人員若有成績，都可以得到工人所有的這些利益。總之，不論他的薪水或工資如何受限制，他物質的報酬，在蘇維埃的土地上，算是再好沒有的了。

在此，難免發生一個大疑問。就是，行政的人員，是否不會有一種詐取的機會，以得到更高的行政位置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不。在蘇俄詐取的機會，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少得多。防止詐取的方法，無論未然的防止，和已然的責罰，都是非常嚴格。每一個工廠或託辣斯中，其資金使用及財政計算的管理權，完全操在另一個官員手中。這個官員，不但對託辣斯或工廠的管理者負責，且對國家負責。而且他根本的責任，是對國家。再則，作業的成績，不但報告到一個有限的團體，也報告到黨，報告到同業公會，報告到國家的經濟會計機關。

蘇聯防止欺騙，採取極刑。欺騙一經判定，結果一定是長期監禁，甚至槍斃。審判手續每較資本主義國家為短，而處罰也比較確定得多。在蘇俄法庭上，並無所謂繁文縟節和瑣碎的法律。一個人若想請高價的律師，曲解法文來隱蔽他自己的罪惡，是無效的事。因為法律

並不是法庭的主人。——老實說，在蘇俄法庭上，法律是不重要的。再則，工廠或託辣斯的管理者，都要受政府或黨部定期的檢閱。若有不道德的地方，任何人都可告發。所以俄國的道德程度，雖然極低，但因為整個的組織完密，所以關於經濟事業，若有偷竊詐騙的行爲，便是非常危險。再則，一個人若有不道德的行爲，他人可以有無限的機會向政治警察（G P U）告發，反之，假若對國家很忠實，却可以受嚴密的保護。除了最輕微的騙取而外，我們從沒聽說有人對國家施行過剝奪手段。俄國人民固然常互相自由偷竊，但向國家騙取，則是一種非常危險的事情，沒有人敢於嘗試。

因為爲防止騙取之故，設立了一種很嚴密的機關，結果增加了無數的官吏和繁重的手續，間接亦使蘇維埃經濟的負擔加重。

以利益相號召，而促進生產的効率，這在蘇俄的經濟制度裏，已是沒有的了。可是另一方面，蘇聯的經濟制度，也不唱『社會服務』的高調，來相勸勉。共產黨人決不會這麼肉麻，決不至這麼傷感主義。共產黨和理想主義者、改良論者、自由主義者或『空談的社會主義

者』這類人，並不相同。他對於這類人輕視之深，正如他對於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忿恨之深一樣。共產主義的精髓，本來就是無情的、硬心的。俄國現在的政局，不單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也不單是共產黨的專政；同時也是共產黨對斯大林派的專政。其統治，係建立在武力及訓練之上，這不僅政治如此，即經濟的組織亦無不如是。經濟組織上的訓練，固然不會發展到類似於政治組織所特有的那樣完全。但武力一因素，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一樣。

我們應該了解，共產黨之支配工業，不僅因為它支配了蘇維埃政府和工會，直接也因它自己的組織。蘇維埃工廠的管理者，若證明失職，可由黨的當局命其退職。其實，不僅工業的管理者以及國家經濟的各部門，才是共產黨黨員。共產黨的各級黨部，彷彿組織的細胞一樣，遍存於國家經濟的各單位中。因此，共產黨成了一種極偉大的統一而推動的力量，不惟完全統制了政治社會的組織，而且完全統制了經濟制度。若除去了這種大勢力的來源——共產黨，我們差不多對於蘇聯是不能想像的。

常常都有一種說法，以為社會主義的制度，一定要以勢力為基礎，而不基於誘導。這種

說法，不但在蘇俄證實了，而且這種勢力，是和任何民主主義的形式，都不能相容。一般對於社會主義的責難，都說它是多數壓迫少數的一種暴政，因而一般社會主義者，常常都在這一點，設法辯護。可是，實際上，蘇俄就是一個立於以少數支配多數之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社會主義的國家，除開這樣而外，是否能夠成立，很值得我們的考慮。

現在蘇俄的統制，就完全憑一種勢力，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個人生命的自由，完全禁止了。這種情形，是過慣了歐美生活的人，所不能容忍的。不過，蘇聯經濟制度所獲得的成功（也許此種經濟制度的存在，）是不是全靠着這種勢力呢？作者對於這個問題，現在不想答覆。雖然這個答案是很重要的答案。因為由此我們可以決定，蘇聯經濟制度所獲得的確實成績，其中一部分能否由資本主義獲得。以下各章，便對於蘇聯經濟制度的敘述和分析，藉此可以給我們一些資料，以為判斷的根據。

第二章 工業的組織

蘇聯的工業大別爲三類，卽全聯的，各共和國及地方的，及地方的。地方的工業，大約又可分爲省、縣、區與村各種。全聯的工業，爲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Economic Council）所管理；各共和國的工業，則由各該共和國（一共有七個）的最高經濟會議所管理；地方的工業，則由地方經濟會議所管理。

蘇聯的經濟組織，自採行新經濟政策後，一九二一年經過一番改組，把所有的工廠，都分配給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轄下的一些託辣斯。繼後，這些託辣斯又組織爲各工業的辛的嘉（Syndicate）。其主要的機能，最初本是商業的。不過逐漸進化的結果，最高經濟會議對於託辣斯的管理，要經過辛的嘉或組合的中介，但辛的嘉乃是股份公司，其股票多半爲託辣斯所有。

最高經濟會議可稱爲最高工業會議，頗與美國政府的商務部相似，不過權力較大，而所轄範圍亦較廣。這種組織，不論在全聯邦或各共和國，都是一種人民委員會。現在牠任命組合的經理，組合的經理又任命託辣斯的經理，託辣斯的經理又任命其所屬工廠的經

理。但託辣斯和工廠經理任命的最後決定權，仍在最高經濟會議。

最高經濟會議有聯絡各種工業的作用。常舉行各種工業的定期聯席會議，討論關於二種或多種工業的問題。例如自動工業需要若干發電子，並認為有向國外購買一部分之必要。於是該工業的代表可與電氣製造工業的代表開會商議，計劃在本國內自造，以免利權外溢。

除此而外，最高經濟會議的職權甚多，約列如下：（一）監督各企業、各託辣斯、各組合的贏餘虧空的分配情形；（二）新託辣斯的組織、及設立新託辣斯的規程的頒佈；（三）販賣價格的規定；（四）各企業、託辣斯與組合報告及損益表的核准；（五）工業的技術改革，及各企業、託辣斯、組合的參照數字之核定。

在最高經濟會議內部，還有一種特別組織，稱為專門經濟計劃部，其職責如下：（一）一般工業計劃的擬定；（二）各工業一年及一季參照數字表的擬定；（三）工業設置地點的計劃及其在一區內的分佈；（四）諸組合間活動的聯絡；（五）工業政策的擬定；（六）工場法案

的擬定；(七)工業技術合理化的指導；(八)工業技術指導一般系統的製定；(九)工業科學研究的進行；(十)監督外國優良機器輸入蘇聯；(十一)謀工業的標準化。

最高經濟會議又要負責培養工業人才，並分配這些人員於各工業。再則，牠也是主要的工業監督考察機關，考核政府及最高經濟會議指導下各重要工業經濟機關對於計劃履行的成績報告。爲實施考核，得利用各共和國及各地方的經濟會議，並督促同業工會及其他社會機關以幫助實施監督考核。同時，最高經濟會議對於各共和國各地方的最高經濟會議，也給以技術的指導和幫助。

最高經濟會議，固然代表國家管理工業，但對於下級工業組織，却也予以多量的自由。例如販賣生產品及購進原料的契約，組合可以自由締結。同樣，託辣斯可不必經組合的認可，得自由購進少量的用品和雜物；工廠亦可不必承商託辣斯而自由招致工人或解雇工人。交通委員會，生產合作社與工會，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所附設的工廠，以及市政府等等所進行的這類工業生產，都不在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理之下。

勞働保障會議直轄下的國家設計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所擬的工業發展計劃，經最高經濟會議的中介，即送交各工業及各託辣斯。在從前，最高經濟會議係組織爲若干專門部，各負責視察管理一工業，例如織物工業，便有專管織物工業的專門部。這一部，便對於織物工業的各工業，各託辣斯，以及織物辛的嘉的本身，全部負責管理。但因爲大多數的工廠，都屬於託辣斯，而託辣斯又屬於織物辛的嘉，所以最高經濟會議對於託辣斯的管理，要經過辛的嘉，而對於各工廠的管理，則又間接經過託辣斯。不過假若一託辣斯不屬於辛的嘉，或一工業不屬於託辣斯時，最高經濟會議的管理便是直接的。

但最近幾年的趨勢，大多數的工廠都組織爲託辣斯，託辣斯又組織爲辛的嘉。第一，因爲購買原料，獲得信用放款及銷售市場的困難，故不得不傾向於集中合作。第二，因爲共產黨的理论贊成大單位的組織。所以集中運動便不得不加速發展。其結果，織物工業到一九二九年，已全數變爲辛的嘉，其他工業的辛的嘉，亦幾達到同樣的程度。有些工業，雖未曾辛的嘉化，但却採取一種非正式的暫時的特別集合。牠沒有個別的資本，也沒有個別的貸

借對照表。在有些地方，頗相似於美國的貿易協會。牠是各種工業託辣斯代表所組成的一種委員會，其目的在防止或調和諸託辣斯商業利益的衝突。

一種工業達到完全辛的嘉化的目標時，最高經濟會議的專門工業部和工業辛的嘉二者的職能難免就重複了。所以，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間，便把辛的嘉和最高經濟會議重新改組。於是辛的嘉本身便獲得一種雙重的地位，因為牠現在已是最高經濟會議的一部門；至若最高經濟會議的專門工業部，則漸漸取消，因為牠可將工業的管理權交給辛的嘉，所以名詞也改變了。作用擴大的辛的嘉，叫做組合（*Obedinienie, or Combination*）辛的嘉一名詞，則專指組合中的商業部門而言。

經過這種改組，辛的嘉便發生一種完全的演進。辛的嘉創設的目的，本來是商業的。係成立於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初期，因為當時蘇俄政府所最關心的，便是國家工業產物的市場問題。大凡工廠所生產的貨物，其零售與躉莊批發，有許多都是由辛的嘉一手包辦。但後來消費合作社發展起來，不但擔任貨物的零售，也擔任躉莊批發，所以辛的嘉的貿易範圍

便逐漸狹窄起來。到現在，繼辛的嘉而起的組合，有時，也幹零售的工作；把所生產的物品，一部分零售於市場上。這樣一來，辛的嘉的零售，和消費合作社的零售，在經濟制度中顯然重複。所以最後，消費合作社便被國家公認，專供給消費大眾的物品，零售或者躉賣。這樣的公認，自然要受辛的嘉的反對，因為這樣一來，辛的嘉存在的理由，便消滅了。不過，辛的嘉，在別一方面，已得到工作。因為最高經濟會議的專門工業部已經取消，其職責完全交給辛的嘉代辦。當決定把辛的嘉改變為組合的那時候，現存的辛的嘉共有九個。

當辛的嘉與最高經濟會議改組完成時，辛的嘉本應由一種專為商業交易而設的組織，變為一種以計畫和指導為職能的組合。可是一般的希望都以為在某種工業，組合應是一個聯絡那工業的工廠、及託辣斯、和外界的工業商業及銀行界的連鎖。因此，組合應繼續有商業活動的領域。即是，它為了售買本工業的出產物，可以與消費合作社的批發代表，結售賣的契約。又若其他組合，需要這一組合的出產品，作為原料的時候，也可以和其組合的代表，訂立契約。但是貨物的直接零售，組合當然不必過問。組合所管的，只是供給原料，與組

合內的託辣斯和工廠。這個作用，非常重要。因為原料常有分配的必要。這樣，各託辣斯和工廠對於有限原料的爭取便可減少。

組合對於託辣斯和工廠間的信用貸款的分配，也加以統制。其財源有三：（一）組合內所包含的工廠及託辣斯的資產，（二）銀行貸款，這是常用資本的重要來源，（三）國家直接補助金。對於這三種財源，組合都負分配之責。

組合也替各託辣斯擬定生產用費表，登載於組合與各託辣斯的協定中。此項協定中，並載有各託辣斯所應生產貨物的分量及種類，和貨物產出的期限。至於工資，工作時間，及工作環境等，雖由各託辣斯與同業公會協定，但工錢與勞動時間的限度，仍由組合規定。又各託辣斯與同業公會間工錢的協定，其限度，更因組合所擬定之生產費用表而定。

組合根據其託辣斯和工廠所供給的資料，草擬計劃，以供工業的應用。該計劃送呈最高經濟會議，再轉呈勞働保障會議。然後由國家設計委員會審查，加以修正，俾符合於蘇聯全部經濟的整個計劃，然後交還最高經濟會議，又由最高經濟會議以命令的形式，交給組

合，由組合草擬各託辣斯的計劃，又由託辣斯草擬各工廠的特別計劃。所以每年計劃的原素，最初是來自工廠，然後經託辣斯組合、最高經濟會議，最後乃至國家設計委員會。因為這樣經各階級而進，故逐次依各高級機會，較普遍的觀點加以改正。及至最後國家設計委員會加以修正時，這種過程便顛倒過來，計劃又作回轉的通過，由各階級加以詳細的擬定，最後遂達工廠。各階級對於計劃的修正，都可表示反對，並得詳加改正。所以各工業階級對其最後所接受的計劃，都有實行的責任。不過組合對於其工業的生產計劃，却負根本的責任。

組合分爲兩級，一是全聯的，一是各共和國的，第一級的組合又分三類：第一類只包括全聯的企業和託辣斯。這是組合發展之最完全者，大凡上述組合的種種機能，牠都負責履行。第二類組合包括全聯的企業與託辣斯，也包括各共和國及地方的企業與託辣斯。對於全聯的託辣斯和企業，組合履行其正常的機能。對於各共和國及各地方的託辣斯和企業，只履行辛的嘉的原始機能，即供給原料與生產物的出售，此外便是對於重要建設的一般計劃和管理。組合也負責調劑各地方和各共和國的託辣斯與企業的工作，並代表這些託

辣斯和企業，和那些不在同共和國內或同省內的託辣斯和企業發生關係。第三類只包括各地方各共和國的託辣斯，但這些託辣斯係在數個共和國之內者。在這種情形中，組合所履行的機能，只是上述第二類組合的機能，即代表地方及共和國的託辣斯與企業，和不在同共和國內或同省內的託辣斯與企業發生關係。全聯的組合，係在U S S R的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理之下。

第二級組合是屬於共和國的，大凡在七個共和國境內的共和國及地方的託辣斯和企業，都屬於這一類。其所履行的機能，與第三類全聯組合所履行者相似。

一九三〇年二月，屬聯邦的組合一共有二十六個，工業的種類如下：(一)黑金屬，(舊工廠)；(二)黑金屬(新工廠)；(三)煤；(四)石油；(五)工業機械；(六)農業機械；(七)自動工業；(八)電氣工業；(九)能力中心(為建設電力廠及該廠行政者)；(十)織物；(十一)皮革；(十二)非鐵金屬；(十三)建築；(十四)化學；(十五)造船；(十六)泥炭；(十七)糖；(十八)橡皮；(十九)非金屬礦；(二十)火柴；(二十一)矽酸礦；(玻璃，瓷器等)；(二十二)紙；(二十三)

木材(二十四)烟草(二十五)油與脂肪(二十六)鹽。工業種類的數目，年年有加無已。例如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日，就成立了兩個聯邦組合，一是航空，一是戰爭工業。

大凡屬於聯邦的同一工業託辣斯，常常都組織為一個組合。那麼，組成工業的又是什麼呢？這裏我們便發見織物組合之中，包括羊毛織物託辣斯和棉織物託辣斯。並且不但這樣，組合甚至託辣斯，在性質上也可以一部分是垂直線的。例如第一棉業託辣斯自己有一個小工廠，却是製造織物機器的組合與託辣斯都擁有種種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有的是製造機械的，有的是建築織物工廠的。我們再以第一棉業託辣斯為例，我們可見除了上述製造機器的小工廠而外，還有織工廠、紡工廠、修飾工廠，一般人都以為一切機器的製造，應該在製造機器的辛的嘉之下，但在實際上，製造同種生產品的工廠，可以在很不同的諸組織管理之下，我們可以說，這是蘇維埃工業一個可以介紹的特點，並不堅持組織方式的固定。

販賣出產品，本是託辣斯的一個重要機能。託辣斯有時不但將其工廠的出品作批發

的販賣，甚至組織連環的零售商店。在那些沒有組合的工業，或託辣斯不屬於一組合的時候（縱令已有組合的存在），或託辣斯不是屬於聯邦的時候，託辣斯也許把牠們的產品躉賣和零售。及至聯邦的工業已經辛的嘉化時，大多數的託辣斯都屬於一個辛的嘉，託辣斯的販賣機能便移歸辛的嘉。但我們以前說過，這種機能並不永遠存在於辛的嘉，大體上却移到消費合作社。同樣，託辣斯最後也把關於工業關係的一切機能，都交給外界去了。信用放款、財政、原料的供給，以及計劃，都成了組合的重要機能。那麼留給託辣斯的是什麼呢？

第一，託辣斯負着傳達的責任，把組合的命令傳給工廠。因為在大多數的工業上，若無一種居間的組織，組合便無法與工廠發生有效的關係。換言之，託辣斯不過是一種方便的組織，把許多較小的單位連合起來，俾便和組合來往。除此以外，託辣斯却還是一種極重要的活動單位。因為牠是受組合命令的支配，所以收集所屬工廠的資料，以供組合草擬其工業財政計劃。及至這種計劃，最後經組合，最高經濟會議，國家設計委員會修正並正式承認時，託辣斯便監督其工廠遵照執行。託辣斯若與某一工廠同意於該工廠的特殊詳細計劃

之後，便起草一協定，並將該協定登載於公報中。該協定係規定該工廠所需要的原料的種類、等級及價值，以及應付的工資，託辣斯對於工廠的信用接濟及經濟協助。至若工廠方面，則承認按照契約中所指定的等級和種類以及價值，生產一定量的物品。

大凡研究和實驗的工作，若由一工廠單獨舉行時，開銷太大，則由託辣斯舉行。例如第一棉業託辣斯，在塞浦哥夫（Серпухов）就有一個實驗室。在該實驗室中，大凡纖維、線、紗和布疋的伸張力，都加以實驗，另外還有一個化學部，則實驗精製工廠所用的染料。此外，新式的紡織機，新式的紡織方法，也在實驗室中加以實驗。託辣斯也養着紡織工程師，研究紡織以及精製工廠中所遇見的專門問題，設法加以解決。

託辣斯還在其所屬之諸工廠間，組織一種社會性的比賽，並舉行生產會議，凡行政人員，專門人員，以及工人都參加討論生產的問題，並比較各工廠的生產成績。

據一九二七年七月所頒布的法律規定，大凡一切國家託辣斯，都要把贏餘百分之十，作為所得稅，而歸入國庫。其餘百分之九十則分配如下：百分之十用以改進託辣斯工人的

生活狀況百分之十作為該託辣斯的準備資本；百分之十作為特別國家資金，存儲於國家工業電氣長期信用銀行；百分之二十五用為事業資本的擴張，其中一半作為長期存款存於上述銀行；四分之一用為鼓勵金，分配給與託辣斯的辦事人員，其餘百分之四四·七五或入國庫，或用為特殊資本。

但這種規定，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又變更如下：（一）作為準備資本的一項不再付給；（二）歸入國庫者規定為贏餘百分之四七·五，但上年的虧欠必須在先減除；此款係付給該託辣斯所屬的財政委員會（或為聯邦的，或為共和國的，或為地方的）；（三）此外百分之三·三五用於職業專門教育；（四）百分之一·二五用以改進託辣斯工人的生活狀況；（五）百分之五·二五用作工業電氣銀行的特別資本；（六）百分之六·二五用作託辣斯的擴充資本。至若鼓勵金仍然是百分之〇·二五。

上述贏餘的抽稅，不過是在工業間轉換財源的一個方法而已，因為蘇維埃照例都主張用別的稅款來補充工業，並不全為政府需要之故，以致加重工業的負擔。蘇維埃政府的

政策就在把消費品的價格提高，俾生產該消費品的工業贏餘得以增多。政府由這些贏利得到的錢，又借給或補助他種工業以便製造主要的設備。而主要設備的價值則盡力使之降低，俾得增加工業機械的速變。所以重工業的贏餘，在國家稅源上，反而比較不甚重要。

一 託辣斯的贏餘，雖然只有百分之十二·五歸牠自己支配，但牠由國家預算內所受的津貼，實際比牠付給國家的多得多。此外，留給託辣斯的贏餘，還有其他方面，也同樣受國家的管理。因為國家還管理價格，所以留給託辣斯的贏餘百分之一二·五，已足夠為託辣斯謀擴充。假若託辣斯百分之一二·五所得的贏餘過多，則該託辣斯生產物的價格便可降低。一個工業也可以遵照政府的命令為出口而生產，且僅以生產費的價格賣給專營國家貿易的機關。但若得到行動的自由，其貨物也可以高價出售於國內市場。假若有些物品為國民經濟所必需，則蘇維埃也不惜設法生產，而以較生產費還低的價格出售。其損失則由國家預算來賠補。若認為可以保持物品的高價，同時又可以防止過度贏餘的積累，則對於工業，也可以特別免除其一部分的稅。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利潤對於蘇維埃的託辣斯並不像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那樣重要。一託辣斯的效率，也不以其利潤的多少來測量。每一託辣斯，一季一年，都有一個工業財政的計劃。其效率的測量，係根據三種標準：（一）其各單位的生產費是否較計劃所預定者高或低；（二）其生產較預定者多或少；（三）其生產品的品質，較預定者好或壞，而所得的利潤，則以這些前提來決定。

託辣斯中所包括的企業，是全然沒有損益計算的。一個企業，若能把生產費減低，則贏利便歸該企業支配。因為最高經濟會議的意思，是要把每一組合、託辣斯、企業，甚至工廠中的一部分都放在一種單獨會計基礎之上，換言之，即想在蘇維埃工業中採用一種真正的成本會計制度。採用這種方法，庶對於蘇維埃工業的各單元較切近的分析，和監督計劃的履行。工廠的管理者庶可專心增高生產量，（較多於工業財政計劃所擬的數目），同時減低生產費。他的工廠在國家看來，是否利潤的大財源，甚至大有虧損，他可不必過問，（即是那工業的重要性及於全國的）則由各共和國的最高經濟會議管理。所以工業的組織更

爲複雜，因爲有時共和國的託辣斯（尤其是在紡織工業上）也屬於該工業的組合。這種組合，經過現在工業的改組後，也是蘇維埃聯邦最高經濟會議之一部。所以在改組時，不得不使組合和共和國的託辣斯發生關係，因爲組合現在已歸聯邦的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轄，何況實在也是該會議的一部分。在紡織組合中，有二十五個聯邦的託辣斯，有十五個共和國的託辣斯。這十五個託辣斯，現在已更歸聯邦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理，這是向着工業管理的集中化的更進一步。共和國最高經濟會議和聯邦最高經濟會議權限的劃分，實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至若地方工業，在各經濟區（或稱省）中有一個省經濟會議，其對於地方工業的職權，和聯邦最高經濟會議對於聯邦工業，共和國最高經濟會議對於各該共和國工業的職權一樣。在莫斯科經濟區中，管理的機關就是所謂莫斯科經濟會議。在事實上，工業在莫斯科經濟會議管理之下，比在共和國最高經濟會議（但烏克蘭或R S F S R除外）管理之下更爲重要。一種工業是否要包括在共和國，聯邦或地方的託辣斯之中，並不單決定於

工廠的內容大小，也不單決定於該託辣斯生產物的價值。例如莫斯科製造食物的託辣斯所謂「麥塞甫羅木」(Мосалпром)者，在實際上，除了製造莫斯科區所消費的一切食物而外，還製造很多商品銷售於國內各地，甚至行銷海外，但仍然是一種地方託辣斯或省託辣斯。在生產物的價值上，工人的數目上，投資等等方面，該託辣斯固然較其他許多包括在聯邦託辣斯內的託辣斯重要得多。但因其生產物大半消費於莫斯科區，其原料大半得自蘇維埃聯邦內，所以其組織所要應付的問題，在範圍上既不是共和國的，也不是聯邦的。

在地方工業內，還有比省不重要的工業。其次便是縣執行委員會所管理的工業。在此種情形中，並不會有一個機關指導較高政治經濟區的貿易，却是一種工商管理的機關所謂「普羅木託爾格」(Промторг)者，指導縣內的一般工商業。再其下者則為區，也許有很小的工商業，則由區管理。這些企業通常都是國家農場，或者有些是手工業或半手工業。最後我們講到市，這和其他地域的區分全不相同。市是在蘇維埃的特別市政部管理之下，自營市車、公共汽車、煤氣、電氣、和自來水。但此外，也做建設的工作。在莫斯科，市政府有

一個專部即做一些重大的建設，例如電車路、電線、清理溝渠。但市政府不僅做這類工作而還有一部專管戲場、洗衣作、學校的建築；又有一部則建築工人的住宅。最後，市政府有時也製造大批原料，以供其種種建設事業之用。

不論託辣斯或組合，全不是一種股分公司的組織，這種組織，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組織迥不相同。但在蘇俄經濟上，有相當限度的用處。這種組織不是蘇維埃聯邦的典型的工業組織或商業組織。一般而論，股分公司的組織，就在使各種不同的利益得有股權來代表，並收集資本以舉辦新事業。股權的門類是很廣的。所以在辛的嘉改組為組合以前，某一工業的託辣斯佔有辛的嘉大多數的股分。但各個工廠和銀行為常常有股在其中，辛的嘉佔有股分的公司，都是製造工業上所需要的機械的公司，而託辣斯和各工廠，也持有這種股票的一部分。而另外一個辛的嘉，在這個公司中也許有股。至若銀行、委員會及合作社，在以股分形式組織的事業中，也許有股。就是個人，有時在上述種種組織中也可以有股。工廠、託辣斯、辛的嘉、銀行、合作社及其他，也可以為種種組織例如紅十字會、航空促進會的會員，也

可以投資，俾得利用其所屬的組織。

一種股份組織，即使賺得很大的利潤，但也許分紅，也許不分紅，是沒有一定的。其組織的目的，當然不是爲賺錢，而是否分紅，就要看事業上是否需要更多的資本而定。甚至於不需要更多的資本時，也可以把生產品的價格減低，而不分較多的紅利。因爲在實際上，一切股份公司的組織，其目的都在爲其他工業服務，所以把生產品的價格降低，和增加紅利同樣是應當的，而一般都以爲最好是把這些公司的生產費降低，而不願有較多的紅利和利潤。

股份公司的組織，若其目的是在獲得新事業的資本，那麼當一種新的事業認爲有成立之必要時，便可由股份公司担任資本。但若沒有股份公司的組織，便不得不由國家預算補助資本，或由某託辣斯開始新組織，由自己籌備一切資本。所以股份公司的組織，其目的是由其他相關的組織得到資本，而不歸一種企業獨自担任一切資本，也不待政府的補助。

股份公司中的管理，並不僅取決於股東多數的投票。在事實上，常有一種組織，其在股

份公司中的利益，是超乎一切的，其股票的享有權，常較其他任何個組織的股票享有權更大。並且，即使其他股東聯合投票可以打倒該最有關係的組織的票數，但實際上也不容許這種情形發生。股份公司經理的任命，在理論上是取決於股東多數的投票，但實際上却是最高經濟會議的行政權力的應用，而在本質上完全是黨的政策和政治的事。

但股份公司的組織，現在已逐漸減少其重要性。這種組織，本來是直接抄自資本主義的制度，對於蘇維埃經濟的一般計劃很不相宜。不過新的股份公司却也時時創設，舊的逐漸消滅，例如工業電氣長期信用借款銀行就經過改組，不復成爲一種合股的形式。辛的嘉本是有合股公司的形式，但後來却用組合來代替，而歸最高經濟會議直接管理。在最近的將來，合股的形式也許會完全消滅！

工廠生產計劃的實行，係遵照其與託辣斯所協定的工業財政計劃而進行。從前，工廠管理，採用委員制，後因結果不良，另外採用一種制度。即一切責任與威權，均集中於一人身上。謂之指導員，或經理。這一點，工廠和組合、託辣斯組織不同。因爲後二者，通常都有幾個

理（縱然其中有一個主管。）工廠的經理，係由託辣斯任命而經最高經濟會議核准。同業公會對於任何任命，固可以表示抗議，甚至經由組合，而不達最高經濟會議。但在實際上，這種事是很少發生。在任命之前，普通都就商於同業公會的人員，而工廠的經理常常都是由同業公會的人員中任命，因為這些人所受的訓練，被認為最宜於經理工廠。在任命之前，亦就商於黨委員會，故實際上，只有黨的威權才是絕對的。同業公會的人員和工廠經理，第一個資格，要為黨員。所以黨的訓練，是最關重要。若把這種工廠經理的人員擇自有成績的同業公會人員，和黨務工作人員的情形，去和資本主義國家人員的任命，擇自法律界、銀行界的情形，相比較，頗為有趣。在兩種情形中，經理者都不是工業上專門人材的代表，而是代表工業以外的利益。蘇維埃的工業經理即代表共產黨。資本主義國家工廠的經理，則代表持有股票的黨。

經理自經任命後，即負責指派行政人員和專門人員。每任命一個新的專門人員，必須與工廠工程人員所組織的會議磋商。經理對於普通僱員的任命，有充分的權力。但這些僱

員，必須來自國家勞工交換局。設若他需要添加僱員，也非從這個局中去尋求不可。交換局送來的人，不一定要他非用不可，但是他若不任用，他也不能向他方面尋求。這是防止經理任用私人的弊端。且可免除工人在各工廠尋求工作。

經理可以辭退工人，但在辭退之前，必須告誡三次，並作一個告誡的正式報告。若有辭退，必通知工廠委員會，假若被辭退者是一個黨員，更要報告黨部。假若工廠委員會不同意，便將此事求訴於調解委員會，該會有經理部及同業公會的代表出席。

研究蘇維埃經濟的學者，間常講到蘇維埃工廠的三角管理制。(Triangle of Control) 這個有名的制度，是由經理、共產黨員及工廠委員會 (Folkom) 組合而成。共產黨部分，大凡工廠中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在內。對於行將發生的問題，共產黨皆在先舉行會議，決定對於該問題應持的態度。然後將所決議的意見，在同業公會中或別的工廠會議中，提出表決，黨員們便一致投票贊成。因此，權力非常強大。其次是工廠委員會，因為這是由共產黨所指導的會議中選舉出來，所以不但是共產黨所指揮的機關，實際是共產黨的機關。換言之，黨

的地位，是比工廠委員會重要得多。共產黨部分，常由其祕書代表出席，所以在實際上能操縱工廠管理的，並不是工廠委員會的主席而是他。工廠的管理部若與黨部祕書發生衝突時，黨部自然是有工廠委員會的擁護。不過這種衝突，很不容易發生。因為工廠的經理差不多就是共產黨員，並且是經上級黨部許可（甚至指導）任命的，所以黨部並不蔑視經理的決議。再者，黨部的觀點也不是反對經理的觀點。所有正統派的黨員，都應該扶持工業合理化的運動，增加勞工的生產力。所以管理部的工作，若是企圖增進工廠的效率及生產力者，黨部無論如何，都不能公然表示反對。所以黨部在工廠中的地位，是設法消滅衝突，使生產力增高到最大限度。

黨部的影響，在蘇聯全部結構中，確實是不能忽視的。牠是一種力量，能在工業人員中直接運用，使國家的工業政策得到扶持和贊助。把管理人員和黨務人員聯合為一種組織，而這種組織，因為是屬於黨的原故，故其責任，比其在工業上的地位還要重要。所以蘇維埃工業上的管理制度，就很難說是三角形的。黨部和管理部是兩個重要原素，工廠委員會附

屬於黨部。又因為管理部和黨部都是屬於黨的，所以實際上決不會發生根本的衝突。人員的衝突自然是有的，討論上自然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但遇見這種情形，黨部得宣佈不能與『黨的大綱』相衝突。至若近來的傾向，似乎就令管理人員和黨部發生衝突。一般都在支持管理人員的方面了。一九二九年秋季關於生產的單獨管理，發佈了一個通令。這道命令，最有意義的地方，是不出於蘇維埃政府的某委員會或某機關，反而發自黨部。這樣一來，在管理工業上，黨部服從管理人員的意見，便很靠得住了。因為黨部向來，是最能服從為誇耀的。當然輔助的命令也頒布出來，解釋原來命令的意義而加以修正。至若解釋單獨管理及責任的必要的小冊子，也時時發佈出來。報紙上，常見關於工廠衝突及管事者不負責任的控訴。

要求有責任的有威權的管理，日甚一日。不管是工會或是黨部，都不能阻碍生產機關的效率。原來，現在工廠的經理，已不是過去的布爾喬治亞，他們對於黨的忠心已不必再受懷疑了，他們過去的經歷，並不像布爾喬治亞那樣是非無產階級的。他們也不是過去資本

主義的工業人材，而是從前的工人，甚至是常常活動的黨務工作人員。因此，黨也覺得對於這類人不必再加限制。經理就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也是一個良好的黨員，也是一個工會的領袖。所以假若他的活動是以增加生產爲目的，當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而且就令經理的權力增大，政府也會發有最綿密的勞動保護法典，使他的行徑，不能出於這法典以外。不過階級爭鬥現已不復見於工廠中或工業界中。工廠委員會，黨部以及管理部都是無產階級，都是黨。他們之間沒有衝突發生，也不應有衝突；這即是共產黨的態度。

工業除了在經濟會議指導之下者而外，尚有一些是在其他組織指導下進行的。純粹私人的企業當然談不到大量生產。因爲私人僱用勞工，受的限制極嚴，因此普通所謂製造，都說不上。也有極少量的製造工業，是受外國特許的，但所生產的分量，和總和的生產量比較起來，更是可有可無。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曾獎勵外國人的製造工業，因爲藉此可以吸收多量外國資本。同時生產品需要的切迫，也是歡迎外國資本家企業的一個理由。然而在實際上，一切被歡迎的外僑，都是無足輕重的。將來，外僑的重要性，不但相對地減低，而

且還要絕對地減少。外僑的數目，已逐漸減少，而蘇維埃政府的一般政策，更不歡迎外僑，在國內從事生產事業。

但是蘇俄却需要外國工業人材的幫助。這一方面，蘇俄政府已和外國公司，定有契約。這個，在蘇俄政府，是根據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基礎的。蘇俄所訂契約，是由外國供給蘇俄以有訓練的工程師，為代建築工廠，裝置機器，或改進某種工業（如煤礦或石油工業之類）的工業基礎之用。這些協定，往往是在美國德國或西方諸國，購買機器時，隨同訂立的。例如，一個外國公司，賣了一船織機給蘇俄政府，就供給工程師，代為把機器在蘇維埃工廠中裝置起來，甚至訓練蘇俄工人使用機器這樣的契約，曾經訂了許多。有時也且包括貸款給蘇俄。如普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所訂的契約，就包含貨物的售賣，信用的墊付，以及工業人材的供給。這些契約，似乎很得到滿意的結果。假若蘇維埃政府要依照計劃，增加資本及生產品，這類契約的數目和重要性，顯然要隨之增加。蘇維埃政府有幾次曾因訂立契約的公司不良，所供給的工業人材也很壞，因而吃了契約的虧。有一次，蘇俄政

府曾抗議過，說某公司供給的機關車專家，實際只受過幾個禮拜的訓練，就送到俄國。又有幾次，美國公司和蘇維埃政府訂立契約之後，把工程師送到俄國，可是沒有向工程師們說明生活狀況和契約的內容，因而工程師們未到契約所訂的時間就離開俄國。大多數的場合，訂立契約者是小公司，牠們借給俄國的工程師，並不會在工業的學校中受過訓練，都是在實際經驗上獲得的知識。有時送的是住在美國多年的俄國人，因為言語上的關係，就送到俄國，擔任工程師的任務。但是這些人，常常沒有美國工程師那樣令人滿意，因為他們常和工人發生衝突，而他們又不是有訓練的工程師。但是，有許多著名的契約，對於俄國工業的建設，如斯塔林格勒自動機車工廠的建設，究竟非常有益。這一類契約的數目，不斷地增加着。

有些工業，組織成所謂「混合公司」(Mixed Companies)，由外國資本和國家資本合股組成。這在商業性較重的公司，常常是這樣組織，但是在蘇俄工業上比較完全外國人所經營的企業，還不重要。至若私人資本，即使是俄國私商的，有時在合股公司中也有股本。

不過這種情形非常稀少，而且也不重要。

個人的企業，在蘇俄的工業經濟上，仍保有相當的地位，但這都是獨立的工匠，從事一種較原始性的生產工作。在去年中，政府才決定把所有手工業者包括在生產合作的機關中。雖然並非全數小規模的生產者都屬於這種合作組織，總數四百五十萬人中，已有二百萬於一九三〇年屬於該組織。政府希望五年計劃成功時，其餘的人數都納入這種合作組織中。這些合作社所經營的工業生產，其總量之大也是很可驚異的。按照計劃，他們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價值的總數，將達二十五萬萬盧布，（按蘇俄全部工業的生產價值為二百六十五萬萬盧布。）至若輕工業，大約總生產的百分之三十是由生產合作社經營。很奇怪，就在這些生產合作的組織中，也居然有僱用幾百工人的大規模的工業。

屬於生產合作組織的工廠，連同工廠內的工人，即是所謂同業公會。這種組織的方式，和國家工業的組織大不相同，不過也不是在歐美失敗的那種生產合作組織。工廠的經理，是由同業公會會員所選舉的人主持。另一方作同業公會的會員，則獲得比較固定的工資，

而這種工資，並不視會員中所得利潤而定。

會員即使不在同一鋪店中工作，也有合作的組織。做紐帶繡麻的農婦以及農村中的手工業者，都被鼓勵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出賣他們的製造品，又由合作社購買他們的原料。有許多農民，是很不願意加入這類組織的，不過對於不加入者却採取一種限制的方法，而對於會員却給以種種利益，所以結果這種組織便不斷地擴大。農民若仍要把他們的生產品在私人市場上售賣，便有被視為富農階級的危險，再大凡這一切異樣的組織，都歸生產合作社全聯會議（All union Council of Producers' Cooperatives）所管轄。

至若生產合作社的將來，是很不能確定的。是否得盡量發展而與國家工業的系統平行，還是一個疑問。在現在，因為牠們出產一些小東西，都不是國家工業所準備生產的，並且收容了幾千行將失業的工人，所以還有存在的價值。在事實上，僱用失業工人的小企業，往往就是小工業的發端。

最後，我們要談到另一類工業，是由消費合作社經營的。消費合作社有時自己有烤爐、

磨粉機及其他工廠，製造市場上所需要的食料。這類工廠的生產過程並不十分複雜，他們的工廠，是做食料品最後一步過程，這些工廠中的工人即是同業公會的會員，其組織的形式與國家工業的組織並無不同之處。這是和生產合作社相反之點，因為在生產合作社，其社員並不屬於同業公會，其經理由他們自己選舉。

自一九一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成立託辣斯以來，蘇維埃工業的組織形式，雖然常常變化，但這種變化却是一種進化。因為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出一種確定的發展傾向。最初的方式，是採自資本主義的國家，及後這種方式漸漸改變，以集中管理制為目標，並使黨與工業組織上的種種單元發生密切的關係。

這種管理集中制雖然效果不良，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蘇維埃工業制度確能把採自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適應於自己的目的。只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組織形式一比較，便可見各方面都是適於蘇維埃工業的。我們只要一想到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種種公司的分類，投資託辣斯、銀行、保險辛的嘉、股票交易所、經紀人，諸如此類的組織，便可見這類組織形式，既

不簡截了當，又不經濟。

曾經有一個時期，斯塔林派和托羅斯基派，辯論國家託辣斯辛的嘉制度，是否代表真正的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反對斯塔林的左派說，國家託辣斯制度，應立即停止，而代以一種國家直接運用的制度，然後這種制度方能認為真正社會主義的。可是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却也證明只消對於制度加以相當的改變，也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並不必完全破壞現存的制度。若認完全由國家管理，即為社會主義，則誰也不能否認現在的制度，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但自從採用獨立的決算制度和成本會計制度後，工業內部仍保存着相當的自主性。

現在的組織方式，已具有顯明的永久要素，也許蘇聯已得到一種工業組織的制度，將來不必有根本的改變。總之，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的組織形式確適於大量的生產，而生產的限度，又適宜於構成基本的條件，以造成近代勞工生活的標準。

第二章 生產力與投資

大規模國家工業生產力的程度，往往和一般生產力相混淆。有時據說，前幾年蘇聯的生產增加如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百分之一九·七；一九二七——二八年，百分之二六·三；一九二九——三〇年，百分之二三·七；而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增加率的計劃所定應為百分之三二·一。我們說到大量生產每年增加的百分數時，我們偶然用『工業的』三字來形容。但這種形容是不充足的，因為這些增加速率，是單指大規模的國家工業而言。兩大規模國家工業的產量，不過佔全部工業生產百分之七十乃至七五，所以若就全部工業生產的增加而言，一九二六——二七年為百分之一七·二；一九二七——二八年為百分之一九；一九二八——二九年為百分之一六·八；一九二九——三〇年，據參照字數，為百分之二六·二。

假若農業生產的動力，也認為達到了生產力一般增加的速度，那麼增加的速度，尚不

及這些數字所指者之一半。因爲一九二八——二九年農業產物的總生產量爲一百六十五萬萬盧布；而工業產物的全部產量則值二百二十三萬萬盧布。據統計的材料所指出，一九二八——二九年農產物的產量雖較一九二七——二八年小有增加但實際上是降低的，因爲在那一年，農產物的缺乏，已達到近乎饑饉的程度。故其結果，農業生產力過度的降低，遂使一般生產力增加的速度也減少了。

現在我們回頭研究工業大量生產每年增加的速度，我們便可見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加的速度，超過一九二七——二八年百分之一六·八。這種數目，可以和美國工業增加的速度比較一下，按該年美國的增加率，爲百分之四。即使把蘇聯生產的增加數，大大打了一個折扣，這兩國的差異也仍然是非常顯明。對於這種差異，我們如何解釋呢？

第一，因爲蘇聯從國外輸入了大批的機器，同時又聘請了許多裝置使用機器的專門工程師。所以蘇聯在工業發展上本是落後的國家，但因利用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機器和技術，所以其工業的進展百分比，便突然增大。假若蘇聯的技術與工業發展，達到了亞歐的地

步，則這種原因所引起的大量增加便會消滅了。

第二，戰後的生產量，本來比戰前帝俄時代的產量低落得很多，所以初年的龐大的增加，半由於絕對數量的小額的增加，顯出了巨大的百分率的增加之故。按照估計，一九二八——二九年蘇聯的國家收入，若與一九一三年比較，在同一區域內約大百分之二九，而人口的增加則為百分之十二。我們若把兩年間一切經濟情況上的大差異加以比較，則或然錯誤也許和每種主要生產的增加一樣大。因為若精確計算戰前購買力和現在盧布的差數，非常困難。所以若把戰前俄羅斯的生產全部價值和蘇聯時代的相比較，想得到精確的結果一定是不容易。至若把現在最重要工業的生產力，和戰前同種工業相比較，也非常不適當。革命後生產，都集中於主要物品上，而其他無數雜物，又差不多已經消滅。因此，基本工業產量的增加，便比全部產量的增加大得多。

不過國家生產力集中於主要的標準商品，却是生產效率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假若所製造的物品種類繁多，則生產量總數，必比所用的生產力小，反之，必較大。現在的蘇俄民

衆，正受着一種嚴格的訓練，學着過一種最低限度的生活。現在充滿了我們商店的許多物品，在俄國是絕對得不到的。蘇維埃工業的生產制度，並不顧及衣服式樣的變化；就是那些雖可賣得高價然而生產費過大的物品，政府也不生產少許。對於漂亮修飾，很少注意。生產品若恰能達到需要，那就是唯一的希望。所以其結果，縱然由審美的眼光看來，物品的質地疵瑕百出，但生產力却儉省很多了。

最後一點，我們若要把蘇聯的生產力和戰前的生產力比較，我們必須承認品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由實際的觀點而論，也可以害及生產物品的用途。蘇維埃工業生產品質之壞，本是不可否認的。這種缺點，常被蘇聯報紙批評，政府也極望加以改正。但一方面因急求增加生產量，他方面因為原料的缺乏，所以蘇維埃的製造品仍然很壞。假若我們承認了現在生產與戰前生產在品質上確有差異，那麼蘇聯的工業生產力，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之末，也確實超過了戰前的水平面。

蘇維埃工業所以得到這種成功，自然是由於對於生產物需要的切迫，大凡工業所能

做的產品，無不是應付急切需要的。但是在一個所謂「剪刀危機」(Scissors Crisis)時期，却不是如此。但是，因為工業和商業已差不多完全社會化，所以要尋求一個市場，出售工業的生產品，毫無困難。不過在事實上，還是反面的情形才對，即工業並不能生產那消費大眾所準備購買的一切商品。在資本主義國家，無不感到尋求市場的困難，但蘇俄事態並不如是，我們若將其原因，一加研究，頗為有趣。往常都說，因為生產這樣不適當，所以蘇維埃工業不難尋得生產品的市場。這雖然是一種部分的解釋，但却是一種極膚淺的觀察。只要主要產品的需要未曾滿足，市場問題始終是較簡單的，因為在這類環境下，所發生的困難較少。但是，單說主要產品的生產力，仍不能達到合理的生存最低限度，仍不能解釋上述情境。為什麼呢？因為在工業生產物較現在少得多的時候，却有所謂「剪刀危機」的發生，我們知道，單是需要商品，並不就成功商品的市場。世界各國數百萬失業的人都需要商品，因他們缺乏購買力，所以他們的需要，便不能成為商品的有效要求。共產黨說，關於工業生產品的出售是毫無困難的，因為所要生產的分量早已預先計劃，而這種計劃的分量又不比所能需

要者多。這種解釋是對的，但可惜不完全，而且說法也可以更精密一些。蘇聯計劃現在主要的目的，是在勸告工人盡人類所能及者盡量生產，並不擬節省過度的生產。在實際上，沒有那一部分工業產量的增加，不受歡呼慶祝的。所以所謂計劃，很難作適當的解釋。

蘇維埃的官場中也說，蘇維埃工業所以不難尋求市場，其唯一理由即由於管理得法，國家經濟的各部門，都由一個中樞機關所管理。這種解釋，也是對於上述問題答案的一重要部分。中央對於國家經濟各部門的管理固然不是絕對的，甚至適合於一切目的，可免除尋求買主的困難。例如，假若發見磚、土敏土及其他建築材料的產量過多，一時不能用完，政府即下一個命令，從事建築，把多裕的材料用完。這種事情，是很容易做到，因為對於這類建築的需要，也是極其切迫。不過即使需要不大，不能把剩餘的材料用來建築，蘇維埃政府也會把生產轉在別一方面。又若發見消費物品的需要，較市場上以指定價格購得者更大，得由政府命令把物價降低，或工資增高。而付給高工資的資金，則發行貨幣或擴充銀行信用放款以抵補之。若認為這種辦法，將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危險，政府可以答覆說，假若貨物的

品質，及交換中介物的品質，二者同時增加，便不能說通貨膨脹了。

假若真是有一天，物品的生產量超過民衆的購買力（即使他們有錢可以買），蘇維埃便會把工作時間減少，藉以避免市場上供過於求的情況。

最後，中央當局也能隨時就需要的情況，擴充貨幣和信用放款，這也是防止市場上供過於求的一種最有力的方法。但這種方法用起來却不免有些危險。因為很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的結果。在過去，確也有過這種情形。一九二八——二九年，貨幣和信用放款擴張的速度，即超過生產增加的速度。不過政府因有限制價格的權力，因而可以避免通貨膨脹，物價騰貴。

至若增高價格的另一方法，便是市場的合理化，這種方法的壞處，也許和價格增高一樣。但是，至少可以說，蘇維埃政府利用擴充貨幣的範圍，較其他任何國家所能利用者為更大，並且他們也並不因擴充貨幣而完全地破壞交換和生產的制度。我們現在很難說，蘇維埃政府對於貨幣及放款的擴張的限制，將來能成功到什麼限度。就現在而論，這確是創造

蘇維埃生產品市場的一個重要方法。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這在過去，並不是錢幣及信用擴充的一種主因。擴張的主要目的，乃在實行偉大的建設計劃。錢幣及信用的收縮，實際上却並沒有引起購買力的缺乏，因為現在的情勢是大多數物品的分量，大凡準備出售者，都够消費大眾的使用。

總之，不論過去生產力如何增加，生產費用仍是很高，我們若把蘇聯國內的價格平準和國際的價格平準一加比較，不難看出蘇維埃經濟的效率，較諸世界其他各國為如何。大凡一個國家的價格平準，即表示該國家貿易的大小，和錢幣及銀行放款的分量與速率間的一種複雜關係。若用理論上一種普通的簡單說法，則價格平準都是傾向於均齊劃一的。現在蘇俄農產品的價格和工業品的價格頗不均齊。這是表示農民在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地位較低，並不是表示工業生產的較低。

至若測量生產費的真正方法，就在用消費者的購買力來測量。現在蘇維埃工人的平均工資較低，即表示蘇維埃尚未達到資本主義工業所達到的那個生產力平準，中間還有

很大的。一個距離。不過現在進行中的資本建設甚多，就可担保將來生產力一定大為增加。那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現在已超過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了。

次之我們現在來講一講蘇俄投資的情形。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工業成功的一個大障礙，就是工業上難於得到充分的投資。因為有了資本，則資本設備上每年的損失可以減少，同時亦可增加充分資本設備，以應人口常態的增加。一個國家的全部生產力假若不低落，則每年節省下來的資本，至少可以達到這個最低限度。但平常都說，即使這個最低限度的資本，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中，也不全得到的。在我們現在這個財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制度之下，能儲蓄的人大半是那些有錢的人，他們毫不費力節省一下，就可儲蓄起來。所以一個人若有一百萬的收入，他自然會節省一大部分下來，因為他的需要，每年用一百萬中的小部分就可以滿足。反之，假若收入很平均，或者財富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實際上減少了一些，儲蓄一定大大減少，因為從前收入完全不能滿足需要的人，現在已經把他們的收入增加，但增加之數，仍難滿足其全部的需要，而收入很大的人的

自動儲蓄現象，也會消滅。

但在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的意思，以為上述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因為他們相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儲蓄是國家的一種職能。但又有反對說，國家是由人民所管理，假若國家在把國家總收入未分配給人民之前，要儲蓄一大部分，人民自然是不願意，人民必定堅持這種儲蓄數目應減到最小限度。

那麼，在事實上，儲蓄和投資究竟如何呢？我們且把所得的資料（其中一部分已見於第一表中）分析一下。

蘇維埃政府的國家經濟總財源，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之末，已達七四，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二。若依參照數字，國家經濟的財源，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經濟年度之末，應增加到八五，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上年增百分之二四·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九二九——三〇年所計劃的財源之增加速度，比上年大得多，其比例差不多有上年的兩倍，可見這個時期，曾極度努力以增加資本設備。不過

在此即刻有問題發生，就是這些材料可靠不可靠呢？關於私人資本的增加，似乎有點誇張。這兩年的增加速度，若假定為百分之二，倒是最合式的。不過這兩年中，實際上並非增加而是降低。這種降低的大小如何，我們固不能說，但頗足以修正關於資源的材料及增加的速度。降低的速度，除了私人部分而外，上述的假定，或者是合理的。

我們若把被投資的國家經濟各部門一加考察，便可見蘇聯投資的分配，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大不相同。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資源的增加，超過上年度百分之一八·七，而依照計劃，下年的增加數應為百分之三四·七，在電氣事業上，一九二八——二九年增加數，超過上年度百分之四一·九，而照計劃，下年應為百分之五七。至若住宅，一九二九——三〇年增加數，超過上年度百分之一·六，而照計劃應為百分之三·五。由此我們可知，投資着重的地方，是在那生產別的地物的經濟部門，對於那直接滿足人類需要的經濟部門，不大着重。

此外，還有一種有趣的事實，也值得注意，就是上述兩年度中，國家工業資產總數的增

加，一年爲百分之二一・三，一年爲百分之二二・七。至若合作機關，增加數爲百分之三七，與百分之三八，私人部分，兩年均爲百分之二。但我們上面說過，私人部分，實際上也許是減少而非增加。

本來在任何國家中，要決定什麼是真正的投資，什麼不是，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蘇聯在國家經濟各部門上的新投資，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達五十萬萬盧布，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爲一百萬萬餘盧布。在這兩個經濟年度中，頭一年的國家收入爲二八五・三四萬萬盧布；第二年爲三四・三六三萬萬盧布。所以在頭一年度，國家收入用於投資者佔百分之十七，第二年度，則爲百分之三十。若與美國比較，一九二五年國家收入用於投資者約爲百分之二七。這種比較亦有不當之處，因爲兩國計算投資和收入的方法不同，不過至少也能給我們一種暗示。

單位)	
年終資產	
	15491
	2042
	31612
	14519
	416
	1660
	2751
	710
	2700
	11999
	1251
	88163
	47606
	2677
	34880
	35602
	16605
	32956

第一表 兩經濟年度的資產,投資及損失(以百萬盧布爲

1928—29

1989—3)

		1928—29			1989—3)		蘇俄經濟生活	
		損失	投資	年終資產	損失	投資		
工	業	489	2304	11501	554	4544		
電	氣	48	432	1301	69	810		
農	業	2067	2963	29857	2119	3874		
運	輸	431	1328	12732	465	2252		
交	通	13	62	312	16	130		
商店及農工業		35	296	950	49	759		
公共教育		34	273	2131	37	659		
行 政		17	67	641	18	88		
市 經 濟		95	249	2389	102	413		
城市建築		377	565	11588	381	792		
公共健康		18	103	1097	19	173		
總 計		3624	8642	74501	3830	14492		
其中屬國家者		1339	5290	38802	1489	10293		五 八
屬合作社者		65	471	1504	95	1268		
屬私人者		2220	2881	34195	2246	2931		
以經濟範疇分屬生 產者		1932	4462	29869	2051	7984		
屬分配者		479	1686	13994	530	3141		
屬消費者		1213	2494	30638	1249	3567		

但仍有一種疑問存在，即這種資本的儲蓄是不是虛構的呢？誠然，儲蓄數與投資數，若以盧布來計算，則因為盧布的法定虛金價與其實際購買力不相等之故，一定要打一個大的折扣。在第八章講貨幣的時候我們還要說到，就是要精密計算盧布的實價與虛價的差數，實際上也非常困難。據蘇維埃統計家說，批發的價值，差不多倍於戰前的價值一·八二三倍。又看第一表，一九二八——二九年工業的新投資總額達一，八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九——三〇年，按照參照字數，應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若化為戰前的盧布價值，則一九二八——二九的投資為九六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二，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蘇維埃統計家又說，在戰前任何一年工業上最大投資額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數目是指全俄帝國而言，大凡不在蘇聯領土內的區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可以說，即使蘇聯的統計家是錯誤的，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工業投資，至少和戰前一樣大，而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工業投資，若所計劃的投資都見諸實行，則至少兩倍於戰前。再則，我們應該知道，即使對於盧布的實價與虛價的相差而加

以修正，那逐年投資數增加的百分數，也不因此受着影響，那國家用於投資的數額，也同樣不生改變。

若要把現在全部經濟上投資的總數，和戰前俄國的投資總數相比較，乃是不可能的，因為必需的材料我們得不到。若假定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工業投資額，不過和戰前的投資額相等，那麼投資總額也許要少一些，因為其他方面的投資額，一定比戰前的俄國較少。在建築，專門從事貿易的資本設備，農業、手工業、消費物的保存諸項投資上，確是如此之情形。不過，假定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工業投資，不比戰前大，又要被蘇維埃統計家堅決反對的。但是，假若一九二九——三〇年的投資計劃完全實現，我們却很可以說，投資額當然遠過戰前的了。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用於投資的一切金錢，是否實際就變為具體的設備呢？當然，有許多工廠的建築，費用極大，雖然關於許多工廠是否能有效使用，也許還是問題。但事實是這樣的，即房屋實際是造起來了，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中造起來的資本建設是很

多的。土西鐵路（土耳其到西伯利亞）已於一九三〇年五月正式開工，最大的斯塔格勒得機車工廠也在同時開工。世界上最偉大的德勒普勒斯特羅電氣設計（Dneprostroy electrification project）也在進行之中。偉大的紡織工廠已經完工。但這不過說幾個較有名的計劃而已。烏克蘭的甜菜工廠，烏拉爾鋼鐵廠，各處的電力廠，都表示俄羅斯漸由農業的進為工業的國家。巴格、巴脫（Praka Batum）石油管，已於一九三〇年初期開始運用。由眼見的證據，即證明大規模的資本建設實際已在進行之中了。

那麼，國家收入用於投資的數目，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是不是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一樣大呢？對於這個問題，一定要作肯定的答覆。至若在所有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是否都是如此，則為另一問題。在這種一切歷史上罕有的偉大社會主義實驗的基礎上，我們很可以說，社會主義制度若採專政的形式，牠當然能把在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收入，盡量用其一部分在投資上面。

那麼，這種累積的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這大約可分為二類：一為社會的，一為私人的。

不過兩類也不能嚴格劃分。社會儲蓄的資本，其來源有四：

第一，工業及其他社會化國家經濟部門內部自己儲集的資本。依照計劃，一九二九—三〇年工業所儲集的資本，準備用二，四三〇百萬作新投資之用，這數目係代表該年度工業的贏餘。其中一，三六五百萬準備送入國庫。因為國家準備用一，六九二百萬盧布補助工業，所以除了那些和送入國庫的贏餘相抵者而外，工業尙可由國家預算淨得三二七百萬盧布。這不管說，工業是依靠預算補助的，工業的贏餘並不專用於非工業的預算上。

此外國家預算還用長期放款的名義，給與工業以二六九百萬盧布的補助，這個數目，本由工業把贏餘的一部付入於長期放款基金，然後由工業電氣長期信用貸款銀行及中央自治銀行發放出來。此款在本質上，和那直接付給財政委員會，又由委員會以補助金的形式再付給工業的那種款項意義相同，只是由銀行付給的長期放款應該付息，而由國家預算直接付給工業的款項並不常常付息。

此地值得注意的，就是用在投資上的工業贏餘，乃是當年計劃的工業利益。所以一九

二九——三〇年，總贏餘中，有九四〇百萬盧布是由減少生產費百分之十一而得，而工廠的價格，則僅降低百分之二·五，二數相差甚多。這樣稍稍減低價格，同時又把生產費減少，結果生產物價格的贏餘，便由百分之一一·六升到百分之一八·六。若不能按照計劃把生產費減少（這是本年的一種不景氣），同時又要望投資的計劃實現，則國家的預算便不得不予以較多的幫助。銀行的貸款也不得不較原定的計劃增多。投資上行政的增加（自採用參照數字以後，這種情形即已發見）也會發生同樣的結果。不過一九二九——三〇年關於投資的參照數字計劃也許並未完全實現。

第二，這種儲集的資本，一部分係來自稅收，不論直接稅、間接稅、地方稅、共和國稅、聯邦稅都包括在內。國家預算除了以借款和補助金的形式投資於工業外，還很有資金投資於農業、電氣、運輸建築及其他事業上。

第三，由信用放款制度也可以得到資本。按照計劃，工業應得的短期信用放款達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由放款制度借給工業的長期放款，係由工業電氣長期信用放款銀

行發放，且包括在上述預算放款及補助金的總額之內。

第四種財源是社會保險制度，由這種制度，可得大批資金，從事建築。

私人資金的儲集有三種，一是國家借款制度（即放款給國家）二是放款於儲蓄銀行，三是購買合作組織中的股票。私人購買合作股票的總數，一九二八——二九年達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達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若國家借款方式的儲蓄，一九二八——二九年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達一，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一九二八——二九年增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九——三〇年增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該項儲蓄存款，係包括在借給國家經濟各部門的信用放款總數之內。至若國家借款，一部分是由國家轉借給工業，一部分是國家機關購買，至若合作機關的股份，則包括在國家經濟的內部財源一類之中。所以此處列為私人儲蓄的，大部分也包括在社會儲蓄之內。再者，因為其他理由，我們也不能把這二類儲蓄分開。合作機關股票的購買，實際上是一種義務，而所謂國債的購買，實際上

是按月由工資中強迫扣除，所以不論那種儲蓄，不能認為是私人的，或自願的。例如國家借款即是顯明的例子，要經過特種委員會的許可，然後公債才能出賣。儲蓄銀行的存款，在性質上固可以認為私人的，雖則這種款項，存入之後，也經國家當局，作為借款借出。

但有一點很值得可疑的，就是在上述的兩經濟年度中，農民、小商人和職工方面，有沒有純粹的儲蓄呢？因為商業、工業，甚至農業上的私人經營已於一九二八年消滅了，而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〇年春季，應用反對的方法，實際上已把這種經營破壞了，所以在這樣環境下，除了活動資本而外，當然不再有額外的資金。換言之，並不是有一種增加，而是有一種減少。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間大批牛馬的被殺，私商的被摒除，以及私產的不安全，都是使純淨私人儲蓄減少的一些重要因素。

現在我們回頭研究這種社會儲蓄及投資的另一方面。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生產方面每年增加的速度，據官方報告說是百分之二十四，而消費品的供給，則較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二六年為少。這種減少的原因，自然是由於農業上的困難，故其結果，對於人民的食

物不得不作一種定數的分配。但一部分的原因，也由於國家大部分的收入，不用於消費方面，却再用於投資。研究經濟學的學者，常喜歡敘述一個國家把牠的收入逐漸儲蓄用於工業投資所經過的歷程。本來若要精確指出：國家儲蓄逐漸的增多，如何會使消費物反而減少，當然不無困難。說這些資金不用於消費方面而投資於資本建設，當然是可以的，不過這樣說法，實際上並不會解決我們的問題。假若人民所用的消費物較少，而這些資金又以投資的方式用於工業上，則這些資金，除了用以購買現在生產機關的生產品而外，又有什麼用途呢？而這種應用，實際上如何使生產上的客觀因素增加呢？對於這個問題，可答覆如下：即這種過程還轉變一下，把資金投在別的方面，讓一個較長的時期，以待資本物品再生出一種產物，如電氣計劃之類。據說這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利率降低，則這類投資可以把必需的餘利付給所投的資本。工人、燃料、原料這些東西，本可以由一種企業轉借給別種企業用的，現在也就應用於這類長期投資設計中，不再用於自動車工廠及紡織工廠的建設。

這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不是一種適當的過程分析，暫置不論，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這

種過程如何形成，若加以考查，却是很有趣的。第一點，這種過程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因為利率並不是一種策動的重要因素。利益的付給，在蘇維埃經濟固非根本取消，但究竟是不重要的。除了政府公債及數種銀行借款必須付息而外，在蘇維埃經濟上利息這個因素已經完全消滅了。

用於新投資的巨大資本，並非得自高利率，但當局對於如何得到較多的資本有一種成算，至若分配於種種事業上的資本數目，也有一種計算。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及一九二九——三〇年中，大凡可以得到資本的種種門徑，都已由蘇維埃政府想盡了。所以資本的供給，其數目並不是由任何人主觀方面對於現在貨物與將來貨物的損益所決定，不過是大凡可以得到資本的地方，無不搜羅殆盡罷了。及至有了資本，分配於種種事業上時，則視該事業得到結果的遲速而定。一種事業，若要待一百年後才有結果，則資本自然是不付給牠的。這樣一種事業，不論在資本主義經濟下或社會主義經濟下，都不能貢獻一種充分的酬報，以吸引投資。至若遠期貨物的折扣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資本的分配過程

中，也是一種極重要的機能（即使在蘇聯五年計劃的最初兩年，尙未能決定資本分配的限度，這制度也是重要的。）不過事業的利潤，在決定該事業應該接受資金一點上，自然不及其他因素之重要。假若資金是投於輕工業上，（這種工業對於人民消費需要的借給，較爲直接，）其所得的贏餘，應該最大。但他們並不投資於輕工業而投資於重工業，他們並不理睬消費物的不充足。

這種重工業（並非輕工業）建設的決定，係反映着黨的決定，即在可能的範圍內，提早把俄羅斯工業化。在共產黨之間，常有一種爭論，以爲世界各國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之時，在俄羅斯是否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甚至斯塔林派，他們向來雖堅信這樣建設的社會主義確可實現，也承認俄國若始終在農業階段，世界各國仍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這目的是不能實現的。又因爲其他各國似未能立即發生革命，所以決定趁早把俄國工業化起來。

用節省消費物的供給的方法來從事資本建設，即是說人力、建設材料、燃料以及電力

力都應用於重工業上。投資於衣料工業、食物工業及其他直接供給消費物的工業的資金，其數固然也不小，但這類物品的生產，却用其他方法，來加以限制。物品的價格定得高，則這些工業所得的贏餘，便可轉而投資於重工業上。對於消費品徵以重稅，對於重工業的產物則徵以輕稅。生產工具的價格，也由政府規定盡力求低，藉以促進其他工業去採辦資本的設備。就是社會保險的費用，在重工業方面，也定得很低。

至若由外國輸入的資本設備，往往都是用出口貨交換而得；這些生產品的付價，比國內市場的價格，要低得多。在農產品方面就是這樣，例如牛油、雞蛋、蜂蜜，保存的果類，甚至穀物。這些物品在國際市場上所賣的價格，未必較小於國家收買機關所付給的價格。不過實收得的價格，的確較小於在國內市場所能得的數目。大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盧布的國內購買力和國外購買力不同之故，製造品所得的價格，往往比蘇維埃工業的生產費還要少得多。但要想由海外購買資本設備節省消費品而使資本設備增加，還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所以牛油和蜂蜜，差不多是直接用以交換機關拖車和打穀機。而管理資本儲蓄的機關，和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這種機關不同。所以牛油和蜂蜜當然不被人民食用了。假若有兩種股票一種是牛油、蜂蜜、糖果（我們只說蘇維埃出口貨中較有味的東西）的股票，一種是重工業的將來的生產品，我們要一個蘇維埃市民來選擇，那麼他可以毫不猶豫，立即決定採取後者。這種社會儲蓄（與私人儲蓄相對）的增加，頗與資本主義國家中儲蓄之增加由組織之法定所致者相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團主持人歸在贏餘中的數目，常常都比由大多數股東所決定者多，因為主持法團的人，都是收入很多的，他們不必用紅利來應付消費的需要。在蘇聯也是一樣，偉大經濟事業的主持者，都喜歡把較多的資金用於投資方面。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另一方面來研究。投資的數目，除開消極地補償蘇俄工業上的減損和廢棄而外，還有沒有積極的用途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當然是肯定的。當革命之後，有一長時期（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減損的數目比建設的數目大，到現在，自然是工業上投資的數目超過減損和廢棄的數目。關於投資和減損的資料，已表明這種情形，但多數建設中的大事業，才是明證。至若工業以外其他方面的減損，是否不會與這

種新投資一部分相抵，還是問題。大凡熟悉蘇聯城市中房屋缺點的人，即可知道住宅的減損，並不會用新的建設來相抵。不過住宅區的大缺點，多半不由於房屋的陳舊而是由於城市人口逐漸的增多。在實際上，過去數年內，蘇俄房屋的修理，進行很有功效，一九二八、二九、三〇年為工人建造的新住宅，或者可以和城市住宅的減損相抵。

所以蘇聯資本的儲蓄，可總述如下：

(一) 工業上的投資，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至少和戰前一樣多。假若資本的儲蓄照計劃而行，則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工業投資，至少兩倍於戰前的任何一年。

(二) 國家收入專用於投資者，其比例和資本主義國家所用者一樣大。而在大多數情形中，還要更大。假若一九二九——三〇年的統制數字案真的實現了，則國家收入用於投資的比例，將大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三) 儲蓄的大部分都是作為經濟組織的一部分，而私人儲蓄則不甚重要。

(四) 假若資本的儲蓄，是由個人決定或大多數民衆決定，則其數當更大。

(五)資本的儲蓄，乃是由民衆方面極端節省而得。

(六)資本的投下，遠超過於資本的減損。

第四章 農業

在蘇俄，『和平和土地』(Peace and the Land)這一句口號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可使農民擁護共產黨，也判決了帝俄及自由黨的命運，因為他們若得到了農民的擁護，仍然可以獲得權力。共產黨很知道，農民決不會因熱望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統制，而擁護無產階級。所以列寧闡明在馬克思主義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利益是共同的，即創設斯米其加政策 (Policy of smychka)，用以保障共產主義的勝利。人類智力戰勝物質世界的證據，在歷史上再沒有比共產黨的成功還要顯明的了，因為共產黨究竟實在創立了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制度而這種制度的種子，却早已孕育在一位死去很久的德國猶太人哲學家心中，本與一般農民的習慣和希望相反，但共產黨終於把這種制度創立了，而且得到農民的

擁護。

利益共同的政策，即是一個顯明的例子，足以表示列寧的超絕才能，能利用一種機會主義政策，把不能實現的抽象原則都實現了。列寧看得很明白，共產主義若要在俄國成功，必須滿足了農民的土地佔有慾。所以別的黨尚在討論土地給與農民應在某條件下之時，列寧却堅持主張土地應立刻分給農民。土地給與農民的時候，當然聲明土地已成爲國家的財產。但是，幾曾見這一類的話，對於農民發生影響？農民所知道所顧慮的，就只是政府已請他們立刻去領土地。他們也許知道土地是國家的財產，國家將來，也許要收回，但是現在總是農民的，這就行了。於是共產黨遂獲得農民對於革命的擁護。農民懼怕那些圖謀推翻共產黨的團體，會請出舊日的地主，所以他們不願白俄推翻布爾什維克，因此他們這種恐懼，對於白俄的成功，簡直成了無法克制的障礙。農民就不知道社會主義的國家，却和他們土地的佔有慾是相反的。地主最近才被逐出，因而地主的重來是農民所深懼，但是共產黨所說的土地國有，（即土地收歸國有，）倒並不是農民所恐懼。因爲農民對此，並不了解。

在布爾什維克的計劃，假若對於自己的統制有軍事的反對，他們就把土地收歸國有的事暫緩施行。他們只讓農民代他們沒收土地，驅逐地主。

後來一到內戰停止，他們就引導農民組織集團農場，播種與收穫，都採取一種集團的行動。且更進一步，一切大地主的田產和國有土地，都收歸蘇維埃政府直接管理，但這種政策，和國家農場上的農民的願望是相反的。後來因為採取新經濟政策，又因為飢饉的緣故，布爾什維克又把對農民的壓迫取消了，暫緩收土地為國有。農民的叛變也給布爾什維克一種警告，教他們應該放棄他們對於餘穀的奪取政策，暫時讓小規模農場，依照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型去發展。

共產黨在農業戰線上的這種後退，使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的農民政策發生誤解，正如新經濟政策，凡俄羅斯以外的國家，都誤認為社會主義失敗的證明。但事實上，黨對於農民的基本政策，並未改變。所有共產黨都一致承認農業終有一天要集團化，土地總應該收歸國有。至若這種農業集團化和土地收歸國有，應該在什麼時候實行，又採何步驟，共產黨之

間意見當然各有不同。不過現在有一點似乎很明白，就是農民反抗集團化、國家化的力量向來都認爲很大，其實這種估計是過分的。俄羅斯農民的勢力，乃是一種靜止的勢力，固然極其偉大重要，但都是偏於消極方面。農民並不能做出什麼有組織的建設計劃，或爲這種計劃作一種有力的奮鬥。當白俄和布爾什維克爭鬥時，農民的擁護，普通都偏於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其維一的原因，就在他們對於土地的貪婪，而土地原來的所有者，正是現在白軍的領袖。農民的擁護，雖然可以擊敗白俄，而助長布爾什維克。但及至布爾什維克一經推翻，白俄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數年內，恢復了內戰的損失，這時候農民便無力去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早就內定了的土地收歸國有及集團化的政策，正和他們從前不能反對帝俄時代地主的壓迫或俄大帝的暴政一樣。假若當局施以壓迫，到不能忍耐的時候，農民也會興起，做出野蠻的殘暴行爲，但一個決然的政府，常能把這種暴動，用流血的方法解決，或暫時作一種相當的讓步，使暴動安靜下去，或兩種方法兼用。大凡從中央亞細亞沙漠中來的韃靼族，俄皇時代的地主，以及來自城市的無產階級，三者都是要他們的命的東西。俄國的農民對

這三種東西，早就沒有好意，沒有希望。所以他們想吃便吃，想醉便醉，并且多生子女，讓他們去受自然的冷酷的憐惜。

共產黨對於農民的了解，沒有任何人能及得上。他們沒有託爾斯泰那種情感的幻象。他們對農民常說，農工的利益是共同的呀，但他們決不隱諱蘇維埃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有時誤認無產階級專政只在推翻資本階級。這種誤解，全無根據。例如列寧和斯大林的公開著作，即在闡明專政也對農民而發。

在共產黨的意思，永遠不承認農民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永久的原素。他們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若農民始終是一個大階級，社會主義國家便永無存在的可能。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乃是一個無階級的國家，在這種國家中，只有工人一種階級，這種工人已經完全失去了農民的心理。共產黨也毫不隱瞞，公然宣稱：他們決定要把農民轉變為無產階級。實言之，就是共產黨公然要把農民這個階級消滅，正如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間消滅富農階級一樣。在這個時候，固然用共同利益的話來和緩農民的心理，但這種共同利益的暫時性。

是很顯明的。

所以在土地尚未能收歸國有的時候，不得不有一種暫時的方法來利用土地，而這種方法又須有法律的根據。但蘇維埃政府整頓領有地（這些土地係得自以前的地主）的辦法時，却感受許多困難。因為大凡居住地點靠近大的所有地的農民，都可以得到較多的土地，而不願意和那些產業不足的農民共有土地。再則較富的農民，早已有較多的土地，也是一個問題。對待這些農民，也應該和對待以前的地主一樣，把他們的土地剝奪了，變做大家公有的土地嗎？分圖耕作制度 *strip farming system* 應該繼續存在嗎？或者土地的領有應該集中嗎？問題更其困難的，就是農民整個的耕作制度，很為共產黨所嫌惡。因為在共產黨的意思，農業上的個人作業除了作為臨時辦法外，是完全不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成立的。

不過領有土地的問題，終久漸漸得到一個比較可以普遍應用的解決辦法了。即土地的分配，完全按照需要來決定，而且把這個原則各處強迫實施。在一村中，每一家領有土地

的分量，係決定該家靠土地生產物爲生的人口數目，假若一個富農所有的土地的分量超過此數，便奪取其一部，使與同村中他人所有者相等。此外也奪取富農多餘的財產分給貧農。這與從前地主不同的地方，只在富農尙可保持與他人一樣多的土地，而地主則失去他所有的一切。不過著者知道有些地主，因爲不會反對過蘇維埃的統制，並願意自己耕作土地，仍可獲得同樣分量的土地。至若以前地主所有的家畜及其他財產，多被鄰居的農民取去。地主的房屋，則用做一村的圖書館、俱樂部或其他公共地場。農民若要放火把地主的房屋燒燬，也爲政府所允許，不過要建築一種公用的場所以爲代替。至若對於鄉村土地分配後的考查，也雷厲風行，俾分裂的土地得以集中，使每個人所有的土地成爲整個的。農民土地的私有，雖經過這些手續，認爲合法，但在理論上仍認爲是國家的產業，買賣是絕對禁止的。相當限度的地租，也在政府允許範圍之內，不過有兩個條件，一則用以補助有土地而不能耕種的人的收入，二則增加穀類的收穫，使富農得耕種較多的土地。這類農民也得僱用傭工。

新經濟政策上有一個重要的決定，即政府不再向農民索取超過他自己所需用的最低限度的餘穀。向農民索取餘穀，乃是軍事共產主義最黑暗的一種政策，政府雖給與代價，但數目過少，實際也等於奪取。現在是已採用一種固定的土地稅來代替餘穀索取。農民得隨意把他們的餘穀在私人市場上出賣。

所以這種小規模農業制度的基本大綱，頗與德法及西歐各國的農業制度相似。可見歷史似乎是會自己反覆的，俄國的農民，一得到了土地，就不願意再擁護革命，彷彿法國大革命時代一樣。共產黨看着農民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逐漸發生，極爲煩惱。托羅斯基派就非常對黨警告，要小心富農中權力和財產的發生，且說這種階級，假若在國家經濟上獲得了穩固的立脚地，社會主義就絕對不會成功了。共產黨對於獨立的保守的農民階級的產生懷着一種恐怖，這健全的農業制度，終久難於建立起來。

共產黨防止農民資產階級發生的主要方法，是在鄉村中鼓動階級爭鬥，他們爲確定鄉村中發生階級爭鬥起見，便把每個農民都登記起來，或爲富農，或爲中農，或爲貧農。所謂

富農，在理論上，是僱用勞動的農民，所以是一個剝奪者。不過這種分別的根據，也只是理論的。在許多鄉村中，實際上並沒有僱用勞動的農民，也沒有放借，或出借穀種耕畜的農民。（這一切都認為是富農做的。）在這類情形中，該村也許報告說村中並沒有富農。不過這樣一種情形是不行的。假若沒有富農，鄉村中如何會發生階級爭鬥呢？村中若沒有階級爭鬥發生，小資產階級意識的發生又如何能防止呢？所以在大多情形中，都由政府命令，強迫指定某些家是富農。這種事是由村蘇維埃和村中窮人委員會來做。這樣，鄉村中一些可憐的人便被打上富農的印子，此後則徵以極重的稅，選舉權也被剝奪，不得把他們的子女送入初級小學以外的學校。最後非至全部破產不止。有些地方當局，自然很願指定某些家是富農。這是排除怨恨的一種方法。但有一件事很確實的，即被指定為富農的普通家庭，並不是共產黨所設想的那種富農階級。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剝奪者，假若他們從前曾經是富農，但受過這樣被指摘的厄運後，現在已經不是了。一個人若已經把認為富農階級所特有的一切捨棄之後，當然可不致再被指定為富農，所以若再被指定，當然是不願意的。但因為有許

多鄉村苦於不易尋出一家可以指爲富農階級，所以不論何人，若在從前，甚至革命以前，曾經僱過傭工，或放過款，或出貸過其他東西，或其生活較普通農民優裕時，便即刻被村中的官吏綁起來，用來滿足其無產階級統治者的那種無可理喻的暴虐欲望。著者旅行中，曾到過一村，親見窮人委員會的地方主席發表一家是富農階級，其態度是很兇惡的。他說村中的一切糾紛，都由村民被分爲三個階級的時候起。及至問何以這一家被指定爲富農階級，他答覆說，因爲他家有一個人從前是富農，他家曾開過一月茶館。他又說，他們現在雖已不再開茶館，並設法消失牠富農的地位，但仍得認爲富農。當開會時，這一家族也都在場，確認委員會主席的話是對的。他們失去了選舉權，他們的子女不得入學校，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都用來繳稅，他們被認爲蘇維埃國家的仇敵。後來著者問，要經過多少時間，這一家人才可以消失富農的地位，他們答，據說要五年。委員會主席又說，他不知道在五年內能不能失去。他當然想到這家人消失富農的資格時，又找誰來做富農呢？

在實際上，因爲人民中可稱爲剝削者的人數極有限，所以大凡有兩牛兩馬的，或較一

般農民稍好點的，都被認為富農階級。事實上，所謂富農、中農是無法劃分，就是中農與貧農，也不能劃分。俄國普通的鄉村，都是極窮的，所以假若由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來劃分階級，必定把個人都認為貧農，毫無例外。一個人應該歸在哪一類，大半是鄉村政治的事。所以鄉村中若有一個有力的共產黨團體，則仇恨共產主義的人，一定都被指定為富農。曾經有一個農民，在革命以前，僱過二十五個人代他趕馬車，當然是所謂的富農階級了，可是終歸被指定為貧農，原因就在他的兩個兒子是共產黨，一個是紅軍中的軍官，一個是青年共產黨。中農都常常發出不平之鳴，說他們的鄰人，所有的馬或牛比他多，却被認為貧農，而他倒被認為中農。貧農是一切人所最希望的地位，因為他們終久可以免除一切農業稅。

但不論共產黨如何在鄉村中煽動階級爭鬥，農民一般的傾向，仍保持着「一種聯合戰線」，以對付城市無產階級。農民覺得他們的生產品的賣價，和製造品的賣價相較，太不公平，因此感覺很大的憂慮。一個農民對著者說：『在戰前，一袋番薯的賣價，和我現在所得的一樣。但現在我若要買一雙靴子，我必得要賣出兩倍的番薯，可是這種靴子，請你看看。』說着

他伸出他的一隻腳，穿着一隻不成樣的破皮靴，又說：『在戰前我買的皮靴，可以勝過這種靴子三雙呢。』

這種『剪刀的運用』即是農民的一種主要怨恨。所謂剪刀 (scissors)，是指革命後農產物的售價和工業品的售價的懸隔而言。依據蘇維埃統計，這種懸隔，雖已在一九二九年相接。例如一九一三年的物價爲一〇〇，則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中農產品物價的指數便爲一七〇・三，製造品爲一八七・四。不過農民對於所謂物價指數是不了解的，他們說，實際上這種懸隔是很難接近。本來這些指數，也並不表示農產品和製造品的實際的價格關係，因爲這些數目，大半是根據於國家商店及合作商店中所規定的價格。而這類價格，對於農民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爲他們所購的製造品，大部分是得自私商。私商消滅以後，照理我們當然可以說，根據國家所指定的物價所得的指數，確係代表真正的物價了，但我們不能就用這類指數去證明農民的價格地位已經改進。鄉村適用的工業品的存貨，往往爲數極少，又因排除私商之故，爲數尤少。所以農民仍倖倖然以爲他的購買力減退，而

責備政府應負全責。

農民向來還持着一種思想以為他們若一獲得地主的土地，他們的生活就可以很舒適。誰知政府分給他們的土地分量，並不能滿足農民對於土地的欲望。以前地主所有的土地，在革命以前大多數都由農民租佃。宣傳的標語說，農民每年可以免除三五〇百萬盧布的田租負擔，以後使用這種土地，可不用再付田租。但事實上，農民可用的土地是減少了，從前地主一部分的田產，都歸國家所有。

在一九一七年（適在革命前），農民所有的土地，約佔可耕地百分之六十八。其餘為地主、教會及國家所有。在一九二七年，農民所有地為百分之八十九。所以在農民手中的土地，其比例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從一九一四年起到一九二七年末，人口增加了一萬三千八百萬，以至一萬五千萬。因為人口這樣增加，而土地又分配給以前毫無土地的農民，所以農民的數目，由一千六百萬（革命以前）增加到二千五百萬（一九二八年）。因此農民所有的土地面積，便極其狹小。我們若把一九二七年蘇聯農場耕地面積的總數，和同年

農場的總數一加比較，便可見這種情形。耕地面積的總數達一萬一千萬公頃（*Hectares*）所以每農場耕地的平均面積，不過四·四公頃。

農民也曾希望帝俄政府推翻後，租稅可以消滅。但後來發見一種可悲的事實，就是政府都靠田稅維持。而蘇維埃政府也不是例外。貧農雖免除負擔，但估農民大多數的中農負擔却加重了。

農民不滿意的狀況，便開始表現在可以上市的穀類的分量的驟減。農民既無力購買機器或人工肥田機，結果便是農業生產的標準降低。一個國家農場的經理，告訴著者說，一九二四年，他在北高加索的某一區中旅行，想考查有沒有一部打穀機。他在大戰以前，在這個向來產穀極豐富的地方，確實發見過一百架的機器。不過他看見現在其中只有五架可以修理使用。因為從前大土地現在已分割為小塊的土地，當然沒有人能用大規模的機器在小土地上耕作。至若政府所設的農業合作社，也無法補救這種情形。至若大土地上生產的技術，自然較一般農民的土地生產法更好一些。有田產的人，常常都僱用極有訓練的德

國人代他們管理田產，所以生產力也比一般小農爲高。

以上種種事件的結果，便是戰前俄國每年總有大批穀米出口，而戰後完全沒有。這對於共產黨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們知道，要在俄國這種農業性極大的地方建設社會主義，本是非常困難，但他們卻不曾想到食物的長期的缺乏也是困難之一。一九二一年的飢饉，他們認爲是內戰破壞及氣候異常的結果，他們却料不到，在平常狀態之下，飢饉也會發生的。蘇維埃政府只想再把穀類輸出，以爲進口機器的交換，然後他們可以把國家工業化，促進俄羅斯的文化。他們現在看見這種希望不能實現，感覺非常痛苦。

鄉村的情形，一年不如一年。製造和貿易着實實在的在進步，而農業狀況却逐漸在變壞。最後到了一九二八年，即使沒有很壞的天氣，那穀類的輸出也完全不可能，更進那穀類蓄積的總數也降低，不得不仰給外國米的輸入，而採用領口糧的辦法。這對於黨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使牠國外的名譽大爲掃地，因爲穀類出口既已絕跡，而蘇維埃統制十年，食物反而減少，乃至不得不採用分配辦法，這些事實都是不能隱藏。很有趣的，就是蘇維埃統計者，

對於這種穀類供給的低落情形，並不予以適當的解釋。據蘇維埃統計說，一九二九年蘇聯已耕土地面積，已差不多等於戰前。蘇維埃統計家很願意承認生產力的低落，乃是由於把大田地化爲小田地。因爲共產黨的學說，常常都主張大規模的農業，所以即使自認這種低落，也並不以爲大失面子。但由大的地產所產的穀類，在市場上出售分量的減少，並不足以說明戰前戰後的穀類出口的相差。因此政府便說農民食用他們自己的生產品，革命後較革命前多，因爲革命以後，他們已不必再付田租給地主，并且一般農民所有的土地面積，較以前增加。但共產黨對於這種出乎意外的不幸，仍想要用一種人爲的惡魔來解釋。這個惡魔，就在富農階級中發見，他們說這種惡禍，就是因爲富農把穀類收買，壟積起來，不在市場上出售，或者是製爲酒類，以免按照政府所定的價格出售，所以便發生了這種惡禍。

當然，富農也和其他農民一樣，不願按照政府所定的價格，把穀類賣給政府的穀類收買者，可是若說農民食用他自己的產品，戰後較戰前爲多，這話絕對不通。除了狂熱的共產黨外，誰也不會相信。若問農民是否戰後所食較戰前爲多，他們對於這種問題，總是持一種

開玩笑的態度來答覆。現在的蘇俄農民，是比以前聰明得多了，因為習慣和政策的關係，他們對於所處的境況較好較壞，他們也會申訴了，所以對於這類直接詢問的答覆，我們固不能全信。不過全俄各階級所供給的實據和我們眼見的證據却是不能否認的。一九二九年正是開始集團化的大運動時代，那時農民的地位，確實不會較好於革命以前，也許較壞。照黨的決定，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決不應在蘇俄發展。然而爲了防止這種發展起見，結果却使國家的農業經濟大爲困難，所以只有立即把政策改變，才能防止遲早要發生的大飢饉。

其實政府若不採用防止的方法，所謂富農階級是否就會大發展，以致危及社會主義的建設，確是一個大問題。著者以爲所謂富農階級的危險，大部分是想像的。按土地法的規定，任何東西的集蓄，不能超過一個人所有的正常土地數量以外。其實這個法則，就足以使富農階級無發展的餘地。但不論共產黨的恐懼是否合理，資產階級農民的惡魔，確使在農民個人領有土地制度之下，不能有充分穀類以養活大眾。

一九二八年穀類收穫之少，出乎意外，不得不採用口糧分配法，結果關於農業的危機，

也不得不採取相當的辦法。而黨內部意見的發生，即由於這個問題。至若從前因左派反對所起的黨內糾紛（其中也包含黨的農業政策）更因為有這種新衝突發生，一時難於止歇。結果是斯大林戰勝了托羅斯基，說左派的反對派實在是一個失敗的反對派，因為他們雖然用左派的名詞來誇張，實在是右傾的。國外的觀察者，則認斯大林的這種爭論不過是一種策略，而且自左派失敗以後，即以爲黨中勝利者根本上只是右派。因為斯大林和托羅斯基爭鬥時，黨的右派實際上是擁護斯大林，所以這種誤解更甚。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斯大林還比左派更進一步，可說是強硬共產主義的戰士。斯大林當然很願意有一種機會使他得訓練右派，像他排擠左派一樣。後來果然有這一種機會來到了，這就是關於農業危機的問題。

布哈林、里果夫（Bykov）托木斯基（Tomsky）所領導的右派，是主張取消對於農民的限制，尤其是對於富農。他們把飢饉的教訓和列寧採取新經濟政策這兩件事牢記在心。他們主張工業化可以緩和一點，使輕工業得有發展的機會，消費品多進口一些。這樣，製

造品的缺少可以和緩，農民賣出農產品後所得到的金錢的購買力，可以增高，農民也得擴張其耕地，增加土地的一般生產力。但對於這種政策，斯太林是毅然反對的，他以為這不啻是對富農階級的一種屈服。他說這種政策一經實行，革命的命運便完了。反之他主張國家的工業化應該加速進行。則貨物的飢荒便可免除，（雖然不很快。）要應付食物的危機，只有對富農階級採取更嚴厲的方法，強迫他們把囤積的穀米繳出來。從一個較永久的觀點來看，要解決農業問題，只有採用小農場集團化的方法及近代大規模的生產方法，然後土地的生產力自然大為增加。

黨部方面很明白俄國農業逐漸的衰落，會危及蘇聯國家經濟的基礎。在斯太林派眼光中，農場集團化，是挽救蘇俄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他們知道要使農民集團化，當然感受極大的困難。但黨中除右派而外，都不仔細考慮一下，蘇俄的農業集團化，在經濟方面，是否就可以代替農民農業的制度。所以把社會化的農業當做黨的政策，他們全是情感用事。殊不知其經濟上的困難和可能，必須經過實際的實驗，然後才能發見。

舊派的經濟學者警告黨說，若要立即施行農業集團化，則許多困難無法解決。一個經濟學家說：『若真要把俄國的農業合理化，機器化，則現在的人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要被放逐。因為他們無工可作。大規模的生產方法完全採用後，這些人民便要失業了。』這位經濟學家是要我們注意俄國並沒有許多未耕的土地。實際上，我們前面說過，就在把全數地主所有的地產奪取之後，每一個農民所有的土地還是極少。在俄國，已經沒有可以耕種的土地了，所餘留的只是荒地，尙待機器的開墾。所以農業實行合理化和機械化時，同時就要發展工業，否則失其舊業的農民便將無職可就了。

共產黨也被經濟學家警告說，農民乃是一種個人主義者，天性是懶惰的，若不受着飢餓的直接刺激，絕不會工作。農民若是知道他所生產的東西要被大家分取，則他只願分取別人所生產的，而他自己却不工作。

不過黨中主張農場集團化的人，對於這些說法，並不承認。他指出那兩個困難，其影響並不是積累性的。機器化的大農場單位，若需要更多數的農民，那麼，農民工作的集約，並不

十分重要。按照黨的工業化計劃，工業擴張以後，其所有失業的農民都被吸收。再者，黨所最注意的，只是一個問題，即『社會化的農業可以生產較多的食物嗎？』在共產黨的主張，假若生產的食物較多，則在共產黨分配制度之下，每個人所得的食物還可以更多。假若農民有一個時期懶惰，這種弊病，有時是可以補救的，但現在最切迫的食物問題不得不設法解決。共產黨說，現在農民粗劣而浪費的生產方法，遠不及現代的農業生產方法，所以農場集團化以後，生產量一定會大大增加。批評的人又說，生產增加，成本也隨而加大，因此農民不得不過照舊的生活，但較進步的新機器的成本，只成爲一種附加的耗費。他們說，蘇維埃工業過去所以能夠存在，就全靠把生產品以高價賣給農民，且向農民抽收稅捐。假若食物生產品的成本大爲增加，而國家又不再向農民抽稅，則整個的經濟組織便要崩潰。對於這種批評，共產黨答覆說，就是關於私人貿易方面，也曾有過一種相似的說法。以前曾有人說過，國家的貿易和工業，全是靠剝削私人貿易來維持。可是私人貿易早已被消滅了，並沒發生所預言的可怕的結果。再共產黨又說，所有關於成本的說法，大都是巧辯。假若有物品產生

出來，不論耗費若何，當然用來消費。在最初耗費也許很大，但將來生產的機器改進時，確實可以降低。雖然製造品的耗費仍然很高，但比較早年國家工業生產開始進行時，已經低得多了。

共產黨常常都引美國作最後的有力的論據。在美國，機械化的農業已發展到最高程度。美國農場生產力之偉大是不能否認的。可是在事實上，一般人關於美國農業所有的印象，都極其錯誤。一般的俄人，都堅決相信美國所有的農場都是面積極大的。他們以為一切工作實際上都用機器來做，在美國農場上，馬差不多完全不見。大凡俄國農業合作社的領袖，大半都持這種觀念。所以結果，一般都承認每一個集團農場都應該有充分的機器。

這種對於機器的小孩樣的要求可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集團農場為例來解釋，這是俄國一個最老的農場。在這個農場上，耕地有四百畝，有三部機器拖車，兩部填地器，及其他許多機器。這些機器，都是前一年借了三萬二千盧布購置的。除了這種機器財產而外，還有八十個人從事正常的農作。但我們還應該說，這個農場還有一百二十頭牛，牛乳出賣在莫

斯科，所以所需要的工人，比僅出產穀米的農場所需者多。然而在美國方面，若有這樣大的農場，所僱用的工人至少十倍於此，所用的機器，至少兩倍。

反對集團化的人，即根據這些例子，證明集團農場上生產的耗費，必大於現在政府付給農民個人所出產的穀米的定價。但是這一切慎重的辯證，斯太林置之不問。擁護他的人，也說用集團化的猛烈方法，可以防止飢饉的危險，同時也可以消滅那些妨礙國家社會化的非社會化的農民。

斯太林對於反對他的人，斥之為「右派機會主義者」。他反對托羅斯基時，所持的最有力的辯證，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成功，若要依賴世界革命，不啻宣告建立俄國社會主義的積極方法，已經絕望。他反對右派，也用相似的手段。斯太林說：布哈林、里果夫、托木斯基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已失去了對於革命的信仰。他們的政策，已經很危險的離開了「黨」的一般路線。」這些「右派清算者」的理論非否認不可。

斯太林對於左派反對派反對他的政策，也有法子戰勝他們。（其實他的政策，有幾方

面，實更近於左派。）布哈林、里果夫、托木斯基等人，雖然黨報已決定對他們加以嚴格的懲罰（因為他們反對『黨的一般路線』之故），但他們仍不顧一切，繼續反對斯太林的政策。及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黨部委員會發出一個嚴重的警告，假若他們仍然繼續反對，中央即要懲戒他們。因此他們即刻公開悔過，斯太林顯然得到了完全的勝利。

其實在右派未失敗以前，用來實現集團化的組織方式，早已決定。為實現土地的社會化起見，組織的方式，係採用集團經濟（Collective economy），而不採用蘇維埃經濟（soviet economy）。本來蘇維埃經濟應該是較理想的組織，但為環境所迫，故不得不依賴集團農場。國家農場（即蘇維埃經濟）是一個農場，由一個任命的經理僱工人經營。就在理論上，正與國立工廠一樣，已不復被工人所管理。生產穀類的國家農場，蘇俄都稱為『穀類工廠』。國家農場是在國家農場中心一般管理之下。他們也許在穀類託辣斯，全聯牛乳牛油託辣斯，消費合作批發社或自主共和國的農業委員會管理之下，不過沒有在國家農場合作社的管理之下的。不論農場所生產的是穀類、牛油、牛奶、或果類，都是如此。

反之，集團農場在理論上完全是一種合作制度。普通分爲三類：其最簡單者稱爲同志農場（tovarishchestvo or Comradship）。土地由大家共同耕種，但耕地的家畜，能生產的家畜及其他財產，仍爲私人所有。這種農場，已日漸消滅，蘇維埃當局不過把牠當做達到合作農場的過渡形式看待。

在合作農場上，不但土地共同耕種，就是一切耕作動物和生產動物也是集團化。這不但是最普通的形式，而且是現在的標準形式。當初實行農業集團化的時候，是希望一切集團農場都有機關拖車的設備。可是因爲土地集團化的進行太快，來不及有這種設備。這種拖車既然缺乏，再加以農民對於家畜盛行殺戮，所以不得不着重於耕作的家畜，且強迫每一個農民都要負責把他所有的耕作家畜帶到集團農場來。在這種農場中，照例都定有日薪，付給農場的會員，作爲一種墊款，俟將來收穫出售後，再行繳還。合作農場雖常常感覺資金缺乏，沒有可以作爲墊款的，不過農業合作中心和農業信用合作社可以相當地解決這個問題。合作中心把墊款給與該種農場，同時又訂立農產品的契約。

對於這種工資，農民常常都希望多得，但管理部却極端拒絕。到了收穫年的年終，就把農場的贏餘加以計算。各會員所分得的贏餘，須扣除以前所領的墊款。不過農民對於這件事當然是很懷疑。因為實際上也許沒有贏餘，甚至虧欠。但貸借對照表對於農民是無用的，因為農民對之毫不注意。假若他得過了工資，他也許化費了，而且把購買品都消費了。只有讓最有本領的會計官才能把錢設法弄回！

農民因為參加合作社的經驗，知道紙上的贏餘，與分配給他們的贏餘是兩件事。蘇維埃的合作社，是不把贏餘分給社員的。農民知道那些贏餘，也許用做資本的擴充。就是說，也許蓋一個穀倉，或買一對新的拖車，但是農民所需要的，乃是更多的食物，較好的靴子，更多的酒。農民對於贏餘的分配，既然非常懷疑，所以政府就把贏餘確已分過的事情發表出來。據報紙發表，有一個農場，每年分給各社員的贏餘，各得七百盧布。

第三種農場稱為共產農場(Commune)。所不同於第二種農場者；這是一種更進步的集團農場。在這種農場中，個人所有的一切，實際上都歸公有。房屋、花園、家畜都是公有的財

產。若是可能的話，社員都居住在公共房子中，兒童也在公共保母室中養育，飲食也在公共食堂中。甚至工作時穿着的衣服也由公共置辦，所以也不大需要金錢的工資，即使付給，爲數也是很少。

這三種農場的分別，本來不過是抽象的，在實際上，尙有種種漸進的等級。組織的形式，亦因地方的情形及農場生產品的種類而各不相同。在大城市附近居住的農民，通常都是養牛兼種蔬菜，有時也放馬爲生。假若集團農場中，有些社員受僱於人而工作，而其餘的人，只做農場上的工作，那麼，他們的收入如何可以呢？在莫斯科區的辦法，是集團農場的社員，若用他們的馬在農場外工作，每天可由集團農場得一盧布，但他們在外所得的收入則歸入集團農場的財庫中。不過因爲他們從前每天可得十盧布，現在却只得一盧布，他們當然是大不滿意。所以結果下了一個命令，大凡農場收受農民在集團農場外所得的工資，應該有一個嚴格的限度。可是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而關於農民在農事上所做的季工，尤難解決。實行偉大的工業建設計劃時，所以難得到充分的工人，卽由於此。

集團農場的面積，大小不同，有的不過幾公頃，最多可到五萬公頃。當一九二九——三〇年冬季實行『高壓』組織方法時，蘇維埃政府曾有一種野心，造成極廣大的集團農場。他們的理想似乎是說，要大量的生產，生產的單位應該越大越好。這樣一種偉大而倉促組織的農業事業，自然是極不經濟。雖然報紙先前很高興的贊同這種偉大農場的形成，但當局不久也就覺得單靠熱情，去實施農業的最大單位，實在是很危險。但較小的集團農場，倒是不断地消滅着而合併為較大的農場；似乎到了春耕季，改組的過程才仍繼續進行。所以對於這種運動，也決定暫時中止，而以前報紙的批評，也證明不對了。

集團農場的管理部，在理論上是由社員中選出。但管理部普通都是包含三個或四個董事而以其中一人為主席。實際上，經理都是自城市派出來的工人。但也並非全部都是這樣。即使一個工人由城市派來，選舉的方式仍然舉行。黨部的方案，仍盡量使用，貧農往往在地方黨員指導之下，組織起來。集團農場中的反對分子，也加以肅清，庶使從前選出的候補者可以當選為經理。集團農場中心和農業委員會，常有命令發出，指示適當的農業組織及

正當的合作原理，俾集團農場制度可日趨於標準化。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集團農場和國家農場，在管理方法上並沒有多大差異。所謂集團農場，實在不是西歐的那種合作組織。

黨爲實行收土地歸國有起見，不得不多依賴集團農場（而少依賴國家農場）因爲除此以外，實無法把土地從農民手中取回。若單是採直截了當的方法，把土地從農民手中奪回，併在國家農場上，這全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經過集團農場的制度，農民對於土地的佔有慾望，才會漸漸失去，主辦集團農場的人說，集團農場所不同於國家農場之處，即在集團農場制度是從底來管理，而國家農場制度則由頂來管理。不過集團農場的中心的官吏，乃是由集團農場的農民社員中選舉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集團農場的組織形式漸近於國家農場，最後二者的區別也將會消失。

但是到了所希望的集團化的結果實現時，就發生食物的危機。在先政府對於一九二九年的收穫，本有一個希望極大的集穀計劃。不但所要收集的分量極大，而且要在十二月

完成。可是集穀結果的第一個報告，却大爲失望。雖然所得的分量比上年同時期較多，可是計劃並未達到。因此遂採用較嚴重的方法。每一共和國，一省一縣，一區一鄉，都放置一份計劃。命令要完成這個計劃。所有政府的力量，同業公會，合作社以及黨部一齊動員；大凡可以想得到的壓迫，都施諸農民，強迫農民放棄他們所計劃的穀量。農民不能在他所高興的地方，出售穀類。鄉村消費合作社賣給農民的貨物，要農民用穀類來交換，或須表明他們必須把穀類賣給政府的收買者。農民若把他的穀類送到鄉村中私人市場上銷售，便被政府沒收。在許多區域，到最後才決定農民亦得留下最少數的穀類供他自己應用，其餘則依官定的價格賣給政府的收買者。有時，農民應交給政府的穀類分量，係視農民穀倉的分量而定。不過農民也許把他們的穀藏起來。所以在別的區域，在未收穫時，就在田中加以考查，估計可以得多少穀類。所以又把一份計劃交給政府收買者。據德國移民報告著者說，政府派到鄉村中的第一個農業專家，因爲估計田中穀的收穫過低，致被政府監禁。所以第二個估計員所估計者，便兩倍於初次數量。所以結果，農民無法按照政府所派給他們的分量照數

繳納。爲服從命令起見，他們有時不得不以十倍於官定的價格，在私人市場上購買穀類繳納政府。其不能照數繳納者，則處以罰金，有時，把他們的家畜、房屋，甚至家具出賣以充罰款。有一個農民就是遇見這種情形，自動認爲一個富農，成爲蘇維埃的仇敵。在這樣一種情形中，就是他自己的兒子也不能請他回來給他房子住。

城市中的工人糾察隊，青年共產黨都一齊出動，來共同作壓迫反抗的農民，並偵察囤積穀米的農民。而貧農所受的待遇，普通都較中農或富農所受的待遇好，意在增加鄉村中的階級爭鬥；並收得貧農的歡心，以便貧農會同用壓迫的手段收集穀類。

這種壓迫的結果，農民的精神，因之破壞。自從軍事共產主義期間徵發政策失敗之後，對於農民固執的反抗勢力，也引起相當的畏懼，所以重複採取徵發政策，也需很多的勇氣。在以前農民覺得政府是來恐嚇他們，絕不敢用以前那種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可是現在農民却知道，共產黨並不因農民反抗的恐嚇而畏懼。農民的失望雖不可遏止，但他們縱然怨恨恐懼，也毫無用處。所以穀物的收集終於成功。到了預定時期，據蘇維埃統計家說，

也達到原定計劃的百分之一〇二。國家的穀倉都非常充實，甚至還有一部分輸出外國。不過食物仍採取口糧分配的方法，所以到了該年的冬天，食物的情形更壞。（其理由後面解釋）

集穀運動的成功，對於集團化的進步，自然有一種出乎意外的促進。當進行集穀運動時，關於集團化就作一種努力的宣傳。而集穀方面成功的方法，也能強迫農民加入集團農場。當集穀的結果發表時，斯大林派在黨中的歡喜簡直是無限。右派所預言的飢饉和失敗，已證明是錯誤了。所以政府決定再把集團化的運動努力推進。爲使鄉村中的共產黨團體更加強硬起見，又從工廠中招集了兩萬五千個自願工人，從事指導集團農場。這些人，蘇俄報紙都譽爲犧牲自我的無產階級，自願到鄉村中協助。但農民看他們又另持一種眼光。農民都認他們是一種寄生蟲，靠農民以爲生，而且是壓迫農民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在一個鄉村中，農民知道這些集團化委員要到，就說：『假若他們是機器，能修理機關拖車，倒是很好。但是，假若他們是政治組織人員，我們是不需要他們的。』

出乎意想之外的，就是農民雖然頑固，雖然覺得他們無助，可是集團化的發展，意外迅速。我們若問農民是否願意加入集團農場，他們的答覆總是一樣，他們說：『在集團農場中，懶人和勤快人所分得的生產品是一樣。但上帝創造人類，彼此不同。人類在能力上也彼此不等。森林中的樹林彼此的高度也不相等。所以把我們化為同一等級實在錯誤。』這種答覆，差不多是刻板的，著者個人聽見過多次。有時農民申訴說，他們是被逼迫到農場去的，然而他們無法抵抗。『假若另外還有戰爭，他們一定要把兵器放在我們手中。假若我們農民一旦得到武器，我們一定要推翻蘇維埃的統制。』這也是受困的農民所常常發出的呼聲。

至若富農，對於農場集團化也是極端反對。他們且被大多數的中農，甚至貧農所聯絡，共同反對農業集團化。富農覺得他們反對集團化，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損失。他們總是無賴之人。他們沒有加入集團農場的權利，假若集團化的運動成功，他們預料他們一定要消滅。所以他們用種種方法反對集團化的進展，普通的則散布無稽的謠言，甚者則焚燒集團農場，暗殺地方上的委員。所散布的謠言，有些不惟奇怪，而且很有趣。

有時富農也混入集團農場中，爲驅除這些討厭的富農起見，就把那種所謂「其卡」(Chiska)或「肅清」(Cleaning)的制度，由城市移到鄉村中。集團農場舉行一個大集會，所有的會員一齊出席。此外尚有來自城市的工人，鄉村中的共產黨，地方政治警察部的代表。然後考查其中是否有富農出席。這種肅清的手續非常殘忍，對於被檢舉者則問以極難的問題或者直接告發。不過有時也很有趣，例如在土耳其斯坦所舉行的肅清會，由莫斯科派來經理農場的一個工人，提出一些問題，要兩個本地的農民答覆。一個問題是「社會主義是什麼？」一個問題是問「達爾文是何時生的？」

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冬天，集團化的發展仍是逐漸進步。富農的反對方法，是殺戮他們自己的家畜，并勸誘其他農民的效尤。果然他們得到很大的成功，由十月到二月，蘇聯的羊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豬的數目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八，因爲農民覺得，他們所有的一切，終歸是要歸入集團農場的，所以他們想在歸入以前，設法盡量出售或消費掉，還覺得合算。因此，在某一區，殺家畜的宣傳散布得很廣，肉料一時無處購買，最後以致全俄的肉類供

給也感缺乏。口糧中的肉類分配量突然減少，即反映這種情形。至若政府方面的處理方法，則是對殺戮者處以極重的刑罰，並把所有的家畜概予登記，各個人對於他自己的家畜應負全責，果然後來大批殺戮的事情遂消滅了。

農民的世界，正在他們周圍崩潰着。農民快失去了他們的世界。就是比較富足的農民，也格外感受壓迫。農民個人將來似乎是沒有希望。著者常常聽見農民說，他們寧肯早死，不願加入集團農場。對於將來既然毫無希望，所以農民都喜歡貶價售賣他們的所有物，逃離本鄉，希望尋找較好的地方。據說在這個期間，在克里米亞（Crimée）地方，二十盧布就可買一匹好馬。富農甚至把他們的馬殺死，怕被奪加入集團農場中。這種恐懼很有根據。

一九二九年初，開始把全俄所有的德國移民全數遷徙到莫斯科，希望他們離開俄國到別國去，所以從西伯利亞、烏克蘭等地來到莫斯科的德國農民，有數萬之多，暫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夏季用的草舍中，等待護照回國。著者曾到過一個草舍中參觀過，見小小一間草舍，不過四間屋子，却住着四十個男人、女人和小孩。他們說遇必要時，他們寧願死在莫斯科，

不願回到西伯利亞去。

常常都有人說，這些德國農民所以願意離開俄國，乃是由於宗教上的原因。實際，這些農民的信仰，很是複雜。他們加入集團農場，便不能繼續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是他們放棄財產離開俄國的重要原因。但著者所遇見的德國農民，都說他們離俄的原因，並不是宗教的，而是經濟的。他們說，他們像陷阱中的老鼠一樣，經濟一定破產。有一個德國農民說，在他所住的西伯利亞某一個地方，集團農場曾經組織起來，而且運用很好。但後來却被解散，說是一種富農的集團農場，農場首領也被監禁。此外還有一個集團農場，也遭受同樣的命運。本來這些德國農民的生活程度，都較俄國農民的生活程度稍高。他們既不能個人自由種田，而組織集團農場又發生阻礙，所以他們覺得他們的生活程度，一定要根本低落。但實際上雖然他們之中，也有少數得離開俄國，可是其餘的人仍勒令回到西伯利亞，且不准再回莫斯科來，也不得擅自離開俄國。

政府爲組織並管理新的集團農場起見，曾派了二萬五千工作人到鄉村去，同時，城市

中各式各樣的住民，也或被利誘，或被威脅，都到農村服務，幫助這些工作人員。例如爲實行集團農場的文化革命起見，莫斯科高級音樂學校的學生也動員到鄉村中。莫斯科醫院的醫生和看護，也被抽調到農村，以應付集團農場的需要。師範生也被派遣到集團農場服務。且規定除非在集團農場服務滿了三年，不准在其他地方謀得位置。移動電影也努力供給農場。據著者所知，有一位天文學教授，也被遣派到集團農場，用天文儀器對農民作表證的演講，農業專門學校的學生，也調來協助集團化運動。有一個女子，在養蜂學校中，正從事高深的研究，也被派到農村作修理機關拖車和駱駝僵繩的工作。

凡此一切工作，都在專心開發集團農場的文化的可能性。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因爲農民都把由城裏派來的人認爲是蘇維埃政府的代表。所以凡是城裏來的人，縱然同情那些農民，也被他們認爲和地方共產黨一鼻孔出氣。在有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土人都把俄國人看做是蘇維埃政府的擁護者。他們往往殺戮俄國人，不問這些不幸的犧牲者真正的政治關係如何。所以爲自衛計，由城市派到鄉村的城市住民，也就成爲擁護共產主義

的一個士卒了。

因為富農這樣拼命反抗，且能鼓動其他農民同樣反抗，所以黨部才決心消滅這些搗亂分子，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宣佈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liquidation of the Kulaki as a class）。在這種階級的消滅中至少要包羅五百萬人，但因為富農和中農不容易區分，所以實際的數目比這個還要多。我們很難說，當斯大林宣佈他的消滅政策時，他究竟是什麼意思；自然也沒有一個人想殺戮百萬的人民。但在執行政策時，確也有數千富農被鎗斃。至若富農所受待遇的嚴酷與否，則視其所在的區域而定。有時，只要有人告發他們曾經宣傳反對集團化運動，就被鎗決。有許多富農及其家屬，則被迫自殺。不過被鎗斃或被迫自殺的人數，和富農全數比較起來，仍然是很少的。

這種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於宣佈數日內，即開始實行。其方法是由地方蘇維埃貧農團體或附近集團農場社員沒收富農土地、房屋、家畜、農具、機器、穀類、食物、家具，甚至衣服。富農則被迫立刻離開該地，或集合於鄉村中數間屋子內，等待最後的判決，然後再決定去向。

這些辦法，後經人民委員會議和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緊急命令，認為合法。

這個命令頒布以後，即開始把沒收富農財產的辦法加以整理。宣佈沒收所得的財產，即作為貧農加入集團農場の入會費，或作為無法繳付會費的人の入會費。但此處便有問題發生，假若鄉村附近並沒有集團農場，又怎樣處理呢？是不是任何地方的富農的財產，都要被沒收呢？誰又來領受他們的財產呢？因為有很多次數，地方上貧農把富農的財產沒收後，就自行瓜分，所以有這種問題發生。在事實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貧農都認為是整批沒收，甚至無限制搶掠的機會。莫斯科黨部委員會則宣佈「消滅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並徹底肅清私商階級的殘餘。有時地方官吏把富農的財產沒收後，便把這些財產賣給他們自己。被沒收的富農的房子，地方官吏往往用少數錢即可買得，因為沒有一個人敢反對他。黨部人員看到這種無法無天的掠奪，滋長日甚，頗為關心，所以斯太林特地宣佈：只有在實行完全農場集團化的地方，才許沒收富農的財產，而且財產應該歸入集團農場。但這個宣佈，對於地方官吏並不能立即生效，因為富農知道他們財產之被沒收，不過遲早間事，

所以在未被沒收以前，他們就把他們的所有全數出售，殺了他們的家畜，逃到城裏去。

被驅逐或放棄農場的那些富農，環境極苦。他們拼命努力在工廠中，在建設工作場或在礦山中尋求工作。可是富農沒有加入工會的權利，不論在什麼地方一被發見了，就有被『肅清』的危險。有一位縣執行委員告著者說，他們想劃出縣的一部分和最貧瘠的土地作為一種富農區，在北高加索，現正在計劃劃出一塊極貧瘠的土地給與富農，每兩家給一匹馬，每四家給一把犁，並代他們擬定一種生產計劃，強迫他們履行。此外，有數千富農，被運到北區的木廠，做強迫工作。一九三〇年五月，著者親眼看見一列車，載着富農及其家屬，由烏拉爾 (Urals) 運到中亞細亞的塔斯肯特 (Tashkent)。他們到達之後，將有什麼事情來到他們頭上，他們是不知道的。有時失望的富農轉變為土匪。

在黨部方面，以為這樣把富農的財產變為集團農場的財產，實在是巧妙不過的辦法，但實際上，這種政策的結果却出乎意料之外。我們以前說過，把農民劃分為三個階級，這種劃分完全是人為的。可以列為富農的農民，其人數實際上並無一定限度。所以很容易把以

前認為貧農的農民，當做富農階級看待。所以指為富農階級的人數越多，則轉到集團農場的財產越多，假若能逃避中央當局的耳目，則被掠奪的財產亦越多。不論什麼人，只要反對集團化運動，就被目為富農階級。甚至貧農階級也不安全。有一個老農有三隻羊，他的總財產不過值二百十五個盧布，也被認為富農階級，他的財產也被沒收。有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因為三年前做過點小生意，也被認為富農。甚至參加過內戰的紅黨，也被認為富農。有一次，有一個縣執行委員，也被認為富農，他的財產也被沒收。實際上，就是紅軍中的貧農，也被認為富農，而沒收其財產。像這樣的例子，可以列舉無窮，因為自從政策改變以後，這類事例都發表在蘇維埃報紙中，作為一種宣傳，企圖糾正一般人對於集團化運動的責難。

到了一九三〇年三月初，集團化運動越發速加進行，完全不顧及實際上農民的願望。集團化運動完全為一種行政的事情。區或縣的執行委員都說這一區已經完全集團化了。聽了這種話，農民應該知道他們已自動地成為集團農場的社員，但實際上實行這種組織所採的步骤，不過少數而已。

假若農民實行反抗，政府即用武力威嚇。中亞細亞的農民，對集團化表示反抗，政府即威嚇着說，假若他們再繼續反抗，政府即將灌田的水斷絕。在俄國土耳其斯坦，有一個主持地方集團農場的工作人員說：『遇必要時，政府得運用武力，使你的屋子化成白地。』

農民也不得將其生產品，在城市市場上售賣，或賣給私農。他們必須賣給政府合作機關，而得到較低的價格。有時，加入集團農場的農民，縱令把他們的牛一頭或數頭捐給集團農場，也得不到充分的牛奶以供自用。

其次對於農民的壓迫，便是食糧狀況的變壞。私人商店被封閉後，同時市場上不再見農民的蹤跡。甚至城市無產階級也受着影響。他們之中，有些人的父兄，也被認為富農，而失其財產。有些人得到鄉下的報告，非常着急，便回到鄉下，希望保護自己家屬或親友的利益。一方面，工廠中舉行會議，熱忱擁護下鄉管理集團農場的工人，但同時這些工人的行爲，就威嚇着這些未來的集團農場管理者。

甚至，俄國農民反抗壓迫的能力，也達到了極度。農民的叛亂，在全聯邦內發生着。政府

派到鄉下管理集團農場的工作人員，被暗殺的事件極多。有一個莫斯科工廠負責人告訴著者說，他們派遣四個工人到集團農場做管理員，結果有兩個被農民暗殺。但這些可怕的暗殺事件，只是口頭相傳而已，因為政府禁止報紙登載這些事件。有許多事件，是農民夜間圍住這些工人的住宅，放火焚燒，情形很慘。

及至派遣鎮壓農民的軍隊中發生了騷動，這些農民的反抗，便達到了頂點。因為紅軍中的軍官，有大部分是富農的兒子。由滿洲方面退回來的傷兵，發見了他們的財產，已被剝奪，他們的父母已被迫離開鄉村。據說有一次，軍隊拒絕鎗殺農民，遂被政府解除武裝。一時黨中 斯大林派，也差不多發生恐慌。黨似乎也走到了絕路。繼續積極施行集團化運動，和消滅富農階級，這似乎是荒唐的事，但見難中止，則有碍威信，故仍勉力進行。在這個時期中，住在莫斯科的外國人都以為斯大林必將放棄他的政策，然而斯大林却是百折不回的貫徹他的初衷了。因為外國觀察者還不知道，俄國的農民，不論在何意義上都是孤立的。俄國農民所要求的，只在把壓迫滅絕一些，他們就不再反抗蘇維埃的統治。當最嚴厲的虐政停

止時，農民的反抗，便即刻就能壓下去，因為農民完全是無組織的，而行動又全無計劃之故。再則，黨的威信和斯太林的威信是有連帶關係的，若反抗他的領導，必致害及黨的本身。不過尤其重要的，就是斯太林能完全把黨統治着。沒有人敢挑撥他的領導。他所建立的機關，可以使人絕對服從，而不問命令的合理與否。可是在黨外，則完全是空無所有。政治警察的活動，就在根本剷除反對黨的形跡，誰也不能想像黨的權威失墜後將成何局面。他們以為再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代替黨的權威。

在這類情形下，斯太林的意見，即使是最細小最不合理的，也必須見諸實行。曾有許多謠言，說斯太林已經瘋狂，政權即轉入右派手中。但實際上，斯太林只猶豫了一個短時間，他對於俄國人民的情境有充分的了解，他只是做必要的讓步而已。他發表了一篇論文，駁斥一切對於集團化運動的責難，他說集團化運動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蘇聯農民，已有百分之五十加入集團農場。他說，這種偉大的意外的成功，使許多同志都覺得現在什麼事都可以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可以即刻達到。他承認過去的許多錯誤。農民被迫加入集團農場，

有時且施用武力，這是極大的錯誤，因為這是違反農民的意志。所以以後集團化必須是自願的。而尤其錯誤的，就是許多中農都被認為富農。在鄉村中，這是一種反常的階級爭鬥，所以必須加以糾正。向來的集團農場，都是根據行政的條例來組織，並沒有必要的預備。黨部工作人員和蘇維埃官員，都主張立即組織共產化的集團農場，然而這是錯誤的，所應該着重的，乃是那種集團農場的最低級組織——即合作農場（*а.т.с.*）。這種組織須經過充分的時間才能發展為共產化的集團農場。集團化運動最必要的地方，乃是那些生產穀類的大區域，因為在這些地方，才可以把大量的生產方法應用於集團農場上。在另一方面，「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仍應繼續實行，不過應該注意，不要把中農認為富農。

斯太林的命令的發佈，曾經轟動一時。據說在有些地方農民化了十五個盧布，才買得一份載有斯太林命令的報紙。有一個地方，農民因為急於購買報紙，竟把出售報紙的涼亭都擠倒了。有一個農民說，他們看斯太林的命令，正如他們祖父看解放農奴的上諭一樣哩！

斯太林這篇命令式的論文發表後，便有黨的命令頒布，命令的內容，和斯太林的論文

一樣，不過較爲詳盡。并且還提及其他的問題，強迫封鎖教堂的事，應該停止執行，對於宗教的強力壓制，也不應繼續存在。農民重復可以在城市出賣他們的生產品。過後數日，斯大林又發表一篇補充的論文，更說明黨的立場。

斯大林的論文和黨及政府的命令發佈後，立即發生的結果，就是農民完全由集團農場逃走。政府爲阻止農民逃走起見，故又連續頒布了一些命令，大凡集團農場上沒有逃走的農民，都得享有種種權利，並得減免租稅。不過那時春耕已在進行之中，而集團農場外的農民，又有一種逃耕傾向的表示，所以仍不得不再發布命令，以謀獨立農民狀況的改進，使兩種情狀得互相中和。斯大林曾相信集團化的分數，可固定於百分之四十，但在一九三〇年的耕作期，似乎比這個數目少得多。在有些地方，集團化的百分數，竟由百分之九十降到零。在莫斯科省，已有百分之七十的農場集團化了，在那里，這種運動已完全停止。

在報紙方面，則常常有激烈的討論，企圖如何糾正暴亂的行爲，以免農民再生反對。這樣，這個春耕時節，可不致因農民抵制而受影響。然而實際上，混亂是無法形容的。農民往往

今天離開集團農場，明天又轉回來。但舊日各家土地的界限，大多數早已取消，使集團農場成爲一種整個的。那麼又把什麼土地給那離開集團農場的農民呢？有一個農民說：『我許多次到蘇維埃尋找我舊日的土地。他們已告訴我多次，但我去尋求，總不會看見。』至於關於歸入集團農場的穀種，家畜及其他東西，也發生相似的問題。莫斯科附近有一個村莊，什麼東西都可還給願意離開集團農場的農民，但農民使用他們自己的家畜，每天必得付給集團農場以七十五個戈比。就是富農，也可以適用這個辦法。又有一個村莊，在所歸還的東西中一家只能得幾個小雞和一頭牛。因爲在這個春耕期中，這一切改組都在實行，所以其應付的困難，不難想像。

據春耕的報告，個人經營的農場所種的穀類，顯然不及從前所種的多。可是國家農場的收穫，却超過他們的計劃，甚至集團農場也是如此。一般而論，我們可說，即使有種種困難存在，而春耕的結果，却出乎預想以外。

一九三〇年的豐年，顯然是蘇聯農業上的一個重要年頭，並且也是全部經濟政治組

織上的一個重要年頭。假若集團化已證明是一種經濟的失敗，或個人農場的耕作很少，致使又有飢荒發生，則蘇維埃在俄國的統治就完了。農民的騷動，即證明就是俄國人民對於苦痛的忍受也有一個限度，就人事論，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俄國就是在一種戰時的基礎上。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算是暫時有兩三年的休息，食物既很充分，生活也不十分艱苦。但俄羅斯自一九二八年來，連年飢饉，俄羅斯人民縱具有亞洲民族的命定主義和鎮靜性，是否能忍受第二次的飢荒，却也不無疑問。

但不論穀類收集如何困難，一九二〇年的收穫，確實豐富，可以有數百萬蒲雪爾 (bushels) 的穀類出口。假若不是施行五年計劃，這些穀類將在俄國消費。雖則也爲了氣候良好的原故，但俄國穀類得在世界上再估一個重要位置，也足以證明蘇俄的農業方面已有很大的成功。

黨相信市場穀類的增加，乃是集團化的結果。因爲集團化運動成功時，使不再有富農存在，而一切集團農場，又把一切市場穀類，依照官定的價格賣給政府的收買穀類者，所以

共產黨相信穀類將不為無聊的目的而屯積。因為耕種方法的改良，使生產力大為增加，所以市場穀類的過剩，程度也就大為增加了。

但關於集團農場所能供給的穀類分量，也許要失望的。國家農場乃是立在一種完全不同的基礎上。但國家農場的耕地面積，和全國集團農場的耕地面積比較，却小得多，而蘇聯却希望集團農場在最近數年內把穀類的分量增加。政府為使加入集團農場的農民滿意起見，不得不把食物消費的標準提高，超過貧農之上，然後才能有充分的穀類收穫。所以一九三〇年市場穀類分量是否能如所希望的那樣多，實在不無疑問。

不過，重要的因素，還是蘇維埃政府方面的及時奮鬥。一九三〇年中機關拖車的缺乏問題，已獲得相當的解決，因為一九三〇年六月，列寧格拉特的機關拖車工廠已正式開始，這工廠若全部開動，每年可以造出五萬架機關拖車，其次，也是由國外輸入了不少。到了一九三一年春季，蘇維埃政府已能解除農民個人拒絕耕種的問題。農民假若不盡力耕種，土地仍收回歸集團農場所有。此後三四年內，蘇聯還可以開墾出許多可耕的土地。在蘇俄，每

敵當然都有增加的可能。按自大戰以來，全世界都積極擴張農業的生產。只要政府願意積極從事農業生產的增加，且情願投很大的資本，全部生產量當然可以增加。

不過還有一個大問題，要解決了之後，蘇聯農業的危機，才能完全消滅。因為人民雖有了充分的穀類以爲生活，但肉類、蔬菜及其他輔助食物的供給，在最近數年內仍然發生困難。農民爲反抗政府強迫他們加入集團農場計，把他們的家畜大批殺戮，所以肉類的供給便大爲減少，要恢復常態，非有數年工夫不可。再則，因爲集團農場組織的關係，只宜於耕種穀類，不大宜於豢養家畜及栽種蔬菜，而過去，對於這種國家農場和集團農場的經驗又很少，若要使其能有必需的肉類供給，也必須假以相當的時日。

當集團化運動完成時，鄉村中勞力過剩的大問題，一定可以解決。農業上因爲應用機器的緣故，致使有數百萬人的餘剩，等待被僱用於工業上。這種情形，戰後的美國就發生過，有幾百萬農民都向城市移動。在美國方面城市人口突然增多，即感覺吸收的困難，覺得無法安插。那麼，這個問題在蘇聯可以解決嗎？蘇聯的工業，現在正在擴張，資本建設的大計劃，

當然需要很多工人。所以由農村移到城市的人民，可以安插一部分。並且希望在城市中發展工業，尤其是那種農產品的精製工業。再則，因為蘇聯經濟組織之不同，却可以防止失業的發生，可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差不多是辦不到。因為在蘇聯方面，雖然安插失業農民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在農業問題的解決上，似乎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困難。

因為這種偉大的農業計劃上所耗費的金錢很多，加以工業上又有巨大的投資，所以蘇俄的全部經濟結構便極度緊張起來。農業的集團化，使蘇維埃政府不能不立刻決定：新的農業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和城市無產階級一樣待遇。社會保險的制度，也要把這些農民包括在內嗎？這些農民的口糧應該和城市無產階級一樣多嗎？七小時工作制，也應用於國家農場和集團農場上面嗎？託兒所、俱樂部及其他社會輔助制度，也擴張到鄉村區域嗎？有限的製造品，城市和鄉村應該同樣享受嗎？一直到現在為止，城市的享受，都較農民為優。所以一九二九年烏拉爾斯克（Ural'sk）附近地帶收穫不好，同業公會的會員便得有一種口糧簿，可以到國家商店及合作商店購買麵包。可是農民却沒有這種簿子，農民若沒有簿子，

便不能得到麵包，所以農民實際上是受餓的。至若農村供給莫斯科的肉類也是強迫的，政府往往下令，假若他們不把食物供給都市，即命地方官吏捕拿。製造品在大城市中都已難得，在鎮鄉中更是少了。

假若農民是單獨的個人生產者，蘇維埃政府還有法子損害了農民而優待城市無產階級，并且擯斥農民為社會主義制度之一部分。可是自集團化實行以來，農民已根本不是一種獨立的階級，在理論上，和城市無產階級是無從分別了。但若使二者的生活狀況相等，蘇維埃經濟又必感受很大的困難。俄國農民的生活標準，向來就低得可怕。而農民的人數，又差不多有城市人口的四倍或五倍，所以若要提高農民的生活，使與城市無產階級相等，則所需的費用，亦必四五倍於城市工人的生活費。

但實際上，政府亦努力於集團農場農民生活程度的改進。例如招募教師、醫生、音樂家、戲劇演員，在集團化的農民中，實行社會的文化工作。為工作婦女的兒童計，也設立了託兒所。有時也設立農業生活的新中心，設有公共的家庭，以代替舊日低陋的草舍。不過這一切

事情，當然是不能不緩緩進行的。因為若要把這些利益普遍於全部農民，則城市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將無法改進。而黨部方面，也永遠不忘記，對於黨最忠實，最能擁護的，還是城市無產階級。所以政府不得不常常有一種明白的證據，表示他們的生活狀況實係逐漸改進。工人階級，當然不願意把他們的食物供給突然減少，所以政府常用其他方法來和緩他們。也不能使他們看出農業集團化成功的利益，只限於農民所得。

所以，即使集團化成功了，仍然有一些時候，是城市無產階級支配鄉村無產階級。當然政府方面，仍繼續努力改進農民的經濟和文化的地位，但集團化運動成功的直接利益，理應為城市工人所得。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所以在相當時間內，集團農場的組織形式上，仍須保留其封建原素。為防止農民用盡他們的農產品起見，不得不加以一種外部的控制。在這種新封建主義時期中，農民仍然是表示不高興的。但機會的改進，孕育了共產主義的學說，結果農民中必發生較有力的分子，對於蘇維埃的統治積極表示擁護。假若蘇維埃不從事國外戰爭，牠這種政策，也許能成功。

蘇俄十月革命時代，允許農民以『和平及土地』，可是革命到現在已十有三年，農民發見十月革命給他們的，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和平。大戰之後，繼以革命，革命之後，繼以內戰，內戰之後，繼以『鄉村中的階級爭鬥』，這一切所給與人類的悲慘，更甚於前。但是農民始終把土地認為重要。假若他們由戰爭仍能保存土地，他們是歡迎戰爭的。然而戰爭以後，土地已由他們手中奪去了，只有用一種神奇的方法才能收回。

在黨看來，集團化的成功，認為是逐漸創造一無產階級國家的一大進步。農民階級將被消滅，而成爲一種農業無產的階級。農民的工作時間將要縮短，他們的收入大家一律，而且稍微增加。他將有學校、電影、俱樂部、託兒所、公共廚房、公共食堂、公共寢室。本來的手工制度將消滅，他也像城市無產階級一樣，成爲機器的半主人、半奴隸。因爲農民不復存在，所以農民問題也沒有了。

蘇聯農業集團化機械化大實驗的結果，對於全世界當然非常重要。在從前，絕沒有在這樣大的區域上，把大規模的生產方法應用於農業上的各方面。假若實驗的結果，確證集

團化運動的成功，那麼，立刻就有問題發生，就是這種方法，也可以應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上，或德謨克拉西政治制度上嗎？現在全世界的農業，既危機四伏，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即將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共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爭鬥，將來誰勝誰敗。

第五章 國內貿易

第一節 緒論

蘇聯國內貿易最高機關，名「納爾康姆大格」(Narkomtag)即貿易委員會。除聯邦之外，在各共和國、各縣、區、村，都有這樣的貿易委員會。納爾康姆大格對於貿易的關係，猶若最高經濟會議之對於工業的關係一樣。其初貿易委員會的組織與機構，並不與工業方面的最高經濟會議的相同。直至一九三〇年改組之後，方與最高經濟會議相類似。原來最高經濟會議，頗似大的合股公司，既可委派各種工業的監督，又可直接管轄其經理。至貿易委員會，直至改組的時候止，並不是個監督的機關，而是一種調和的組織，一部份的原因，是由

於國內貿易的最重點乃是消費合作制度。而消費合作社，並不是國家經濟制度的一部而受政府的直轄，所以牠不受貿易委員會的監督。反之託辣斯與組合，則要受最高經濟會議的監督。再則託辣斯與組合，雖兼有商業的作用，但這些作用，並不直接受貿易委員會的監督，因為託辣斯與組合是在經濟委員會直接監督之下。所以貿易委員會對這種機關的商業作用的監督乃是表面的。

不管有若何的困難，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終於在一九三〇年一月，把國家貿易機關改組了。這個改組，是跟着工業的改組而起的，並與聯邦的銀行制度同時實行。這三種經濟機關的改組，是反映着黨的心理狀態。原來抄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形式，現在已可廢棄而代以社會主義的形式了，這一代替，一則可使計劃的經濟原則，得到盡量利用，二則可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早日實現。原來黨的正統理論家都以爲新經濟政策之最初幾年，使經濟制度成爲國家資本主義化，而且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已在進行之中。農業集團化迅速的超乎意外的成功，使全部黨員發生一種希望，

以爲偉大的社會主義實現之日已經相隔不遠了。所以經濟制度的改變越走得越快越好，以便從速奠定真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貿易委員會的改組，乃此種普通改組運動中最困難的一部份。

按照改組的計劃，貿易委員會的重要職能，莫過於食物工業的指導和計劃。牠要在聯邦的工業境內，監視食物與其他消費物品的分配。委員會要計劃並指導城市與鄉村生產物的交換。因爲既然希望農業從速完全集團化，也就希望這種交換，採取國家農業與國家工業生產物的形式。爲着準備城市的必需食物和原料起見，委員會得管理農業節縮的制度，以及農業與消費合作機關關於穀物的收穫。委員會亦參與計劃國家與集團農場的建設，以及擊劃生產計劃。因爲公衆廚房、食堂與食物工廠的創設，委員會亦有領導公衆食事制度發展之責。舉凡食品物產的運輸與冷藏，交換與選擇等，均爲委員會分內應爲之事。

委員會對消費合作機關與農業合作機關兩者的統制，因政府命令的條文而大有增加，但這種增大的管理要與合作機關的規則相符合。爲要使這種管理更加有力量起見，消

費合作機關以及農業合作機關都希望參與新組合（或稱 *Obednennie*）（由多數托拉斯組成者）之形成，而這種 *Obednennie* 與最高經濟會議改組時所發生者頗相類似。至若合作機關如何成爲國家的機關，同時在貿易委員會直接指導之下，又不傷害其合作的本質，這是很難明瞭的。要把合作機關改變爲新組織，倒是種很艱難的工作。如果這種工作可以完成，那末合作機關一定不能成爲獨立的機關。但獨立合作機關實際並非獨立的，所以其結果，似乎是使其構造比現在更合理化了。

新的商業組合是法定的機關，正如新組織的工業組合一樣，牠有獨立的決算與會計。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機關，都有加入組合與否的自由。如果牠們加入組合，那末牠們便由勞動保障會議的特別命令，根據其所訂立的契約，與國家機關發生關係。這些組合，則對那加入的機關，與以指導和計劃。一方面指導所屬機關的資本建設的計劃，他方面監察新事業的建設。例如指導堆棧與貯藏制度的組織，制定價目表，組織科學的探討與顧問，訓練並分配專門的人員，任免其所屬機關的領導人員。

聯邦與共和國的事業，以及地方較重要的事業，預料都可以加入組合中，就是一時未加入組合的機關或事業，亦須服從組合之指導與監督。組合對共和國與地方機關的管理，係經過共和國與地方的貿易委員會的中介的。由政府命令成立的組合，已有六個，其餘將來再成立。那六個便是關於麵包、麥粉、魚類、蔬菜、油、果品的、冷藏的組合。這些組合直接受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監督；凡組合的生產計劃、生產品價目表、財政計劃、決算表、報告、主要人員的任免、法規的確定，都受其監督。

照規定，組合中只能包含從事食物生產或販賣食物的機關與事業。至若在工業品方面，貿易委員會對供給人民以工業品的消費合作社與國家事業，僅施以普通的監督而已。按照新制度，共和國與縣的委員，也為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代表。這是達到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步驟。有了這種制度，聯邦貿易委員會，即可與地方上某商業部門直接接洽，關於穀物與粉麥的事項，不必經過共和國委員的中介。至若輸出國外的物品，也是如此。在這幾方面，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管理是直接的、最高的。在村中，也組織得有管理貿易的機關，那是

鄉村中最低級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單位。這種改變的原因，一半是由地方當局，感覺供給中心城市區域以麵粉及其他食物之困難；另一半是由於地方當局供給出口食物生產品之困難。

共和國貿易委員會，有時亦擬建立機關，經營零售商業。實因此貿易委員會，在共和國的各縣中，建立大機關，經營各大城市的零售商業。在莫斯科，共和國貿易委員會的零售機關，就是有名的果姆（гом）。這機關，在城內中心地點，有一個大的商店，遍城有小的商店。除大小商店之外，尚有攤販，站在街頭巷口，叫賣糖食果品等物。至若關於皮鞋、衣服、葡萄酒與香烟的專賣，又有特別商店。這些商店，無論是大小商店，或特別商店與攤販，大抵只限於大城市中才有；不過縣中也有設立的。但雖設於縣中，却不受縣政府之限制，却受共和國貿易委員會的直接管理。單在莫斯科一城，這種機關便有四百八十個。至少在理論上，這些在共和國貿易委員會直接管理下的零售商店，不但是一般日用品分配制度之一部，而且是最有效的零星分配法的模範機關。並且牠們也可使貿易委員和消費的大眾接近，俾知國

內商業的趨向。

在聯邦共和國之下的政治與經濟部，有時也建立機關從事零售與批發，其最重要的，為在莫斯科省內經營零售與批發的「莫士大格」(Мосгор)。其組織一如股份公司，其股份，莫斯科省執行委員會佔百分之七七·二，莫斯科託辣斯佔百分之二〇·三，莫斯科市立銀行佔百分之二·一，聯邦財政委員會佔百分之二·三。此外其他各處尚有同樣的組織；但沒有一個的資本，超過「莫士大格」的百分之二五。「莫士大格」由股東所舉的五個董事所經管。亦有顧問性質的會議。這會議由股東、工會與莫斯科行政區三方代表所組織而成。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其基本金達七百萬盧布，其特別金達三百五十萬盧布，約有五千員工。

「莫士大格」有九個批發部：即鐵器、工業裝置、化學、建築材料、編織物、機織物、衣服、辦公室裝置及珠寶。牠得有全聯邦政府機關鉛筆的專賣權。又供給全莫斯科所有大建設的建築材料。且與區內工廠訂約，供給工廠中工人的工作衣服。「莫士大格」的總周轉資金，

在一九二一——二二年只三百五十萬盧布，到一九二八——二九年，已達二萬八千八百五十萬盧布。照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參照數字，周轉資金現在可達四萬六千七百萬盧布。在縣內有十一個支部，共有一一五個商店。在莫斯科城內，除最大的有名的支店之外，尚有一〇九個商店。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總交易的耗費，約佔貨品總周轉資金的百分之三·九。稅金約佔百分之三·九，工薪約佔百分之一·九，資本費百分之一·六，其他耗費百分之〇·五。

託辣斯或組合下所組織的商店，亦從事零售貿易。比如在推格大格(Погода)機織物組合下所組織的機織物販賣商店，就是例子。還有橡皮託辣斯所組織的商店，販賣橡皮。這種商店，從前是專賣零星物品的重要機關，且是出售工業製造品的一種主要機關。但其重要性，現在已不如從前。因合作制度產生以後，這兩種分配作用互相重複。所以這些為工業輔助用的特別商店，便逐漸取消。而其任務，則全讓之於消費合作社。但託辣斯有時對此，堅強反對。他們說，有這種工商業組織，可使生產機關與消費者更加接近，而且藉此，更易明瞭

消費者的欲望與嗜好，但是最後的決定，終於與這種垂直形的組合，背道而馳。不過尚有些工業組合，保留着這種零售商店的制度，但牠們在零售市場中，已不佔重要的位置了。

尚有一種零售商店，乃是地方託辣斯商店之一部。莫斯科之「莫士色爾普羅姆」(Mosselprom)就是這種託辣斯的例子。其工廠從事大量的生產。牠在莫斯科雇用了一四三〇〇工人；製造糧食、筒麵、餅乾、啤酒、香烟、玩具等物。其生產品之一半，由其自己的商店，出售於莫斯科市場。在莫斯科共有三〇個大商店，三七〇個小商店，四〇〇〇個代售處。牠們只出售自己的生產物。至若不由自己商店出售的生產物，則由消費合作社的批發機關，香烟辛的嘉與國家出口機關等銷售出去。

蘇俄的零售貿易，要以合作機關為最重要。許多零售貿易，不是由農業合作機關所經營，便是由生產合作社或消費合作機關所經營。生產合作機關有些店舖，銷售農民手工業者所製造的生產品——如花邊、木刻、玩具等類。但生產合作機關，有時是直接銷售貨物與消費者。比如小規模的麵包製造所，一方面製造麵包，一方面零售出去。但由麵包店出售的

麵包其價格往往比消費合作商店的高，這是很感興趣的一回事實。

農業合作機關，則販賣直接消費的農產物，尤其是日常用品。

但是在合作社中，甚至在一切零售機關中，其較重要的，要算是消費合作社。試觀下列的統計，更足以證明其重要之所在：

第二表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	%	%	%	%	%
國家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	五七	六一	六七	七五·九	八〇·五	九三			
單獨消費合作社	二八	三三	三九	五三·三	五七·四	六四·七			
私人貿易	四三	三九	三三	二四·一	一九·五	七			

在一九二九年下期與一九三〇年上期中的發生變化，使私人零售貿易的特別重要性，減小得特別快，其速率比五年計劃所預料的還要快。這個變化，使消費合作社的重要性，

更加增加，因為凡失之於私人方面的貿易，幾乎都增加到消費合作社來了。但無論如何，只有一小部份可增加到國家經營方面去。在一九二八年末，消費合作社有二、六六六、六四五個社員，同時有八七、八六三家商店，一九二六年，商店的數目，由最高逐漸下降，但這表示商店的集中，後來又再度增加，因為僱員及貿易規模都表示一年比一年加大。

本來物品的零星分配，應歸消費合作社負責辦理，所以消費合作社及零售商店，便遍布全蘇聯。其外形，頗似抄自美國之連鎖商店。曾經有好多消費合作機關的經理，專心研究美國的連鎖商店制度。討論這種制度的書籍和定期刊物，也由美國買來譯為俄文，以供僱員的應用，又在莫斯科設立一個貿易博物館，陳設美國連鎖商店中應用的東西。但因財源的不相宜，所以在服務的性質上，或分類的種類與分量上，合作社均不全類於連鎖商店。

消費合作社，有時出售物品，給非社員的消費者；就是到現在，還有大批的物品，銷售到非社員。不過社員有特別的權利，可以購買一些特別的物品。在起初，只限於持着合作證在某店中購買。直到一九三〇年夏天，凡持有合作證的社員，可以在任何店中購買。但因為食

物的缺少，有些工人合作社，則拒絕非該社社員，在該社中購買食物。

第二節 批發貿易

蘇聯貿易，係由國家商業機關，以及消費、生產與農業三種合作機關經營。前者稱爲

「戈士大格」(Gostorg)，即國家批發貿易組織，其主要機能，在購買原料輸出國外。其組織按照物品的種類而定。比如說，有一機關是購買東方絨毯，將大部分推銷到國外去。還有些機關是購買魚類、木材及其他物品。但這種組織，後來又重新改組。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戈士大格」倒很重要，因爲牠是政府與私人間批發貿易的中介；但後來合作機關和新的輸出組合成立，其機能便無形消失了。

組合亦循着迂曲的軌道前進，組合可說是大工業的代理人，供給大工業以原料，且出售其產品。平常重工業的產品，如鐵與鋼等，在普通市場上都不能看到。例如，生鐵與鋼軌，便由某種工業售到他種工業或鐵道上去，並不在市場上陳列。所以工業組合，和需用這種產品的工業都訂立合同，在一定時間內，以一定的價格，供給一定量和質的產品。買賣機關間

的付款，則假手於國家銀行或其代理機關，採用匯劃制度，無需付給現款。價格由納爾康姆大格（Narcoming）（貿易委員會）與最高經濟會議兩機關來估定，但諸工業間生產品銷售價格之決定，大抵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權限較大。不過出售某種生產品的工業，也得決定一個價格，但須在一定限度之內。一九二九——三〇年，宣佈了一種政策：大凡將來生產上需用的物品，價格須全數降低。工業固有決定某種機械價格的自由，但各種機械的價格，平均起來，應該降低。如果某種工業沒有組合來代表牠，則由其自己的託辣斯來代表，托辣斯可與其他托辣斯或組合，直接接洽。組合與託辣斯，亦將其生產品售給政府機關，如紅軍與委員會之類等。

經過批發合作機關或大的國家商店（如上述的「戈姆」（Соб）與「莫士大格」之類）的中介，工業可與零售的消費市場發生關係。批發商業的最重要機關，名為中央商店（Центросоюз），這是消費合作社的中央購買分配機關。牠是消費合作聯盟的代表，可與蘇俄組合和託辣斯訂立合同，供給某種質量的貨物給合作聯盟。有時，這種合同內，亦載

明數量；但通常不過敘明託辣斯或組合出產的百分之幾，言明一定的價格。其所以不規定確實的數量，而只定一百分比者，全是因為市場的關係。因為依照市價收買生產品的分量，常較依照一定的市價收買生產品的份量為更多。消費合作社所希望取自工業的物品，恆較工業所確能供給的分量多一些。因此合同大抵有伸縮性，只要工業上能生產更多的物品，合作社也就可以多定。或者，生產減少的時候，也就可以少定貨了。

中央商店大抵都有堆棧（以前為辛的嘉和託辣斯所有）以及貯藏於堆棧中的貨物。不過有的時候，如其可能，則直接把貨物從工廠運送到下級消費合作社堆棧中，甚至運到商店中去。鄉村中的合作社，固不能這樣辦，但都可以把貨物由工廠直接運送到消費合作聯盟的地方代表去，由此再分發到各個消費聯盟。過去二三年中，要經所謂合理的分配法，先把貨物運送到總堆棧中，然後分發到各小堆棧，現在把這種麻煩手續免除了，倒經濟得多。

中央商店乃是他屬下的消費合作機關的總代表機關，各下級機關，則分別負責提取

其所定的貨物。然而中央商店與供給貨物的一切機關的聯絡，當然勝似各分散的合作社同盟。所以工人合作社，可由中央商店的紹介或保護，得到許多牠自己單獨行動，所不能得到的物品。如果沒有這種組織，鄉村和省的合作社便不能與大都會的合作社競爭，因為後者容易和供給貨物的機關發生關係，而前者較難。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中央商店介紹給消費合作機關的貨品，佔其所售貨物總數百分之四三。中央商店對於消費合作社的一般會計，也加以監督。

中央商店之外，尚有其他批發的消費合作機關。比如莫斯科區消費合作協會，即其例子。這種組織，對於區內合作社所盡的職責，正如中央商店對於全國合作社所盡的職責一樣，有時憑藉中央商店履行契約，有時隨同中央商店履行契約，有時單獨行之。其所經手的業務很大。在一九二八——二九年 M、O、S、P、O、所經手的批發貿易，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不過牠擁有九八八個鄉村合作社與一三六個城市合作社。

至若農業合作社所需物品的批發購買，係由農業商店 (Sel'skoyuz) 及生產某特

種商品的合作協會、如鹿葛中心、穀物中心、家禽中心等經營之。但自集團農場制度發生後，供給的制度改變了，「克爾克火士」(Kolkhoz)（即集團農場中心）負了重要的使命。

生產合作社，因為是由若干不同的生產機關所組成，所以不能有一個完備的制度，以處置他們的生產品，或供給合作機關以原料。有些買賣，係由單獨的生產合作社所經營，有時則由地方生產合作協會所經營；尚有一些則由全俄生產合作的全俄總機關所經營。經過這些手續，一個生產合作社，可將其工廠所製造的機器，直接賣給用此種機械的託辣斯，另一方面，麻織與製帶的生產合作社所出產的物品，則經過最高貿易委員會與相當的出口機關，由全俄生產合作協會運出國外銷售。

農產物批發經營的制度，似頗複雜，但現已傾向於單純化，尤其在過去二三年中，已有很大的改變。從前，穀物的購買，除私人交易外，尚有三種政府的與合作性的穀物購買機關。從一九二八年起，穀物實行集合，販買穀物的私商立即消滅，到一九二九年再也沒有私商經營的買賣。這個成功經過兩個途徑，一是國家直接的禁止，二是對買者與賣者處以嚴酷

的責罰，排斥了私商，凡穀物的購買便歸下列機關經手：一、國家貿易公司叫做「戈士大格」的，二、消費合作社，三、在穀物中心機關下所組織的農業合作社。國家貿易公司大抵在北方各地購買穀物，但因北方所產供給市場販賣的穀物不多，所以北方穀物合作生產者，便不佔重要的位置。至若農民方面穀物購買的消費合作，在北方則較重要。

但是農業穀物合作社及其中心組織（穀物中樞機關）在穀物的購買上，則較重要。因為這種中心組織成立的原意，是在取消從前的穀物購買制度，而在事實上確已辦到。一九二九年實行穀物集合時，穀物中心所擔負的任務，比其他二機關所擔負的要大得多。穀物中心不但擔任穀物的購買，而且擔任種子、肥料以及農民生產者所需要的種種。此外又置備機關拖車隊，開墾鄉村荒地或集團農場，以為專買穀物的報酬。這種工作，雙方都有契約，短則一年，多則九年。契約載明，凡鄉村所準備出售市場的穀物，都要售給這個穀物中心，但原來所用的種子必須扣除，肥料以及開墾機器的價值。這種契約從前都是分別訂立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穀物中心所買的穀物，（其價格是由貿易委員會規定）還得轉到另外兩個組織去，便是出口販賣部與入口販賣部。顧名思義，那轉到出口販賣部去的，乃銷售於國外。轉到入口販賣部的，則分配於下列三種機關：一部份送到國家穀物貯藏所，一部份送到消費合作社，（大半由中央商店經手）尚有一部份直接送到國家組合、託辣斯與委員會。

第二節 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之規定

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市場價格是無限制的；但在蘇維埃經濟之下則反是，市場價格皆有規定。不過這個規定的制度，比較複雜罷了。起初總有若干不同的價格。有批發的價格，有零售的價格，有消費物的價格，有生產物的價格，有穀物的價格，有工業農產物如麻與棉的價格，有國家商店的價格，有合作商店的價格；並且規定的制度也各個不同。但各種價格總是互相接近的。比如生產物的價格對於消費物的價格總有影響，穀物的價格對於麵包的價格亦有影響，諸如此類，不必枚舉。至其概括的規定，乃是聯邦貿易人民委員會的權限。但規定價格却有一個原則，那就是要價格不至於發生競爭。就是說，國家機關既不要彼此

發生競爭，國家機關也不與合作機關發生競爭。以販賣價格而論，誠然很少有發生競爭之可能，因為實際價格，總是比自由競爭的價格要低。在以前，購買農產物的國家機關，常與合作機關發生競爭，但現已完全消滅了。國家批發購買機關與合作中心機關購置農產物所付的價格，是由全聯貿易委員會同七個聯邦共和國的貿易委員會所決定。比如購買麻類罷，貿易委員會擬出國家貿易公司和麻類中心所要購買的分量，規定一個付給的價格，這種價格，各地當然微有不同，但無論合作機關與國家貿易機關都要遵守，不能多付亦不能少付。生產物價格規定的權限，分屬於貿易委員會與最高經濟會議，但後者更有直接限制之權。至若消費上所用的零星物品，價格的規定，更為複雜。凡工人特別需要的物品，其價格由全聯邦貿易委員會規定。聯邦共和國委員會固亦可規定物品的價值，但全部物品百分之四十，都在該種委員會規定權限以外。除大宗物品外，零星物品，並不詳細規定價格，不過批發機關與零售機關所賺的贏餘百分數都要受限制。衣服等類物品的詳細價格，僅規定工人所常用的標準物品。一切物品的價格，均依所規定的百分數，若不經貿易委員會的

允許，不能任意變更價格，而且貿易委員會可以直接命令升高或降低價格。實際上，關於變更價格的普通命令，都由貿易委員會與最高經濟會議聯合公佈。例如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八日，兩種機關聯合命令組合，把工廠棉織品的工廠價格降低百分之一〇・五，鞋子百分之一〇，套鞋百分之一〇，衣服百分之七。又命令工人與運輸消費合作社，中央商店，國家商業機關；凡城市與正在從事新的建設工作的地方以及工人居留地，都要把零星物品價格降低下來，這種零星物品價格的降低，在棉織物達到百分之九，鞋子百分之一〇，已成衣服百分之八。

——照中央商店的記載，在三十八個中央勞動合作社中，只有十六個降低了鞋子、套鞋、糖、肉、蔬菜等物的價格。而這種價格之降低又不是相同的。有一件東西，原來賣二一・五戈比（Kopeck）的，在某一個地方，只降低了半戈比，在莫斯科降低了三・五戈比。中央勞動合作社照常只應有百分之〇・八一的淨利，現在倒有了百分之二・八的淨利。樹膠在某一合作店中每一啓羅賣四八戈比，在另一店中，每四〇〇格藍姆賣四五戈比，又在一店中，每

二〇〇格藍姆賣四五戈比。這些例子，足以顯明價格規定制度的複雜了。

人民貿易委員會有權命令日用品在國內各地來往，藉以應付當時社會或經濟政策之需要。比如在一九二九年從事穀物集合運動時，必須把某一些物品送到農業區域去，藉以誘導農民把他們的穀物分出來。同時，又把某一些東西送到集團農場中去，藉以鼓勵農民加入農場。總之，蘇維埃國內貿易制度，是在蘇維埃權力直接指揮之下，而且無論政府與黨部，都能直接參與，故能獲得好的結果。貿易委員會直接管理下，常有一種工業物品的特別預備金儲蓄着，故能發生效力。

第四節 私人貿易

近來年，私人貿易的重要性已大為減少。從前所以容許私人貿易發展當作新經濟政策之一部，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工業、商業與農業社會化的工作實在太大，絕非當時共產黨所能幹得了。要建設全俄的工業，更進而建設全俄的商業，這是一種偉業。故對於原來在私人作業制度下從事經濟活動的工商農業的人員，也不得不加以利用。但這種人員，對於社

會主義，並不見得忠心，在好的方面說是懷疑，在壞的方面說，是極端仇視。共產黨員，以及對社會化政策表示忠誠，並扶助社會化經濟計劃的有訓練或才幹的非共產黨員，爲數固然不少，但仍不能完成這樣偉大的事業。因此有一部份聰明黨員，提議實行新經濟政策，即是暫時注重工業的社會化，而讓市場與農業給私人作有限度的活動。

憑藉這種工業的集中，可以收羅一些有幹才的忠實的社會主義的人員。但另一方面，市場或農業，並沒有完全變爲私人的作業。尤其是市場方面是如此。就說外國貿易吧，完全由國家專營，而且增加這種專營的方法一年比一年多。雖然有人提議取銷牠，但這種外國貿易的國營總是始終維持着。這種政策，無論對於工業社會化狀態之維持，或對於商業及貿易逐漸恢復的促進，都是極其重要。由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假若國內零瑩市場出賣的物品，爲外來的物品所打倒，那麼，對於私人貿易的限制，就不會這樣成功了。

列寧會說過，新經濟政策乃是「先退後一步，以便前進」的意思。這句話在共產黨中雖也沒有忘却。這句話的應用，莫若黨對於市場制度的政策。本來批發貿易，大部分爲國家

所經營。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初，各工業都組織託辣斯，這種託辣斯的一種最重要職責就在出售其所屬工廠的出品。後來因為辛的嘉之產生，國家擁有的工業出品的批發市場，就越發雄厚了。

在先有些外籍的學者，曾把零售市場上貨物的價格，和私人商店、國家商店或合作社中貨物的價格來比較。自然國家或合作社中的價格總較為低下。因此，就說這是國家商店或合作經濟較優的證明。這真是笑話極了。國家貿易與私人貿易，決不會在同一條件上，互相競爭。

除偶然的例外，私人市場上的價格，總是比國家管理的市場價格高些。如果私商的數目減少，食物的供給又被大加限制，則這種價格的差異更加顯著。例如，牛油在口糧券上的售價不過每磅六五戈比，但在私商售價，則為每磅五盧布，或者有八倍高的價格然而由口糧券所得來的牛油太少了，致有許多人不能不用高價去購買。私人往往把價格抬得很高，尤其在糧食與貨幣恐慌之時為甚。

私人貿易總是一種暫時的辦法，並且由兩方面證明私人商店的高價政策實在是不可免的：一則，開設這種商店的新工商資產階級，都知道政府對他們的容忍不過是暫時的。他們又沒有行使憲法的權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他們知道自己是敗類。他們並不想爲了久遠的職業地位減低價格；他們的政策，是在每一個交易上都賺到最大的可能的利潤。他們認識政府的政策。是在剝削他們的價格，所以他們用盡方法來報復。他們不希望以物價爲基礎來競爭。他們很想得到大批物品，以備市場缺乏時來賣出，賺得大利。他們應用這種政策，一時非常奏效，因爲他們常常存儲着市場上所缺乏的某種物品，而能賣到高價。國家機關所要出售的物品，在購買的大衆前，每如雪樣的溶消下去，當此時會，他們便把所存儲的物品拿到大衆前高價地出售。這樣，他自然可以獲得大利。當新經濟政策實行初期，祇要能賣得高價的物品，總常常保存在牠們店舖中，而國家商店或合作店中儲存這類物品，反是例外。

二則，國家也無往不殘害新工商資產階級，又把他們的市場費用提得很高很高。政府

實行這種政策，有兩個理由。第一，政府所痛恨的就只是新工商資產階級。即是說，握主權的黨絕不讓他們能有絲毫的政治力或經濟力。再則，凡加害於新工商資產階級的，都於國家貿易與合作貿易有利益。所以新工商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受責罰。他的納稅，比國稅重得多。他所預付的租費很高。他付與他書記人員的薪金也要大些。如果他和同業公會發生交往，他所處的地位總是不利。而社會化的貿易，總佔便宜。大凡以出品供給市場的國家工業，總是袒護國家貿易。新工商資產階級也很想賄賂工業方面的行政人員，以圖解除這些痛苦，但這是很危險的，並也無濟於事。牠們在外國市場上的來往，全要經過國家專營機關，所以他們的地位總是不利的。

新工商資產階級的價格之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只要新工商資產階級在市場佔一角，國家的政策總是從工業方面，取得利潤。就是說，國家的價格政策，總是對消費者的價格，儘管降低，不從市場方面尋求利潤，而是從工業方面尋求利潤。這樣一來，國家工業的任何利潤，都是以增加費用的方式加到消費者身上，這凡在私人貿易或國家貿易，都是一樣，不

可避免的事。

在一九二九年末一九三〇年初的時候，農業集團化迅速實行之後，黨人非常高興，都相信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可以立即社會化。斯大林曾宣布『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而莫斯科的共產黨委員會，也學着他的口吻，宣布『消滅新工商階級』。到一九三〇年初一、二月，私人貿易幾乎不見於莫斯科了。據說當時莫斯科找不出一個私人的衣服店。其他大多數的私人零售店也關了門。他們存儲的貨物也充公了，新工商資產階級多數被捕、禁錮、充軍則送到西北利亞或白海的島中去。但斯大林在某一次談話，却又說現在完全消滅新工商資產階級，殊為錯誤。不久以後，莫斯科委員會又取銷他的話，仍要完全消滅新工商資產階級。該年三月斯大林發表一篇論文，『成功後的暈眩』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又減輕對於新工商資產階級的壓迫。但這種消滅的政策非常有效，甚至在短少的期間內，發生了力量，也足使私人商業不能復原。政府對於新工商資產階級這種大的壓迫，意在將一切私人貿易根本消滅，但農民的小販却除外。

除可以列於商人一類的私商而外，尚有大批的農民，攜着糖食、果品、牛油、蔬菜甚至肉食之類，站在街頭巷口，直接販賣於消費者，有的壯年男子捧着一捧枯萎的蘋果站在街頭，若干時，有的老年婦人，拿一小桶蒔蘿水，當作寶貝來販賣。尚有許多食物也這樣販賣着。政府也很想用納稅的方法來限制這種零販，可是零販總是逃避這種稅金。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常見有大批小販爲警察所驅逐，攜着筐籃，推着小車奔跑，以期避免法律的責罰。但從一九二九——三〇年的冬天起，却有較有效的方法以取締農民小販了。就是禁止他們攜帶物品包裹上火車。有時阻止他們進城門，而且把他們的物品充公。而最重要者，却是集團農場的產生，從此杜絕這種不合法買賣的物品的來源。農民若加入集團農場的，也不准用這種方法售賣他們的物品，即使是初次加入，也被禁止，但一到這種農場組織完全，農人便沒有個人的生產品出售了。這樣小販的嘗試也自要取銷了。農民倘若仍在勸業場中販賣他們的出品，定然處以重罰。這種壓制在一九二九年之末與一九三〇年最初二月實行最嚴。但自一九三〇年三月政府改組後，街頭上出現的生產小販比以前還要多，因爲他們中有

許多是代替着那些被消滅的新工商資產階級的食物店舖的。

這種小販，似乎難於完全撲滅。俄羅斯人民與全聯邦的人民一樣，本來就有這種向小販購買的習慣。農民們採用這種雜貨販賣制度，不知有若干年代了。這種雜貨場對於他們，不但是一種經濟制度，而且是一種社會制度。現在政府想用國家或合作機關經營的街攤小店來代替這種制度，則俄羅斯人民所愛好的，極不衛生的雜貨攤制度，可以漸漸地消滅了。

但若集團化繼續進行，就是這種最原始的私人貿易形式也要停止。再過兩三年之後，國家對於貿易的管理，也許如國家現在對於工業的管理一樣完善罷。

第六章 國外貿易

蘇聯的外國貿易，係政府所專營。國營貿易的原則，實為蘇維埃經濟的特徵之一。一九二一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之時，雖然私人貿易在國內市場上再度活動，但這種國營國

外貿易，仍不願當時商品的大恐慌，而毅然成立。蘇維埃的理論家皆相信，如果國外貿易一經放棄，政府便不能管轄國家的經濟了。他們承認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若由私人經營，足以使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相互混雜，且使蘇維埃經濟難免陷於萎縮破壞的境地。這是普通所熟知的。故主張國外貿易由國家經營實為正當。蘇俄自經帝國戰爭、革命與內戰後，物力凋敝，現在正待恢復時，蘇維埃工業當然不能與資本主義的工業競爭。而且應該以極高的保護關稅來保護本國工業。但是保護關稅太高了，就無異絕對的禁止外貨入口。可是蘇聯却正需要外貨的輸入。所以應由政府專營，外國物品雖然輸入，却不至與國家工業競爭。可是若利用固定的關稅制度，就難得到這樣的結果。所以稅率要時時變更，使外面的貨物得以按照所需要的分量輸入而又不致殘害本國的工業。

據蘇維埃政府的意見，國家對外國貿易實有國營的必要，至少，在全世界尚未成爲社會主義化，經濟制度尙未合理化、集中化之前，尤爲必要。對於這種國營的必要，我們實難否認。若沒有國營，對於經濟便不能有一種完善的管理和計劃。若論到集中經濟的管理制度

的基礎，更顯見國外貿易國營的重要。有些基本物品，如穀、石油之類，其價格係根據世界市場來規定，所以除非其輸出操在中央經濟當局的掌握中，則一般價格的水準，實極難於管理，而各種價格水準的管理，尤其困難。並且，貿易的權利，握在國家之手，則可以調度各種貨物的出入，以應付蘇維埃經濟的需要，所以消費物品的價格，可以降低比國內市場的價格還低，於是銷售出口，而以所得的資金輸入作為資本。本來對出口貨物，贈以獎勵金，自然可以發生同樣效力，但管理上却甚複雜而困難。總之，對外貿易的國營，在現在可不至於影響國內的貿易，因為各種私人貿易差不多全消滅了。

國家對國外貿易之經營，係由貿易委員會所執行。自然，所謂國家專營，並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我們知道，住在聯邦內的人們，常常可以寄些小包裏給住在外國的朋友，住在外國的朋友，也常常可送些小包裏給住在蘇聯的人們。在極小限度內，這一類事都是容許的。這些包裹，大抵是由私人遞送，並不由商務機關轉遞。比如有一個蘇維埃公民，他有朋友住在聯邦外，一年內他常常可由其友人得到一定數的小包裹。例如說，他可由其國外的友

人得到一包咖啡。不過他不能從外國商人訂購咖啡，外國商人也不能用船裝運給他，所以除了國家專營而外，私人絕不能有商業的關係。但是如果蘇維埃的公民有朋友在外國，可以送咖啡給他，那末即使他把所得的咖啡當作一種禮物接受，他將比聯邦內的最富的居民還要富，因為對於咖啡的徵稅，在一九三〇年之初高至每啓羅十五盧布。對於其他物品的徵稅亦甚高，對於華麗衣服的徵稅尤其高得不可言狀。

其他一切進出口貨物，都要經過貿易委員會。甚至合作社與國家機關的貨物，也是如此。凡消費物品與製造消費物品的原料，甚至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所售賣或所製造的物，品，都要徵稅。並且對於已經徵過原料稅的出售品尚要徵稅。比如，用以製造巧格力的可可豆固然徵稅。但巧格力若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又要徵稅。又如糧食業也要付所得稅，且要把大部份的利潤存入國庫。不過可可豆所付的稅，不但作為國庫的財源，且可藉此限制製造家，除製造糖食必需可可豆的分量外，不能多用。

國外貿易的經營是很煩難的。誰都以為把一切國際商業都集中於貿易委員會中，則

過度集中不免要發生肚大口小的危險。一九三〇年初，貿易委員會改組以前，國家貿易的組織極其繁重。大凡和蘇俄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中，蘇維埃政府都派有商務委員，代表貿易委員會，買賣物品，訂立契約。這種人通常就稱蘇聯的商務代理人。至若在尚未成立外交關係，或關係已經破裂，或有特別情形的國家，則在外國法律之下，組織一種特務公司，貿易委員會可委派此公司代表訂立關於商務上的契約。在英美兩國就是如此，在那裏就由埃姆多格 (Amberg) 與埃哥斯 (Arco) 辦理貿易委員會的事務。

如果國家或合作機關要向外國購備某種物品，必須具請求書經由託辣斯轉達於組合或辛的嘉，辛的嘉得到貿易委員會的執照，貨物方許進口。執照是否發給，全由貿易委員會決定。如果在國內即使貴些可以購得那種物品時，那末一定拒絕簽發執照。如果簽發了執照，就要把貨物的清單開給商務委員，以便在國外購備。清單先用俄文開出，然後由商務委員譯出交與賣主。即使購買小小的雜用品，也得要經過這樣麻煩的手續。所以向外國購買物品需要的時間太長，因此國家機關若需要較小然而甚重要的必需修補物件時，便常

常經過外國的相讓，私自購買，以圖節省手續。總計由商務委員經手的雜貨購買單，約佔他們經手的貨單總數百分之五〇，可是價值不過佔付給外國總數百分之五。這樣辦法，費時太多了。

在這種制度未全部改組以前，蘇聯國內又組織了一種特別機關，專門代合作機關或某種工業在國外買賣東西，因此把以前那些極壞的困難消除了。比如中央商店就是全俄一切消費合作社的代表機關，牠就可在外國市場直接購買貨物。農業、商店也為農業合作社盡同樣的任務。石油工業也有一種組織，可以直接在外國貿易，不再由商務委員經手，這樣，買賣可以較為專門，庶不必勞商務委員代辦一切東西。但是這種機關在外國的貿易，還得要受所在國商務委員的限制，且與蘇聯普通貿易公司合作。

政府又決定用分權的方法，來實行國營國外貿易的合理化。從此，貿易委員會不再有貿易的作用，不過是一種節制計劃的機關，對國外商務給以一般的指導。商務委員雖然仍是存在，可是只負買賣和訂立長期契約的監督的責任。他們不再接受購買瑣碎物品的定

單了。

這種分權和合理化的過程，完成於一九三〇年春。當時純粹在外國經營買賣商務的股份公司，全數改組，同時並有新公司創立。經此改組以後，這種新組合都為貿易委員會的一部，行其行政的、管理的以及商務的職責。這樣一來，向外購買可以減少時間的稽延，國營貿易也可減少複雜，因為這種機關，比以前更能自主。牠們不必購買一次，便向貿易委員會請求一次，現在他們得自由行使其權力。從這次改組之後，產生了十三個出口的組合，就是穀物的、木材的、亞麻的、毛皮的、家禽的、礦石的、工業的、食物的、藥物的、手藝的、古董的、菓食的與雜物的。尚有石油、煤、與火柴組合也各有一部，各管理其物品的出口，此外又產生了九個進口公司，即五金的、農業的、皮革的、非鐵金屬的、國際書籍的、樹膠進出口的與雜物的。中央商店有一個特別部掌管貨物的進口，對遠東的商務，則產生了一個名叫做「遠東國家貿易」的特別組合，掌管棉、絲、與石油以外的一切貨物的進出口。又產生了掌管進出口運輸的特別組合，叫做「國家水陸運輸」。這些公司都有其法律的根據，牠們對於貿易委員會

的組織關係，有若工業組合對於最高經濟會議一樣。這些公司直接經營小規模的貨物買賣。至若關於長期契約的締結，商務委員則要監核其交涉與結局。但契約一經成立，那進口或出口組合便有權支配貨物的輸送。例如商務委員與某外國公使，已簽定契約，要交付五千車頭，並載明在十八個月之內交完。但是進口組合，比如農業進口組合罷，便有權可以規定某時裝運某部。如果契約許可，農業進口組合可以規定在二月中裝運二千，三月中裝運一千，其餘下年二月中裝運。在契約限度之內，農業進口組合有極大的自由。所以也可以和海外商務委員辦事處的小職員接洽。凡俄文的註譯，都須預先譯為相與交易國的文字，以免臨時發生困難，又要去找專家來翻譯。從進口組合接到過，或希望接到訂貨單的外國商店訂貨單，蘇俄即希望其增派代表於蘇聯，以便雙方時相接觸。商務委員的工作宜簡單化，凡出口貨物，最好找到頂大的世界市場，免得跑到世界各處銷售各處商務委員的工作，尚無聯絡，所以在各國的商務委員，常在國際市場上發生競爭。為避免這種競爭起見，在柏林商務委員辦事處成立了一個中心機關，以便與西歐各處商務委員的活動發生聯絡。政府

希望經過這一番改組後，國家貿易的專營可以避免「肚大口小」的現象，因為從前所有的國外貿易，必經由貿易委員會與商務委員會發生這種現象。

與戰前情形比較起來，蘇俄國外貿易已大有轉變。一則，戰前的俄羅斯，進口貨以消費物爲大宗。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百分之九〇的進口貨爲原料與資本設備。一九一三年出口貨只有百分一九・二爲工業出品，到一九二八——二九年，就有百分之六〇・五的出口貨爲工業出品了。在戰前，俄羅斯是最大的穀物出口國家，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沒有穀物出口了。一九二八——二九年石油的出口，有戰前每年的四倍。家禽與日用品的出口，亦較戰前大有增加。

這種國外貿易性質上的大轉變，是反映着國內經濟的變化。進口貨中生產品超過消費品，即反映着共產黨決定從速使國家工業化。這種轉變，亦反映着聯邦已無法得到外債，以加緊工業化之過程。這就是國內市場消費商品大缺乏的原因之一。政府厲行貿易國營，強迫人民極端儉約，因爲由此所得的結果，可作實行偉大的五年計劃所必要的資本設備。

蘇維埃政府，藉着貿易的國營，要把一切出口貨中售價的大部份用以購置設備。具體的說，即是凡出口與銷售於國內市場的雞蛋以及牛酪的金錢，都要用以購買機關拖車、車牀與機械運送器。

資本設備的輸入，大抵是靠着工業品的出口，並不是靠着穀物的出口。除石油與火柴而外，凡蘇維埃的工業出口貨，和食品出口一樣，倘若要在國內市場出賣，其價格也許比在國外出賣的要高些。但蘇聯政府覺得資本設備是絕對不可少的，而這些工農出品，若能在國外找得市場，國內市場必感缺乏。因此蘇維埃貿易不但極力禁止消費物進口，而且限制國內市場所必要的物品出口。自然就表面價格而論，貨物出口難免不常受損失。但匯兌所得的實在價值，就盧布計算，總較其形式價值為大，足以抵補這種損失。

因為在國內市場可以獲得較高的價格，所以生產機關自然不急於求售於外國市場。有時因為按照計畫，要將某種物品出售於國外，便下緊急命令，禁其在國內銷售。結果，這些工業機關的本身，不致受何損失，不過贏餘不免降低罷了。託辣斯或組合，若出售其物品於

外國市場，得由貿易委員會的允許，免除原料稅，以補償其所受的損失。貿易委員會宣言，絕不使那些出售貨物於海外的機關受實際的損失，若有任何損失，則由貿易委員會的進出口來抵補。

農產物在世界市場上出售，價格雖然較低，但因這些產物，是由國家機關和合作機關購入這比由私人市場上購入要廉價的多，所以補償了一部的輸出價格的損失。一九二九——三〇年之冬，牛油在私人市場上，有時一磅賣五盧布。而在國際市場上所得的價格，不過此價格的六分之一。合作商店與國家商店中牛油的價格，自然比私人市場價格低得多。不過在二三月時候，合作商店與國家商店中，實際上買不到這種東西。自然這是由於抄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老法子傾銷到外國市場之故，蘇俄牛油的傾銷政策（dumping）早已大大實行。不過這個動機，與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傾銷有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待國內市場不能吸收那些工業出品時，才向外實行傾銷。但在蘇聯則完全相反，並不是市場的缺乏。因為國內市場，對於生產者仍屬有利。乃是因為工業化的計劃需要資本設備，為達

此目的計，遂不惜任何犧牲。

蘇維埃石油出口的發展，可以表現蘇維埃工業的真實成績。這種工業，現已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石油生產相抗衡。大部份的原因，是由於採用美國的技術以開墾蘇維埃的油井，建造輸油管，運油船，及其他近代的設備。在出口界中，牠已成爲蘇維埃政府的勝利牌。

關於木材，蘇維埃也能出口而無損失。因爲森林已歸國有，無需付私人以租稅，而政府又能從開採以獲大利。新農業資產階級及其他政治犯都被迫到森林中工作，這是有利於蘇維埃政府木材出口的又一原因。依照計劃，石油和木材兩種的出口，都要大大增加的，將來在世界市場中，定可佔一重要的位置。

蘇維埃出口貨，在世界市場上不斷地與他國競爭，已引起競爭者的驚奇。因此對於蘇維埃出口貨，發生反對的舉動。關於德國火柴的售賣，德政府已與瑞典協商，由瑞典包辦全德國境內的火柴專賣，而將蘇維埃在德國大火柴市場取銷。石油在德國的專賣也在討論

之中。

蘇俄因爲對資本設備輸入，感覺付款的困難，故不得不輸出一些物品。戰時的勇士，都跑到印刷所來工作，到處張貼標語廣告，請求先鋒軍來收集殘物破骨以銷售於國外。有時農場上的馬尾，也剪下來當做馬毛輸出國外，甚至婦人的頭髮也被迫剪落下來，出口販賣。並遣派地質考察團尋求新礦，希望出口的總數可以增加。

蘇維埃的國外貿易，正如蘇維埃其他經濟部門一樣，乃是建築蘇聯社會主義的一種基礎工具，而且要把顛覆全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日子加速。所以，蘇維埃對外貿易的政策，實具有一種顯明的政治意味。蘇維埃貿易，大部分用作外交角逐上的一個小卒。有些國家，對於蘇俄，尙未承認，有的對蘇俄復交，尙在考慮，但同時卻有大批的蘇俄物品輸入，不得不使陰險的外交家搖頭三歎。當此之時，世界市場的競爭已經尖銳化，同時因爲資本的堆積，有盈千盈萬的失業者充斥街頭，蘇俄的這種政策定可奏效。

蘇維埃的委員們常常說，若無外交關係，商業不能成功。對英國方面，因爲外交關係的

破裂，致使貿易一落千丈。而對美國，則商業交易不斷地增加。

蘇維埃政府認為：蘇俄需要美國生產物與技術上的幫助，更甚於美國需要蘇俄的貿易。共產黨所切望成功的五年計劃，實在是模倣美國的大量生產制度。若無美國製造的多數資本設備以及專門技術之幫助，則五年計劃幾為不可能。所以為實現此計劃起見，在這幾年內，蘇維埃政府盡力保持對美的貿易關係，任何犧牲在所不計。所以駐美通商代表會被誤認為共產主義的宣傳機關。然而蘇維埃政府相信：世界革命到達世界各處的時候，亦必達到美國；同時狂熱的共產主義者亦承認美國是資本主義最後堡壘之一。所以蘇維埃政府是否因幫助世界上最無勢力而又為俄羅斯共產黨最輕視的共產黨，以致危及五年計劃之成功，似乎是大大的疑問。

蘇維埃的國外貿易，是當作蘇維埃外交政策之一部分，另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活動於近東及遠東諸國。這些工業落後國家之為蘇維埃製造品的市場，正如其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一樣。所以他們固是資本主義國的殖民地，也是社會主義國的殖民地。不過蘇維埃

政府對於這些國家的最大希望，是世界革命。所以在這些國家中，蘇維埃的國外貿易，是直接與蘇維埃的世界政治相關的。蘇維埃政府又以為不列顛帝國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殖民制度的中心。倘若一旦不列顛帝國的殖民政策失敗了，則歐洲資本主義在後進國的全部統治都要瓦解。蘇維埃政府又以為不列顛帝國格外地可以攻擊，而且距瓦解之時已經不遠了。所以在成功希望較大的地方，用經濟的目的來達到政治目的，乃是最值得的。

所以不列顛帝國在波斯、阿富汗、新疆、與蒙古的製造家，都受到極度的壓迫，因為在那些地方，俄羅斯的產物以近水樓臺的關係，已打倒不列顛的產物，因為要打倒不列顛的製造家，所以毫無狐疑地以低於生產費以下的價格出售貨物於各該地。蘇俄產物，在歐美出售，亦係用此政策，不過其目的則在獲錢以購買機械及其他發展蘇維埃工業計劃所必需的工具。這種政策，實行於東方及其他各國，亦奏其效，因為所得的購買力，便可用以在資本主義進步的國家中購買工業化的工具。不過蘇維埃貿易機關，在許多東方國家，都不能將其售物所得的錢轉至他國，因為曾訂有契約，要將那些錢在出售地方，購買貨物回俄。如果

可能的話，蘇維埃政府也寧願不輸入這類產物，但因前述理由，牠不能如願。蘇維埃貿易機關因爲偽造不列顛商標以期驅逐不列顛的貿易，曾被攻擊。

不過蘇維埃政府爲打倒不列顛的貿易，牠不惜自己感受痛苦。一九二九——三〇年冬，有一個美國農業機器公司的商人，在俄羅斯與蘇維埃政府商議販賣若干機關拖車。當時蘇維埃政府正鬧得天翻地覆，需要機關拖車以爲春耕之用。很有計劃，蘇俄政府請該商人參觀一個工廠，裏面正是製造機關拖車。他看見有十二輛機關車，裝載在火車上，準備運往他處。這些機車色澤極其漂亮，好像該商人公司所備陳列的車一樣。那商人問，這種機關拖車要送到何處去。答的人很驕傲地說，輸出外國去。

蘇維埃貿易的確是擾亂國際市場的一個因素，因爲牠不像資本主義國的貿易，要受同樣勢力同樣程度的影響。蘇維埃貿易很少受國際價格變動，匯兌變動，金變動以及其他臨時變動的影響。從蘇聯輸出來的日用品，並不是因爲牠們在本國銷售，不能獲利，遂在外尋求市場。銷售於國外的商品，並不是按照「比較利益」的原則，而流出國外的。凡銷售於

國外的商品都由當局所指令，意在交換必需的進口貨而已。從黨的觀點看來，資本設備的進口，是必要獲得的。如果爲交付資本設備的貨價，不管國內價格如何或國外價格如何低，都得到出售貨物。如果穀物不能出口，那末雞蛋與牛油必須出口。所以，蘇維埃出口貨的種類和數量，是極不確定的。

至於進口貨，尤其時時變化。在過去兩年中，蘇聯在經濟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曾經購買了美國所有的機關拖車等機器。所以農業機器公司，一時生意興隆，而其股票飛漲，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中開了一個新紀錄。但這種生意是有時間性的，所以後來這個公司又衰落下來。後來蘇維埃政府決定自己製造自用機關拖車，自士太林格勒與智利安兵斯克（Ohelabinsk）二地的偉大工廠設立以後，即準備這種工作。關於鐵路設備的演進也如此。有一次，蘇聯進口大批的旋轉機，及其他鐵路設備。但著者知道，目前已不需要鐵路設備了，並且決定不再有這類東西進口。

所以，在將來，對蘇維埃貿易的反對，也許日益強大，因爲俄羅斯已顯然不再是可以永

久開闢的市場。駐在俄羅斯的外國商店，固然還可以有一個長時期得到有利的契約。但永久的循序的通常貿易，終不可能。蘇聯現急切希望根據這個，得到長期的信用和無限的定單。蘇維埃政府向來都按照契約所規定的時間，交付貨款，早已獲得相當的名譽，但外國商人憑過去的經驗，已不敢慫恿公司再和蘇聯交易。因為和蘇聯有來往的資本主義者都知道：他們在共黨的眼光中，正如俄羅斯的布爾雷亞一樣，同為社會的真正敵人，而且如果蘇俄情形改進，他們將受殘酷的待遇咧。

第七章 銀行制度

第一節 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 (Gosbank) 居於社會主義蘇維埃俄羅斯聯邦 (U.S.S.R.) 銀行制度的最高地位。這個銀行，設立於一九二一年，是軍事共產主義制度變為新經濟政策制度的一種結果。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後期，銀行及銀行關係的信用貸款制度，已經完全消滅了。國家機

關從國家預算領得津貼，全是不付現款的支票，國家工業把所出產的東西，賣給國家，也無報酬。私人貿易的經營，則採用貨物直接交易的方法，而不用金屬貨幣或外幣。

及至施行新經濟政策，工業就不能專用國家的津貼以資週轉。國家預算對於工業的津貼，雖未完全廢除，但為存放工業臨時存款並準備短期信用借款起見，不得不需用一種銀行制度，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對於貨幣經濟再度建立的態度，也就改變了。在從前，共產黨主張要廢除貨幣，而今一變新政策，又不得不用金錢為計算的單位，和交換的媒介。所以國家銀行的建立，與政府對於貨幣的新態度是有關的。故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委員會宣佈，命令設立 R S F S R 國家銀行（後來聯邦成立時，改為 U S S R 國家銀行），但和後來穩定貨幣的決議，並不一致。因為銀行制度乃是貨幣穩定的必要條件，所以國家銀行乃是達到穩定的一個預備步驟。不過穩定貨幣的決議，直到後來才見萌芽，而在國家銀行設立之時，貨幣之穩定尙少可能性，就是黨的政策，亦未曾允許哩。

銀行開始活動於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稍後，便設立許多支行於其

他各城市。在銀行成立初期，遇着了貨幣狂跌的困難。國家銀行終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毅然決定發行鈔票，十一月立即實現。鈔票的應用，自始即作爲一種固定的錢幣，而國家銀行的業務，即準此政策。不過這種比較固定的鈔票，係隨同蘇聯代用貨幣流通，而那種貨幣，始終是作爲預算政策之一部，繼續發行，故其價格日在低落。

國家銀行成立之第一年，國家尙未有固定的貨幣單位，所以不知道如何進行銀行業務。從第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的最後的貨幣改革止，兩種貨幣價值顯然不同：一種貨幣的價值和購買力，差不多完全固定，一種則價值狂跌，故國家銀行的業務，很感困難。在這個時期中，國家銀行一方面單使用跌價的貨幣單位，同時牠的鈔票又隨同這種貨幣流通。所以其業務自然是很不滿意。爲尋求一種穩定的根據，以便計算價格的增加及紙幣的低落，故終於採用名義上的金盧布爲計算單位，則將來若實行貨幣的穩定政策時，也可就此把鈔票的價值繫於金價之上。

國家銀行新票開始發行時，人民委員會議即告民衆說，鈔票兌現的開始日期，將由政

府另行公佈。可是這種日期始終未曾公佈，只不過允許將來終有一日可以兌現罷了。

國家銀行係由理事部所管理。該部主席，經財政委員會推薦，由人民委員會議任命。但自一九二九年銀行理事部改組以後，大半脫離了財政委員會的監督。自此以後，銀行幾已具有人民委員會的形勢。不過國家銀行雖脫離財政委員會，並不是說此後在發行方面可實行較保守的政策。反而同時發展了一種政策：就是使通幣與現金準備相分離。經此變化以後，國家銀行的形勢，也漸漸失去了那資本主義式的自主的中央銀行的意味，成了更典型的社會主義的制度，而與國家經濟合而為一。此後銀行便不再用保守的銀行政策，來反對共產黨的偉大的資本建設的計劃。這種改變，足使革命前遺留下來的銀行家與經濟家，失去他們的勢力。

國家銀行好像英國的銀行一樣，有鈔票發行部與營業部。鈔票發行部轉帳至國家銀行支付總部。國家銀行鈔票的最低限度的準備金，若以貴金屬和固定的外國貨幣計算，只有百分之二五。在起初，銀行鈔票發行額，有百分之三〇的固定準備金，但在一九二六年期

間，比率已將達到法定的最低限度，而且有很長一個時間已經接近最低限度的比率。這種事實，可從下列第三表中看出。不過鈔票發行額與固定準備金雖有法定比率，卻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銀行還發行大批的國庫券，完全沒有固定的準備金。

國家銀行係代政府經理財政，且是政府資金的保管處。其總行，分行與代理處，都買賣政府公債。這種分行，不但為國家銀行服務，而且為工業銀行、農業銀行以及其他銀行服務。所以，國家銀行有了分行，其他銀行就可以不必再設分行，一行數用，省費殊多。

以上是講國家銀行採用一種較穩定的貨幣制度，所以顯見重要，現在撇開這點不論，則國家銀行又是處理蘇聯貨幣發行及實行信用放款政策的一種中心機關。牠在這方面的重要，並不全由於牠是發行鈔票的銀行。牠監督放款政策，並不全持牠的貼現政策。牠並不像英格蘭的銀行一樣，以貼現率的升降為監督放款澎漲與緊縮的工具。國家銀行又可在蘇聯全部工業財政計劃的限制內，直接放款給工商界。

第 三 表

數年來鈔票發行額，固定準備金，與其比例的變化

第七章
銀行制度

			轉賬至支付 總部的鈔票	固 定 準備金	比 例 %
1924	十月	1.....	52,185	23,900	53.3
1925	十月	1.....	75,664	26,335	34.8
1926	十月	1.....	85,667	23,511	27.4
1927	十月	1.....	102,657	26,895	26.2
1928	十月	1.....	109,010	27,952	25.6
	十一月	1.....	112,328	29,007	25.8
1929	十二月	1.....	112,131	30,237	27.0
	一月	1.....	112,256	30,138	26.8
	二月	1.....	106,505	30,188	28.3
	三月	1.....	108,365	31,168	28.8
	四月	1.....	110,213	31,131	28.3
	五月	1.....	115,450	31,238	27.1
	六月	1.....	112,905	31,492	27.9
	七月	1.....	121,676	31,394	25.8
1929	八月	1.....	126,983	32,988	26.0
	九月	1.....	135,989	35,287	25.4
	十月	1.....	146,628	36,919	25.2
1929	十一月	1.....	156,586	39,558	25.3
	十二月	1.....	157,540	39,739	25.2
1930	一月	1.....	153,697	38,816	25.2
	二月	1.....	150,027	38,374	25.5
	三月	1.....	153,580	38,895	25.3
	四月	1.....	155,598	39,144	25.2
	五月	1.....	164,629	41,375	25.1
	六月	1.....	170,087	42,770	25.1
	七月	1.....	186,037	47,820	25.7

國家銀行有一統計計劃部，和 U S S S 的國家設計委員會 (Gosplan) 有密切關係，牠有一種工作，非常重要，即計劃將信用放款制度擴充到全國經濟上，所以一時曾擬把牠作為國家設計委員會之一部，使牠可以有兩重監督的機能。該統計部又與財政委員會的統計部及中央統計局，有密切的關係。

國家銀行的營業部，為使工商業與銀行發生密切的關係起見，又特設一部，專理各大工業（銀行所放款者）的銀行業務。有一信用部專管紡織工業，又有一部專管皮革工業，等等。這些專部，有兩大作用。其一是：監督銀行借與各工業的資金的用途。這種作用不但包含了處理（銀行顧客的）各種工業所得款項的存放，並且還替顧客調整資金以便按期支付。但較為重要的，還是監督銀行借給工業的資金的用途，這不但可以防止這些資金不合法的使用，且更進一步，稽察資金的用途；若發見資金用途不經濟，或未遵照國家設計委員會的指導，則報告於上級有司。所以國家銀行的這些專部，在蘇聯有計劃的經濟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且是國家設計機關直接管理工業之一種工具。

這種銀行專部，也幫助各工業擬訂每年計劃與每季計劃，尤其是計劃銀行放款的目的。各部將下年或下季各工業所需要的放款報告銀行。然後銀行當局根據這種預算，草擬銀行的放款計劃。

蘇俄的國家銀行，在世界中央銀行中，其地位是極別緻的，因為銀行本身及其顧客，都是參加創造國家的人員。因此，銀行對於國家各部經濟的關係，比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要密切得多。這種情形，對於銀行的全部放款組織，影響很大。

國家銀行雖與工業及其他企業有直接關係，但決定放款政策時所根據的原則，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商業銀行的原則全不相同。一則，其業務的進行，根本上不是為利潤。並不計及本利的安全。倘使依照國家規定的計劃，應該把一筆款項放給工業，那末國家銀行就把這筆款借出去，並不論及償還與否。至若工業是否能負責收回其生產費，自然是決定放款擴充計劃的一個因子。不過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因子。現在銀行的營業執照內，載有若銀行資本虧，則由政府補償；所以銀行是非常穩定的。但大都是由政府補助不能還債的。

工業，使其可以歸還銀行，並不是補充銀行基本資金之虧空。

國家銀行有擴充放款到工業及國家各部經濟的義務。前已說過，這種義務是由上級命令銀行執行。但是，銀行如何執行命令而不至損及其資力呢？國家銀行所以能實現這個使命，一則，由於他參與國家經濟的放款計劃的草擬，銀行又把關於工商農業所需放款的資料，供給國家計劃機關。這些資料，都是銀行代表由上述各種專部中得來。此外，有些材料，如關於償還前借的時間與數目的，關於各工業收付的損益的，都由銀行供給。然後銀行陳述其所能借給國家各經濟部門的款項的預算。國家各經濟部門對於國家銀行所擬放款收付的計劃，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意見。這樣，在最高經濟會議管理下的工業，可以抗議那種計劃，會議則將這種抗議，交付國家設計委員會，最後再送勞動保障會議。鐵路也可以通過交通委員會抗議銀行放款計劃。在抗議未送到較高當局以前，國家各經濟部門，自然可經由銀行專部，來與銀行協議。有時銀行也許主張盡力擴充放款計劃，不過這種情形甚少，並且要變更計劃，由銀行實行國家設計機關的威權與指導，然後才有這種情形。這種事例，曾

發生於一九二九年，當時磚的供給，不够滿足工業的需要，故得請求更多的放款，擴大生產範圍。

但是銀行與國家各經濟部門間，常常發生衝突的情事，因為這些部門所需的放款數目，有時超乎銀行預備應付給的以上，在這類情形下，往往銀行被壓制，不得不付給超乎預算的放款。應付的一個法子，便是多發鈔票；而其所以能多發鈔票，又因其鈔票發行部有穩固的準備金。凡實行固定金本位的資本主義國，鈔票發行和固定準備金都有法定的最低限度的比例，不能隨意超過，但蘇俄國家銀行，卻另有一個法子，他們可對國家說：『我們的準備金，是不許我們多發鈔票的。如其放款擴充超過預算額時，則必須由財政委員會籌備必需的資金。』

因為法律上規定，國庫券的發行，可以達到鈔票的四分之三的限制，所以國家可以發行國庫券，或從其他財源把資金供給銀行，以便工業得由銀行借款。同時，國家銀行鈔票與準備金的法定比率，仍可以維持住。

改組信用放款的組織，也是政府與銀行行政上的一種政策，使國內使用錢幣的交易可減至最小限度。他們希望各工業機關，商務機關，甚至新起的集團農場、國家農場間債務的履行，都經由銀行清算，不用貨幣。這種制度和西方各國的銀行支票制度，及銀行間的匯劃制度頗相似。不過這種政策，還更進一步。蘇聯諸經濟單位彼此間的關係，很相似於私人大公司中諸單位彼此間的關係。蘇聯以為國家諸經濟部門間相互負債的清算，簡直不必把銀行支票等物在彼此間遞送。大凡組合、託辣斯、甚至工廠債務的履行，貨款的取得，只要在記入於銀行的簿記上的借方或貸方就行。更有甚者，他們還提議把工業上的會計，大部分變為銀行制度，這樣，工業的會計部，可變為銀行的一部或一科。這種政策，適與有些黨人所持的理論相合，即承認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貨幣的應用是不合式的，並且應如在軍事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把牠廢除。所以貨幣的作用，便不再作交易的媒介物，而用作價值的一種簿記標準。銀行的軋賬，代替了貨幣，這不但通行於國家銀行，而且通行於全部銀行制度。不過國家銀行，是在國家經濟各部門與其他銀行之間，行使聯結的作用。

國家銀行爲發展這種政策計，已開始實驗這種新式的信用放款協定。今以國家銀行與道路交通人民委員會間的協定爲例來說明。按照這個協定，鐵路應把收入的款項，存於國家銀行的各地方分行中。每十天，由銀行主管部把這種存款作爲放款，記入於委員會的帳上。但委員會並不用這種款項。不過作爲國家銀行付給委員會的特別放款。付給委員會的放款數目，根據銀行與委員會間的協定，各月都是固定的，而那協定則每季修改一次。這種放款，一部份由各中央供應機關用來清償債務，一部份根據委員會的指令，分配於各鐵路的管理部。

國家銀行曾將鐵路的收入及由放款資金付給各鐵路的款，加以研究。同樣，又把國家各經濟部門的收入與支出，加以研究，其目的在使銀行運用其財源，更加有效。因此，可使銀行將其信用放款的擴充與鈔票的發行，減至最低限度。在鐵路經濟上，曾發現一種事實，即在一個月的上旬與中旬中，每十天的收入，佔全月收入百分之三二或百分之三三，下旬的收入，佔百分之三四至百分之三六。可是鐵路的開支情形，卻大不相同。中旬的開支，尙合適

當的比率，但各鐵路，上旬的開支，爲百分之五七，中旬爲百分之三二至三四，下旬爲百分之九到一一。所以銀行在月初不得不補助鐵路的財政，在月末又由鐵路償還。至若委員會的負債事務或借款損益的數目，則視委員會實際收入與每季計劃預算之間的相符程度而定。所以一九二八——二九年會計年度中，鐵路的收入約計一・八三〇百萬盧布，同時鐵路已有借款一・七五四百萬盧布，兩者之差額九千六百萬盧布，此數卽入國庫。在計算餘款時，若不使道路交通委員會吃虧，只有把信用借款上超過的數目，加上準備繳付給國庫的款項，作爲一種淨餘，借給委員會。不過這種款項，在該年也達一八六百萬盧布。其中有五千八百萬盧布，付給鐵路，以抵補額外開支。其餘算入國庫，其中有八千萬盧布用於鐵路建設，四千八百萬盧布爲其他預算需要之用。由這種事實，可見國家銀行（國家經濟中一部門）與財政委員會間的關係，是何等複雜。

爲實行銀行制度與國家經濟的統一政策之故，在一九三〇年的上半年，把蘇聯的銀行制度完全改革了。在那時以前，銀行制度大都抄襲資本主義國家的式樣。銀行信用放款

的進行，全憑匯票及相關的貼現制度。這種匯票，在歐洲銀行界中，通常都是由賣者書給買者。在蘇聯呢，先由工業機關，憑信用將物品賣給商務機關，旋寫匯票給商務機關，然後持向銀行中來貼現。這樣國家銀行用借款給工業的方法，來供給商品買賣的經濟。

農業集團化的發展，出乎意外的迅速，致使私人的企業失去不少，似可根據完全社會化的經濟，來修正銀行的制度。所以政府決定不再由工業放款給商業而代以銀行信用放款。這並不是說另加一種銀行信用放款，因為以前銀行放款給工業，係經過匯票及貼現的手續。但現在這個過程改變了，銀行放款是給與商業上的購買者，而不給與工業界的商品出賣者，並且凡非銀行機關，都不能實行信用放款。這就是說，在蘇聯內把匯票當作信用放款工具的一回事，實際上已不見了。

同時，國家銀行完全把從前對主顧的那種態度也拋棄了。在從前，根本只注意主顧是否有償還的能力，要求棧單以為借款的擔保等等。但自從工商業集中於國家機關以後，倘若國家銀行還要顧虛顧客的償還能力與保證品，未免太奇怪了，因為顧客就是創造蘇俄

之一員。

依照改組的計劃，國家銀行不必顧慮主顧的資力與借款擔保等問題，只負責監察其主顧所履行的計劃，究竟達到什麼程度。這是工業視察計劃上一個極重大的要素。國家銀行憑藉銀行的業務，由此可與工業更加接近。

照改組計劃的規定，國家銀行要依照國家設計委員會與國家銀行該年商定的參照數字分配給各種工業組合以一定數目的銀行放款，然後組合把這種借款分配於屬下的各企業。若得國家銀行的同意，組合可重新分配這種款項，給與各企業，若有增加生產的必要，就是事先不通知銀行也可以。重新分配之後，組合應即報告於國家銀行。銀行所應考核的，只是由分行付與各企業的款項，是否實現了計劃。假如是企業要求的資金，比參照數字規定的數目多，或無論如何不能實現計劃，國家銀行得加以調查，立即報告於組合與最高經濟會議。

改組計劃的要點，就在把各個主顧的所有賬目，轉為單一的活期存款（Current acco.

(B)各主顧賬目的基礎，則在參照數字所指定借與的信用放款。從此以後，其他主顧因為出售生產品，就把款付於其內，主顧也可由此以付其必需的開支。這樣一來，銀行放款的使
用，較諸以前使用匯票貼現與零星借款的辦法，更能和貨物的實際買賣發生較密切的關係。購買機關在支付貨價時，正可使用銀行放款，生產機關一將物品交付給商務機關，就得到這筆付款。這樣，銀行也可以考察計劃實現的程度，因為由資金的活動，可以估量出貨物的市場與生產情況來。

在革新計劃中，也規定國家經濟各部門與國家機關間的支付，可由國家銀行的信用放款行之。即兩種機關，彼此以債務和債權的關係行之。這不僅限於工業而止，委員會、合作機關、國家農場與集合農場，都可行之。

取銷國家經濟諸部門間的付現制度，可說是改組上最重要的一項。這種新制度，可以大大減少發行貨幣的必要，因為使用貨幣，大抵限於薪水的支付以及零星購買的支付而已。

第 四 表
I. 蘇聯國家銀行的貸借對照表
(千盧布)

資 產	1930 七月一日	負 債	1930 七月一日
現金	37,593	資本	325,000
純金，硬幣 金屬與外國貨 幣	469,725	準備金	139,945
證券	442,998	特別準備金	32,130
人欠	4,522,396	鈔票	1,860,366
財政委員會記 賬之工農業借 款	97,848	政府借給工農 的資金	109,221
事務所，分行， 代理處	965,681	存款及活期存 款	2,109,186
其他財產	541,221	經手費及利息	382,139
		其他負債	2,119,475
總 計	7,077,462	總 計	7,077,462

II. 蘇聯國家銀行鈔票發行部報告

1930年七月一日

第七章 銀行制度

資 產		負 債	
金幣與金條	39,450,363	轉給國家銀行的鈔票	686,036,596
其他貴金屬	2,547,844		
外國貨幣	5,523,639		
外國匯票	297,792		
其他資產	139,180,362	鈔票發行餘力	963,404
總 計	187,000,000	總 計	187,000,000

一八七

藉這種銀行的改革，國家銀行，差不多可變為短期銀行信用放款的唯一機關，加上分行，造成全聯邦統一的銀行清算制度。(Clearing System) 這種改革一經推廣，其他銀行的短期放款業務立即移歸於國家銀行，而其他銀行則純粹成為長期信用放款銀行了。

第一節 工電長期信用銀行

工電長期信用銀行(Prombank)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是工業銀行與電氣銀行兩者合併的結果。這個銀行，在形式上為合股事業，分任其股份者為最高經濟會議、財政委員會、貿易委員會、國家銀行、電力公司、省執行委員會等。因為係承襲以前的工業銀行與新經濟政策，所以有一小部份的資本為私人所有。但是現在打算除去其中不甚重要部份的私人資本，並且改變形式，即再不用合股的形式了。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其總股額數達一萬三千萬盧布，其中約有一百萬為私人所有。從前曾分過了六厘的紅利。但一九二八——二九年董事部決定不再分紅，並且將這種紅利資本當作特別基金貸與地方上重要的工業。

該銀行對工業的信用放款係受最高經濟會議的監督，而銀行又須將工業使用放款

不適當，或無效力者，報告於會議。對於 R. S. F. S. R. 烏克蘭及高加索均有分立的銀行。在烏拉爾 (Ural) 將成立一特別的分行。該銀行亦有代表在國家銀行中分理其業務。在沒有銀行代表的地方，牠與國家銀行的支行有相當的關係。

該銀行有特別設計部，擘畫信用放款的計劃。這種計劃，與省執行委員會的計劃相併合，送達於聯邦共和國的主管機關，又與國家重要工業借款需要計劃相參照後，再送達共和國內該銀行的支行。銀行的放款計劃，自經其銀行設計部改正整理之後，即送人民委員會，請求認可。而這種認可，又要參考國家銀行的意見，因為牠也許要加以修改和訂正。這樣經最後批准的計劃，都定有一個限度，以便對工業和電氣事業擴充信用放款。該銀行祇實施長期放款，因為當一九二八年組織銀行的時候，已把其所屬銀行的短期資產與負債都轉到國家銀行，同時又接收國家銀行的長期的工業與電業上的資產與債務。

該銀行的業務，是分配工業上的投資於各種工業。牠由財政委員會得到大批的資金。政府的意思，是把這種資金儲蓄起來，加在該銀行的特別資本上。但是政府可以隨時決定，

這種歸還來的資金，是否即作為資本，或者還給財政委員會。這種國家預算上可以支配的資金，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達一·二四二百萬盧布，希望在一九二八——三〇年經濟年度，這種資金可以大增。

照法律規定，工業應將其利益的百分之二·五作為銀行資本金。最高經濟會議且規定工業應把牠的資金長期存儲於該銀行。銀行對這種存款付與六厘利息。又工業應將拆舊費項下的百分之二·五，付該銀行。銀行有保管此款五年之權，損失資金中尚有百分之二·二，用為工業的流通資本，百分之七·五用為實際的修理與維持費。

銀行放款期間最長為四十年。新辦的工業，在其開辦一年後，即開始償還借款。借款的利息，全靠接收借款的工業所賺的利潤。石油工業的利息，如紡織工業一樣，付六厘利息。但冶金工業與煤工業只付二厘。最高利率為六厘，最低二厘。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銀行的總資產達二·二〇七百萬盧布，其中銀行獨有的資財達五三四百萬盧布。

工業電業銀行不但是工業電業銀行信用放款的根源，并且分配預算案規定的資金

的唯一機關，也是管理投資的重要機關。因此工業電業銀行也代理各種重要建設事業經理會計。德奈普羅斯陶奈電氣事業即其一例。所以銀行由此分爲若干部。有工作部，放款計劃部，冶金、燃料、化學、電學、木材等工業部及地方工業部。

第三節 全俄合作銀行

全俄合作銀行 (Vsesoyuznyy) 原爲消費合作銀行，係一九二二年由消費合作機關建議成立者。但在同年，又改名爲全俄合作銀行，該銀行不但解決消費合作社的需要，也解決一般合作社的需要，不過農業合作社則仍爲農業信用放款制度之用。該銀行的原額資本爲一千萬盧布，全爲各種合作社所認股。後來資本年有增加，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承認資本已達四千萬盧布，其中有三三、七九六、一七八盧布已經收足。該年有一四、七四一個合作社爲股東，一切中央合作機關均在其內。除消費合作社外，文化合作社、獵者合作社、家禽合作社、殘廢兵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都是股東。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消費合作社擁有百分之六一的股本；農業合作社，百分之二二；生產合作社，百分之二一；其餘則係不屬於這

三大類的合作社所擁有。

該銀行共有四十所支行，遍布於全聯邦，不過牠要靠農業信用貸款制度與國家銀行的支行，才能完成他大部份的清算業務，所以牠與這些銀行有很密切的關係。全俄合作銀行也是倫敦的莫斯科納羅尼銀行 (Moscow Narodny Bank Ltd.) 的大股東，又為里加 (Riga) 合作運輸銀行 (Co-operative Transit Bank) 的大股東。合作組織的進出口貨的金融周轉概由這兩銀行所承擔。莫斯科納羅尼銀行在柏林和巴黎都有分行，全俄合作銀行與世界重要口岸的銀行亦有相當的關係，也與他國合作銀行有密切關係。

該銀行的財源，第一就是他屬下的各合作機關所投的資本。合作社及同業公會的款也存於該銀行，同業公會則貸款與有關係的工人消費合作社。政府機關亦存儲相當的資金於該銀行。國家銀行也付大宗款項借與合作銀行，而財政委員會所給的款更多，總數幾及該銀行全部長期放款。

除這些財源而外，所有合作機關都要存儲百分之一〇的利潤為特別基金，其中百分

之四〇用爲擔保。其餘用爲給與合作機關的短期貸款。付款的合作社若有虧欠，銀行可歸還其所付款之一部，以補其不足。現在擬將這種付款的總數增至利潤的百分之二五。

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改組之前，該銀行不過是屬於信用放款制度改組計劃之一部，不論長期或短期放款，均借給合作機關。但按照新計劃，短期放款業務，完全歸國家銀行辦理。該銀行（全俄合作銀行）的分行也被取銷，其清算業務由國家銀行及其分行代辦。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所以有這種決議，係因爲政府要把所有的短期信用放款都交與國家銀行辦理。全俄合作銀行的短期放款業務，本來就與國家銀行的互相重複，所以改組之後，便免除了這個重複。而所以有這種改組，也因為要在全國家企業與合作事業之間，成立一種廣博的清算制度。

全俄合作銀行由股東全體會議所管理。這種股東會議在所屬合作社代表中選出代表，組織銀行會議。銀行業務由董事部直接管理。

第四節 農業信用放款制度

蘇維埃第九次全俄大會，定下了農業信用放款制度的基礎，並通過設立這種制度的決議案。不過直到一九二四年成立了中央農業銀行之後，才始產生這種制度。中央農業銀行爲農業信用放款制度的頂點。其次爲七個聯邦共和國農業銀行。再其次爲地方農業銀行。最後爲農業信用放款組合。

農業信用放款組合的入會費爲十盧布，但在較貧苦的農民可以分期付款。其中階級的界限是很嚴的，若把貸款借給新興農業資產階級（即富農）即認爲一種侮辱。信用放款組合的會員，因爲他們所屬的組合負債的關係，所以還要十倍的會費。至若貸款借給組合會員，其目的在用以改進農場上的生產，購買肥料、種子以及機器等物。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有九、三一四個農業放款組合，有會員七、二六五、六七九人。如果每個會員可代表一個農家，那末聯邦中已有百分之二八·六的農家加入了農業信用放款組合或農業信用放款銀行了。

農業信用放款組合，與其本地的農業信用放款銀行有密切的聯絡，且由放款組合的

中，地方農業銀行或共和國銀行或中央農業銀行可以借款給組合中的會員。經營農產物生產或買賣的合作機關，亦可由組合得到借款。本來地方農業銀行與農業放款組合也曾從事於農業日用品的合作的生產與販賣。但自農業合作社依照主要生產品改組為合作中心制度以後，（如穀物中心與麻業中心之類）那合作生產及販賣的直接機關便被農業銀行與信用放款取消了。

事實上，經過農業銀行由中央農業銀行借來的款項，可貸與農民個人，信用放款組合，合作農業機關，甚至那和國家農場和鄉村發生業務關係的國家機關，也可以得到借款。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此種借款的總數有九萬三千九百萬盧布，其分配如下：

農業生產金融的信用機關.....	五三四·四〇〇·〇〇〇
合作機關.....	二五一·六〇〇·〇〇〇
與鄉村及國家農場發生業務關係的國家機關.....	一四七·八〇〇·〇〇〇
未分配的.....	五·二〇〇·〇〇〇

蘇聯的農業，其金融也由合作銀行與國家銀行供給。在所有的農業金融中，農業信用放款機關擔任百分之五，三，國家銀行百分之四二，合作銀行百分之五。農業放款制度，注重於長期的生產信用放款。國家銀行融通了販賣上所需要的資金的百分之八十。但這種比率，自銀行制度改組以後，已大有變更。

農業信用放款制度也是城市與農業區域間付款的一種代理機關，在起初，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農業銀行的作用相重複。但後來信用放款組合一旦能代替國家銀行處理城鄉間的清算匯劃時，鄉間這類工作，便都由信用放款組合來處理。

有七個共和國農業銀行，各履行了共和國政府所付與牠們的職能。一般而論，牠們的工作就在監察放款組合及與組合有關的銀行的業務，並將業務報告於政府。牠們也草擬各該共和國的農業放款制度的計劃。

中央農業銀行有限制計劃，並監督其全部農業信用放款制度之權，且分配政府所給的資金。（這種資金是通過農業放款制度而作為投資。）中央農業銀行接受各共和國農

業銀行的報告後，便彙集報告於聯邦政府。且代表全聯農業信用放款制度，出席於各種委員會。中央農業銀行的決算，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達六三一、九九〇、〇〇〇盧布。

自從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會議決定改組全部信用放款制度後，就已準備把農業信用放款制度完全加以改變。因為非此則整個農業便不能完全社會化。這種運動，已於一九二九年開始，一九三〇年更突飛猛進。按照改組的新決定，中央農業銀行改為農業合作集團農場銀行。各地方的分行亦已取銷。農業信用放款組合要與國家銀行訂立協定，方能得到款項以應付農業生產的需要。農業放款組合須按借貸者之財政情境，借款的適當用途，以及社會的傾向等，實行借款，並加以監督。按照新計劃，凡集團農場，農業生產機關，地方農業生產組合，或其他合作機關，或農民協助委員會委員，或貧農，或中農，都可屬於信用放款組合。

第五節 N. S. S. H. 的市立信用放款制度

蘇聯市立信用放款制度的最高點為中央市立建築銀行。大凡中央政府為準備建

全聯邦房屋而積存起來的款項，社會保險金，以及由國家貿易與合作貿易及放款機關所得的利潤，共和國和地方建築房屋的用款等等，都存儲於該銀行。除此之外，所有國家工業機關，都要將其純利的百分之七·五，存儲於此銀行，以備自建房屋之用。

除中央政府所用款項外，上述的款項，亦可存儲於與中央市立建築銀行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市立銀行。這種地方市立銀行，按一九二九年通過的法規，係代替以前盛行一時的純地方性的銀行。所以，莫斯科市立銀行，就變為莫斯科境內市立銀行的中央銀行了。而以前獨立的市立銀行，則成為莫斯科地方銀行的分行了。同樣，在其他各處，都可改組現存市立銀行或新設一地方銀行，而成立同樣的地方銀行。

中央市立建築銀行，地方銀行及其分行三者合併起來，便成爲一個信用放款制度，從事銀行放款的積蓄、設置以及分配。這種市立放款制度，其活動範圍普及於市區及地方經濟，不過農業與合作機關卻是例外，因為牠們都自有其放款制度。其活動範圍與國家銀行及工業電業銀行不同，因為後二者在供給全聯邦與各共和國工業和電氣化計劃所需的

借款，而市立放款則爲地方工業與電氣服務。自然這三種銀行制度可發達重疊的關係。第一，三者活動的範圍不過到最近才嚴密劃分，由國家銀行及地方銀行借給地方工業的短期放款，仍由三種制度共同負擔。第二，地方銀行有時可以存儲全聯邦與共和國工業的活期存款，（如其工業所在的地方沒有國家銀行的全行或代理機關的話。）

地方銀行用作放款的資金，其來源甚多。其中百分之二二·五，在一九二九年，係由地方工業利潤中強迫取來。此外，凡爲建設地方企業用的地方預算案中的資金，一定要儲在地方銀行。此外凡市政事業所用款項及建築學校、酒館、中央食堂、戲院、療養地以及爲建築房屋用的各種資金，都可存儲於中央市立建築銀行，或存儲於地方銀行及其分行。除此種長期存款之外，尚有一大部份地方預算餘款的臨時儲蓄以及地方工業的活期儲蓄。地方市立銀行，亦得向中央市立建築銀行借款。

地方銀行的資金係用長期與短期兩種方法貸與地方工業，並作辦理市政事業如電力發動廠、煤氣工場與電車公司等之用。大抵中央市立建築銀行擔任較大的市政事業的

長期借款，而較小的市政事業的短期借款，則由地方銀行擔任。學校、醫院、療養院等設備的借款，亦由地方銀行擔任。

凡建築價格較低的房屋，如合作社工人的寄宿舍，工人自己的住宅，本區內各大小工業的房屋，其建築費都由地方銀行籌畫。

地方銀行（尤其是莫斯科的地方銀行）還用種種方法，使所放出去的信用放款得到有效的利用。每天銀行及其分行，派人推着小車，到上述各機關中，用最敏速的方法，收集各企業每日所收的款項。又他們正在試辦：替工廠代付薪工并代地方工廠領收款項；以圖增加現金流通的速力而便節省實際貨幣的必要。

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會計年度之末，所有地方銀行的決算幾達十四億。把中央建立建築銀行的決算包括在內，則總數幾達二二億。到一九二九——三〇年經濟年度，可望增加至三〇億。這種市立銀行借款與地方銀行借款的合作制度，足使以前蘇維埃經濟上薄弱的聯鎖加強。這樣，國家經濟的組織和領導，並不全靠中央政府了。合計起來，地方事業

和市政事業的生產和服務，其價值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何供給其財政，却是一個實際問題。而市立信用放款和地方信用放款的合作，就是解決這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有了這種制度，則市立事業和地方事業上的各種散立財源，都可發生作用，足以滿足地方和市的需要。依據法律規定，把特別金作為長期存款，也就用這種存款作為借貸的根據。所以有了這種制度，國家可增添若干可用的資本財源。現在銀行制度的改組，其結果也許會要把地方銀行的短期信用放款轉到國家銀行去哩。

第六節 國外貿易銀行

調劑國外貿易金融的銀行，除出國家銀行外，尚有一種特別的國外貿易銀行。該銀行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的會計年度內所經手的國外貿易金融資金要達各銀行所經手的百分之十六。國家銀行與國外貿易銀行所經營的國外貿易金融，大抵是關於進口貨者，因為凡向國外購買貨物的國家機關和合作機關，都要與出售者的外國公司發生金融上的關係。支付期一到，國家銀行立即付款。所以國家銀行的作用，便好像聯邦公共居留地的

中央銀行一樣。

第七節 儲蓄銀行

促進儲蓄銀行的發達，也是蘇維埃政府的一種政策。政府總希望人民儲蓄，俾能幫助國家籌設資本，這樣，不但可以免除貨幣流出，且節省市場上一部分現金，結果使商品可以多銷。因此，有許多工廠付給工人薪資時，就試用儲蓄銀行的存摺付給，並且希望工人若肯把工資全數存入銀行，除花費之外亦應一定可有餘剩。以前並有好些工廠，把工人的薪資扣留一部份，存在儲蓄銀行。這樣那麼他們強迫儲蓄，當然是不很普通的，不過由此可使俄羅斯的工人養成使用銀行信用的習慣，而不再用現金，甚至付給薪資，也可以免除再用現金。

第八節 私人銀行

自採行新經濟政策後，產生了一些私人銀行，應付私商信用借款的需要。但自私人商業沒落以後，私人銀行也不復存在了。

第八章 貨幣

蘇聯現下通用的貨幣，主要者為國家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即所謂「雪達奇」*Червонец*者）和財政委員會所發行的庫券。此外則為銀銅鑄成的輔幣多種。在一九三〇年正月一日，實際流通的國家銀行鈔票，總數為一、八四三、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國庫券有一、三四九、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他銀銅等輔幣則有二六二、一〇〇、〇〇〇盧布。據蘇聯統計學家說，現下流通的貨幣總數，對於價格平準的比率，較革命前少，這是因為戰爭與革命的經驗，使人民對通貨的穩固性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們便不再儲藏鈔票了。我們也可以說，這是由於銀行功用增加節省了貨幣之故。或許也就是反映出蘇維埃對於價格平準的統計之不精確。

國家銀行鈔票的虛金價，為七八·二四純金（*dolynas*）（一種貨幣，等於四四·四三三密里格蘭姆），約相當於帝俄時代的十盧布。發行鈔票之準備金的最小限度，為百分之二

十五的純金及其他貴重金屬及外國貨幣等。蘇聯本也願望國家銀行的鈔票可以自由兌現。但這終於不能如願。因為經濟迅速擴張之故，遂致鈔票發行準備金日益減低，那準備率亦徒成具文而已。

國庫券的發行額，本擬不使之超過國家銀行鈔票之一半，而國家銀行且隨時規定國庫券對鈔票的兌換率，每一鈔票可兌換十盧布的國庫券。國庫券的發行是沒有什麼準備金的。後來因為實施五年計劃，急需資金，才頒布法律，限制國庫券的發行數額不得超過國家銀行鈔票數額的四分之三。至於今後於必要時超出此限度的增加，也是意中事。

蘇維埃聯邦已經拋棄了在最近將來恢復金本位制的念頭。因受帝俄時代銀行家及經濟學家的影響，故於新經濟政策實行後，金融的改組，與他國如出一轍。這些舊派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認定除了恢復金本位外，實不能有安定貨幣穩固物價平準之方法。蘇俄當時也想再採行一種資本主義的計劃，故暫時一部分恢復了金本位。

蘇聯所以不能恢復金本位，及半金本位所以不能存在，實有二個理由。第一，由於穀類

的輸出不能恢復戰前的狀態；第二對於輸入的機械，要支付鉅額的款項。但共產黨領袖也覺得，即使能將本國人民所最需要的穀類，大量輸出，仍不能吸收充分資金，用作發行紙幣時的準備金。

照五年計劃，擬使準備金額於最後一年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已達二七九、五二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達五一八、五四六、二九〇盧布，假若每年都能按着這個增加數的百分比增加上去，則當五年終了，計劃的目的，一定可以完滿達到的。

兌換券既不會兌現，而且也不擬兌現，那麼爲什麼還要維持現金準備呢？關於此點，在蘇維埃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現金準備之作用，乃在支付本國急需的進口貨價，以防失了外國信用。這就是蘇俄設置現金準備的主要原因。

看第五表，可知自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實際流通的貨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從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五大銀行的存款及

第 五 表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蘇聯
五大銀行實際流通的貨幣；放款與貼現，存款與零星存款

蘇俄經濟生活

	實際流通 的貨幣	放款與 貼現	存款與 零星存款
單位爲一百萬盧布			
1924 十月一日	627.2	926.7	512.0
1925 十月一日	1,142.9	2,088.4	1,168.9
1926 十月一日	1,356.9	2,567.5	1,280.7
1927 十月一日	1,628.3	3,441.4	1,391.0
1928 十月一日	1,970.8	5,114.6	1,558.8
1929 十月一日	2,642.2	6,579.6	2,075.9
	十一月一日	2,833.6	
	十二月一日	2,872.6	
1930 一月一日	2,773.0		
	二月一日	2,686.8	
	三月一日	2,803.8	
	四月一日	2,876.1	
	五月一日	3,048.5	
	六月一日	3,155.9	
	七月一日	3,454.6	

零星存款，增加百分之三三·二。放款與貼現，增加百分之二八·六。自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國家銀行滙劃部的總贏餘較該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三七·八，在同期間工業製造品增加百分之一六·八，農業生產物則無變動。

從這裏，可以看出蘇俄的通貨膨脹，國家銀行鈔票和準備金的百分比，不過由二五·六降低為二五·二，但國庫券則並沒有什麼準備金，他跟着銀行負債的增加而濫發。同時可以注意的，就是價格並不隨着飛漲。

所以這裏就發生問題，為什麼物價水準不隨貨幣數量之增加而為比例的飛漲呢？這種情形，實由於蘇聯的物價水準並不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會因貨幣數量或流通速度的變化而改變。多數價格，都是由政府規定；而一切價格，也為政府所限制。這種有效的價格制限，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絕對不能實施的。但在蘇俄，不但執行制限的機關是政府所組織，甚至商品之生產及分配，亦由政府機關實行。所以蘇俄政府可不因膨脹通貨而擡高物價。例如最高經濟會議和貿易委員會若會同規定了每噸生鐵塊的價格——這個價格，

就是一噸生鐵塊售賣時的價格，可不必顧及政府當時的貨幣政策。但這也不是說，蘇聯的價格，完全不隨貨幣數量之變化而變化；只是說，那種變化僅能發生間接的影響，而且也不會即刻發生影響。不過蘇聯的市場價格，雖不直接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欲以一定的價格購買商品的許多人，則必大受影響；同時，以某價格所可買得的物品件數，也受到影響。

貨幣發行或銀行貸款數量的增加，即是購買力的增加，這與資本主義國初無二致。不過在資本主義國，價格上漲，會使買方所願意得的數量，等於賣方所願供給的數量；但在蘇聯經濟上，這種情形，不會立即發生。價格並不上漲，所以依官定價格物品的被需要，實較多於物品的被供給。

因此發生了一種奇異的蘇維埃制度，即所謂 *The queue* 者。人們常常排列成隊，等待購買那有限的商品；有時商品立即賣完了，便有許多人白白待了數小時，不得不轉回家去，翌日又來試試他們的運氣。同時，因食糧供給不足，又有一種口糧制的發生，所以現在我們很難說，究竟口糧制脫胎於行列制呢？抑行列制脫胎於口糧制？大概行列制發生於口

糧制之先口糧制則擬用以防止行列制的發生，因為口糧制規定每人只能獲得有限的物品，不得購買超過一定量的物品。所以一種商品要分配時，大家便拼命獲得這數量有限的物品；且登記過要買這種物品的人，不管需要此物與否，也不問他將此物儲蓄，或用以向他人換取其他物品與否，他總是購買的。

當政府盡力普及集團化並消滅富農和私商時，曾產生一種所謂箱櫃週 (Труп ве) 制，以防人民的貯藏。在許多城市或鄉鎮上，常有大隊工人糾察隊，挨戶搜查居民的箱匣；且將搜出來的許多貯藏布匹以及多餘的衣服和毛氈等類物品，拿去充公。假若搜查出來的物品，數量甚多，主人必被捉去，說他是違法的商人。這種搜查不僅行之於昔日的資產階級家庭，也行之於尋常的工農家庭。著者知道一件事，有一個俄國婦人，她的丈夫是一個普通工人，有一次曾將她所有的物件，運到莫斯科的一外國人住宅中，以避莫斯科箱櫃週的搜查。斯大林在一篇論文中，曾述及此事，因此使大家的搜查瘋狂鎮壓下去，所以箱櫃週也就暫時停止。

這種口糧制的不便和痛苦，世界將無人願意忍受。但俄羅斯人民，不得不過慣口糧制的生活。現在這種制度，已在他們日常生活中佔極重要的部分，並且還可以無限地繼續下去。因為共產黨極其厭惡貨幣經濟；甚至當新經濟政策開始時，他們也覺得十分不願接受貨幣。不過口糧制雖因了急切的需要而採行，但此刻的維持，仍多屬於主義的力量。所以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家，仍希望口糧制更切實推行，可以消滅貨幣的使用。其實足以代替貨幣經濟的，也只有這種口糧制。

近來銀行制度的改革，愈使「無貨幣的經濟。」這一個目標日就接近。這種改革的目標，就在應用銀行信用來代替貨幣，作為政府與各種合作組織的交易的媒介，例如有一汽車公司擬向鋼鐵廠購買鋼鐵，就不必直接用貨幣支付，只須在國家銀行中，從汽車公司賬簿上，過同額的一筆賬到鋼鐵廠的賬簿上就行了。共產黨希望改組完成後，實際作為媒介的貨幣，只用作工資和零星交易。

再者，由儲蓄銀行代付工資，也認為是減削貨幣使用的一種方策；他們希望工人慣用

銀行的支票，去支付他們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代價。再則因為共同生活的發達，大眾同居一大房屋裏，吃也是同在大飯廳內，也能够減削貨幣的需要。所以在儲蓄銀行有存款的工人，只消給銀行一個通知，銀行就會替他們照料房屋食料以及燈火等的開支。同樣在工廠裏，這許多開支，都可由廠方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支付，就更可以不必另設機關辦理。

當然蘇維埃的貨幣並不充分具備有其他本資本主義國的貨幣的特質。有時商品存放着很多，而擁有貨幣的人却不能爲那商品的消費者；因爲有幾種商品，是要根據口糧證來分配的。另外還有一種簿子，是證明某人是否消費合作社的社員。所以一個人若想多購幾種商品，他必須持有兩種證冊。但他也不能憑藉他的購買力和欲望，繼續購買，因爲物品供給的數量，非常有限，一個人無論具有蘇維埃貨幣及口糧證，或合作社員證，都不能任意購買。

作者常聽人說莫斯科花錢的困難。這在別個國家中說起來，似乎有些可笑；但在蘇俄，卻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大凡沒有家累同時又有相當多數收入的人，確實覺得不易花費這

一筆收入。可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則大不然，像這類無家累而收入甚大的人，差不多都將收入的大部分花費在考究的大菜館裏，或製備些時髦華麗的衣服，或買些無用而價值甚大的物件。這些人購買這許多奢侈而無用的東西，自然獲得相當的快樂；但這種奢侈的現象，在蘇俄却：對沒有。誰要在蘇俄的菜館吃得甘味，只好實行「晚食可以當肉」的政策。這種情形，不僅蘇俄人民如此，就是外僑也是一樣。至於各種奢侈品、香料、糖果或是啤酒等，必須用很高的價錢才能購買。但戲院音樂院歌舞院等，又很精彩，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花錢地方。

蘇聯人民，要旅行倒很便宜。任何人都有一個假期，在此期間，他們可以盡量滿足他們花錢的欲望。去年鐵道收入意外增加，即表明蘇聯人民的購買力已逐漸轉向於「貨幣可以履行原有機能」的幾個方面了。運輸委員會的職員，也十分忙碌，因為旅客的運送，像運輸貨物一樣，需要便利和敏捷。一九三〇年時夏秋兩季，乘車費曾繼續兩次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防人民更趨於游蕩主義。

因為貨幣職能的退縮，故蘇聯人民對於貨幣的態度，便發生一種奇異的變化。一般人從此不再希求貨幣本身了。我們知道，希求貨幣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徵，因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貨幣早已成為交易的媒介，且是衡量價值的標準。蘇聯商人關於他們的商品能否賣出，是不甚在意的，因為他們覺得不論賣得多少錢，終不及商品的生產費。

價格雖由政府制限，但貨幣數量過多，必使一般價格水準上漲。同時，他們希望少數奢侈品的價格愈益上漲。國家用這種方法，籌得繁重的資金，倒不會引起多大反感。因為工資微薄的工人，本不必購買這類奢侈品；至若有力量購買的人，雖不願價格上漲，但他們除此之外，又沒有可以花錢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現正努力設法吸收人民手中過剩的資金。並不是多數人民擁有多金，只因消費物的供給數量極少之故。蘇聯政府相信過多的貨幣，若能減少，則排列成行等待購買商品的人數，亦必隨而減少。政府所以常發公債，其目的也在此。貨幣在零星交易上的便利，防止了貨幣的完全消滅。但主義的權力，總想把貨幣的使用完全廢除，然後方可用銀行的支票來代替，那時貨幣的使用便永久可以消滅了。

蘇聯雖用種種方法，使貨幣的使用，日漸減少，以謀完全消滅，但同時爲什麼仍拼命發行貨幣呢？五年計劃內發表的資本建設計劃，就是貨幣不斷發行的一原因。而農業集團化迅速的擴張，又爲另一個原因。這不僅直接使貨幣數額增加，且促動資本建設計劃。因爲農業的新法的大規模經營，必須充分的機器，因此貨幣的發行遂更甚了。

因爲政府調節物價之故，所以共產黨相信價格不會因貨幣數額增加而有變化。這種信心，雖不會立即使貨幣數量增加；但共產黨因此覺得，要想實現計劃，惟有擴充貨幣及銀行信用之一途。現在蘇維埃的貨幣其意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完全不同，因爲蘇俄的貨幣，並不遵從一般的定律。在資本主義國家，貨幣的數量增加，意思就是價格上漲。但在蘇維埃則不然。所以蘇俄的貨幣，已不成其爲貨幣，卻變爲純粹的勞動票（Labour ticket）。這勞動票上面，就註明此票的所有者可以得到若干物品。

工業及集團化農業上的鉅額投資，並不來自預算的津貼。雖然這一類津貼爲數甚巨，但資金的來源，仍不外增加貨幣數量及其流通速度。共產黨理論家都相信，若資金的需要

可由增加貨幣數量與銀行貸款的周轉加速來供應，則可免除通貨膨脹的流弊。若要增加銀行貸款，必須要增加支票或國庫券。不過銀行制度的改組，乃在使貨幣對於銀行信用的比率降低，同時也不過期望銀行存款的周轉加速，使一定量的貸款能發生更多的貨幣作用。那麼，銀行信用數量的增進與流通速度的加速，其對於價格水準或貨幣需要是不是與等量的紙幣數量的發行有同樣的效果呢？這問題的答覆，不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都很重要。

農工商業需要資金時，其供給的程序如下：由銀行盡其所有，把款借出；若各銀行的款用盡，則請財政委員會追加工業預算。財政委員會通過追加預算後，遂議決發行國庫券，於是銀行可以放出超過新發行的國庫券數額的貸款。

資本純增數的計算，不僅決定於貨幣數量及銀行貸款的增加，也決定於貨幣流通的速度和貸款的總數。這自然不是說，資本設備、商品、工人及天然富源的數量，可隨貨幣數量或其流通率的增加而無限增加。不過有時交易媒介的總數，可以決定生產力的數量。因為

貨幣數量或其速度的增加，若到達某一點後，還繼續增加，則對於每單位貨幣的生產的刺激效力，便要減少。蘇聯貨幣的發行及銀行貸款的擴張，顯然都超過了這一點，故失其刺激效力。其原因就在一切經濟因素，都在蘇維埃政府支配之下。

關於工業化及社會化的進行，黨絕不因貨幣問題而停止。他們相信商業的循環恐慌和銀行貸款的拮据，固是磨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病魔，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之下，却是可以抗抵的。共產黨承認他們計劃的障礙，只在物質方面。在蘇俄，煤鐵都十分缺乏；有些工廠，不得已採用泥炭，致使生產成本增高。這種物質上的制限，惟有用物質的方法才能救濟。但是共產黨絕不因貨幣缺乏，遂不進行其計劃。所以計劃機關決定：只消是蘇維埃經濟能力所及，不論任何計劃所需要的錢財，都應設法籌備。

共產黨知道濫發紙幣，必致經濟恐慌。這種事，實不僅發生於資本主義經濟界；就是在一九二四年蘇俄貨幣穩定計劃未完成以前，也有一個時期發生過。不過他們相信，現在情形根本不同了。貨幣制度，已在新經濟政策以前，被歐戰革命和內戰所破壞。當時的工業設

備，差不多全被毀滅。而現今新發行的貨幣，並不用以平衡預算，却是用於生產方面。有一個共產黨說，假若新發行的貨幣是用以救濟失業的勞工，並購備工作的機械和自然原料，則那貨幣的發行決不厭多。

共產黨的理論家，雖然尊重貨幣的權威，這種向來供給資本主義驅使的貨幣，雖不願替共產主義工作，且尋找機會，以便給牠的新主人一些打擊。蘇聯只要方便，就把牠廢除。不過貨幣製造罪惡的權力，也不可忽略，所以貨幣的發行，應儘力減低，且設法用銀行貸款來代替。新發行的貨幣，也不是用以代替儲蓄所得的資金。價格必須提高，俾國家經濟的贏餘，用在擴充資本方面。至若新發行的公債，則常常由那些極不願接受的民衆承擔，結果大部份的新貨幣，都被公債票的轉賣和典押吸收了去，所以後來這種轉賣和典押，也被禁止。

我們可以說，蘇維埃的經濟力，就在廢除金本位和增加貨幣及銀行貸款上表現出來。在資本主義經濟下，這是很難實現的。蘇聯的物價，並不隨貨幣和貸款的過多而上漲。盧布仍然是簿記上一種有用的價值標準。所以假若蘇聯能注意昔日經濟學家的忠告，則資本

建設的進步必較目前更大。不過現在有一個疑問，就是通貨膨脹，是否已達到了極點，由此而生的對於經濟制度的危害，是否可以預先防止？

蘇聯的盧布，沒有法定的匯兌市場，盧布匯兌，只能從蘇維埃政府機關購買。蘇維埃貨幣且禁止出入口。盧布與美國金元的比率，是被固定的，國家銀行或行政機關要買賣盧布時，僅能依照這個固定不變的比率。至若其他貨幣的買賣的比率，則視其對美金的匯兌的漲跌而定。同時，對於外幣的進出口，也有嚴格的限制，凡居留在蘇維埃聯邦內已滿一月的外國人，若不經政府的特許，不得攜帶一外幣出境。政府只對於帶某一定額進境的外人才允許他帶同額出境。又從帶進來的數額中每日減去十盧布，那殘額才準許帶出。這被扣除的數額，常等於外國人在蘇維埃聯邦國內居住期間維持生活所需要的數額。

蘇維埃的公民不得持有外幣。他們若被許可出境，或受政府派遣出國，也只能以少數的俄幣兌換外幣，被派遣出國者所需用的外幣數目，則根據受派遣者的生活必需而按期匯寄。這些人將來回國時，假使還持有外幣的殘額時，須得即速兌換俄幣。

蘇維埃政府對外貿易的國營，可以防止國外貿易不致受到貨幣及銀行貸款擴充的惡影響。實際說起來，在外國市場上不論買或賣，無不依照着外國的價格，所以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制限對外的購買，俾在國外市場上出賣貨物所得的價格，常能充分用以償付日常購買的貨價以及憑短期信用貸款買入的貨價。所以貨幣擴充本身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再則蘇俄盧布既已完全脫離了國際匯兌市場，同時又與金價不相涉，所以蘇俄國內的信用和貨幣政策，並不因保護盧布外匯價值而受障礙。

蘇聯政府決定將盧布和國際匯兌市場及金價脫離關係時，正是盧布的外匯價值因貨幣擴充而跌到比金價還低的時候。蘇維埃政府認這項議決是有許多理由：第一，他們以為這與威信有關。因為盧布的穩定尚未實現，金融界的公意，已經受到不好的影響。若貨幣繼續發行，則蘇維埃貨幣的增加數量，必將向外流出，流到柏林等國際匯兌市場上去，盧布的價值，也將一天一天的下跌。可是國內的價格水準，又為政府規定，不能上漲，因此外國人便可在蘇俄以賤價購買商品或勞力。在蘇俄政府尚未完全消滅自由的國外匯兌市場

以前，外國使臣都常在柏林收買盧布，運到莫斯科，用以支付其職員的薪金。

蘇維埃政府常喜歡採行一種封鎖經濟，藉以限制經濟生活的一切元素。但在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數年內，卻完全無法實施，因為私商的經營，佔了全國貿易的大部分。甚至在這個期間，也主張國外貿易，全歸政府經營。想用國家貿易的壓力，去對抗私人貿易，這和消滅盧布的自由匯兌市場，同一作用。蘇聯政府所以能擴張貨幣及銀行貸款而不致破壞國家的經濟組織，就因為採取封鎖經濟政策的原故。

若用一九三〇年三月蘇俄的批發價格和英國的批發價格相比較，即可見蘇聯的批發價格水準，較高百分之二十五。若以蘇俄零售價格水準和美國比較，則蘇俄零售價格，較美國高出百分之六十一。莫斯科的外國僑民，常覺得蘇聯零售價格，較國際零售市場要高出一倍多。不過要真正比較國內和國外的價格水準，確也很不易。別國代表估計價格水準的許多商品，運到蘇俄時，可以售出的數量，往往極小，甚至完全不能售出。所以零售價格水準，更不能比較了。

這種國內外價格水準的差異，對於國外商品賣買的影響，很是有趣。所以紡織工業，必待國家補助，就因為牠要把用盧布由外國購買原料所需的款，付給國家銀行，而國家銀行則用外幣去清償這種債務；反之，石油工業將出產品銷售到外國，可由國家銀行領取代價（盧布），而國家銀行可將賣油所得的外幣，加在其外幣賬項內。但這種情形，用不到過於擔憂，因為石油工業，是工業中最發達的一種，而紡織工業也不得不納紡織物出產稅給政府。而更其重要的，就是兩種工業，都是國家的產物，兩者對於國家都有利益。其次，國內外價格水準的差異，也會使蘇俄政府的進出口政策，發生問題。因為盧布的實際的價值，較低於額面價值的金價，所以蘇俄的商品，在國外售賣，價格雖是低於生產成本，而可以不受經濟的損失，那因為盧布在外國的價值，總較其實價為低。反之，從外國買來的商品，其價值總高於用盧價盧布購買的價值，就是說，盧布在國外的價值，較低於國內。假若蘇維埃政府不會以低於生產成本及國內市場買價的價格，將商品在國外售出，這原則當更顯其重要。同樣，即使商品，可以在國外市場上用一種不足影響國內外價格水準的低價購買，這種商品，仍

要在國內生產；因爲蘇維埃政府尙未獲得充分的外國信用，以便購進資本設備的大半及五年計劃必需的工業用品。所以外幣的價值，便異乎尋常；盧布與外幣的理想和平價，簡直毫不相關。因爲二者是依蘇聯及外國的價格水準而計算的。

因爲國內外物價水準不同，再則貨幣又不斷發行，所以便有人偷運蘇聯貨幣入口。在柏林或里加，用蘇聯貨幣賤價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買得蘇聯貨幣。在蘇俄與波斯交界的城市中盧布的買賣價格，僅及其原價五分之一。不過這事是很冒險的，所以只有很少數的人在不法的交易着。常有人爲買賣少數盧布，被處死刑。但又因蘇聯政府提倡外人來遊歷，而對於這些人，又不便嚴查，所以蘇俄貨幣，仍被偷運進口。因此政府方面，遂不得不運用一種奇怪的方法來制止，就是凡在政府商店中購買地氈、珠寶、書畫、古董以及普通藝術品時，遊歷家必須用外幣付價，絕對拒用盧布。政府拒絕本國貨幣在本國設立的商店使用，真是奇怪的現象呵。

蘇聯固然能十分控制所有的經濟元素，但貨幣與貸款制度總難於再擴充了。固然有

時也增加一點，但若過高，必致防礙生產和分配。口糧制的困難，已經說過。再則假若貨幣和銀行貸款的擴充，仍照現狀繼續下去，則商品貯藏的結果，必致現存的商品的飢荒，無法消滅。但貨幣發行及銀行貸款的擴張，達到了限度，便發生勞工的不足，并工人的轉工。在從前許多工業都互相抬高工資以招致勞工，工業上的普通工資率，雖由設計機關規定，但在短期內增加勞動者的工資，仍是可能的。這種辦法也可以防止生產費的降減。

現今蘇聯政府對於那些貯藏銀輔幣的人或宣傳蘇俄貨幣不穩定的人，都盡力施以壓制，這種壓制正可以證明蘇俄人民對於貨幣制度的信仰，已經發生動搖。

不過現下貨幣的濫發，未必就會引起經濟的危機。況且蘇維埃政府能用一種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採行的方法，來防止這種結果。總之，蘇維埃現下的貨幣制度，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下的那種貨幣經濟，所以純用貨幣的看法，也不易決定其最後的成功或失敗，這就是蘇聯貨幣經濟的安全保障。

第九章 合作制度

第一節 緒言

蘇聯的合作運動，在本質上，和世界各國的合作運動完全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組織，總不外兩個目的。例如美國牛乳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就在出賣合作組織的生產品，使其社員得到最大的利益。或者還有一個目的，便是發展一般的合作運動，所以為改良社會經濟的一種基本而普遍的工具。但第二個目的，常常付之缺如。我們可以說，蘇俄以外的其他一切合作組織，差不多完全為其會員謀目前的利益。

可是在蘇聯卻不然，合作社社員目前的經濟利益，完全是第二問題。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就在根據俄國共產黨的計劃與原理，幫他們組織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運動，大不相同的地方，我們應該不要忘記。事實上，這種差別，非常之大。所以「合作」這個名詞，可否應用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組織上，實不無問題。蘇聯的合作組織，

很可當做俄國社會主義之一部分，並不是世界合作運動之一部分。

蘇俄現在的合作運動，和革命前的合作運動，差不多毫無關係。在革命及軍事共產主義期間，舊日的合作機關，實際上已完全消滅。現在的合作運動，差不多全是在新的指導下組織成功的。舊日的合作運動，根本和革命不能調和，共產黨認為必須抓住合作組織，使之適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實際上這個目的果然達到。現在的合作運動，完全由共產黨所指導，其目的全在發展蘇聯的一般社會與及經濟的計劃。

合作社大約可分三大類，即消費合作社（Consumers' Cooperatives）、生產合作社（productive Cooperatives）、農業生產合作社（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s）。除此而外，還有一些雜類的合作組織，例如獵人合作社、理髮合作社、文學合作社等等。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就想用種種可能方法，鼓勵那些無法加入社會化經濟範圍內的人民，組織合作社。俄國本來是個農業的國家，所以國營工業所雇用的工人，和全人口相比，極為小數。而合作社所負的責任，就在使一般大眾和社會化的生產物品相接觸。而合作運動

的成功，一部分即可決定『退回到資本主義』（即採行新經濟政策）的時間，究竟要多少長。假若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待社會主義直接建立在國營大量生產工業之上，才算成功，那麼新經濟政策便得無限地延長下去。列寧說：『應用合作及電氣化，我們便可建設社會主義。』又說：『只要合作者思想明白，生產的工具大家公有，無產階級又戰勝小資產階級，這種制度，便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根據這種宣言，共產黨便把新經濟政策的生命，儘量縮短。應用三大合作組織及其他雜類合作組織；果然把新經濟政策的時間縮短，而縮短之速，無論黨內、黨外、俄國非俄國的人，都認為是不可能的，然而實際上，居然實現了。

三種合作社中最重要的，乃是消費合作社，其會員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已達三二、七五八、〇〇〇人，希望到一九二九——三〇年可達四〇、二五八、〇〇〇人。會員中，屬於鄉村合作社者有一二、八五二、〇〇〇人，屬於城市合作社者四〇、二五八、〇〇〇人。城市人民加入消費合作社者，其比例較鄉村人民加入者多。在理論上，入會純係自動，但因為非會員有許多不便利，所以大凡有資格加入的人，無不設法入會。不過這種傾向，也只是

在最近三年內才發展；即是說自一九二八年起，入會證性質上已成爲一種口糧證。大凡公民權利未被剝奪的蘇聯人民，都有入會的資格。消費合作社的最後目標，在使凡有資格的人員，都能入會。

自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消費合作社組織以來，那股份的費用曾經過很大的變化。最初是各會員繳納一定的費用。繳費的數目很少。到了一九二四年，便法定爲五盧布。其後又採一種新政策，以各會員的月薪而定。最後定爲一個月的薪水，但可分期付款。這個定則並適用於以前入社的會員。舊會員們都要補繳到一個月的薪水。但是實行上頗感困難，所以究竟能否實行，還是問題，一方面因爲繳費逐漸加多，他方面，又因有一些稀有的物品，只有憑入會證才能得到，所以消費合作社的股本，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總數已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超過截至該年止歷年所積的股本總數。

至若贏餘，並不分給股東，因爲實際上，一個人只能有一股，不能因爲分配少數的紅利，致使簿記上增加麻煩。對於購買者也不派給紅利。因爲用這種不給紅利的辦法，貨物的價

值便可降低。除出某種商品而外，任何人都可在合作社所管轄的商店中自由購買，但對於這些商品購買機會的限制，卻是一種有力的引誘，使人們不得不加入合作社。大凡不是社員的人民，若要購買這些限制的商品，必須出兩倍的價錢，所以入會的經濟利益，非常顯明。有一些東西，若沒有入會證，只能在私人市場上購買，且須出三四倍的價錢。

消費合作社分三大類：一為鄉村消費合作社，二為城市工人消費合作社，三為交通工人消費合作社。一九二八年三種合作社的總數為二七、七〇九，管轄商店八七、八六三所。消費合作社的政策，是採取美國連鎖商店的辦法，所以希望商店數目的增加，較合作社數目的增加更快。各合作社又組合為合作協會，協會設有堆棧，將貨物送至各合作社的商店。為躉莊購買起見，一切消費合作社又組織一中央購買協會。在大城市中，也有躉購的組織，以便該城及附近區域的購買。中央購買協會和城市合作社的躉購代理機關，都是作大規模的購買。牠們代表消費合作社，俾便和國家大託辣斯及大組合接洽。有時託辣斯和組合的堆棧都劃歸中央購買協會及其他批發消費組織，貨物直接由工廠運送到協會及其他合

作社的堆棧甚至直接送到商店，中央購買協會的職責，係領導一切消費合作社，舉行最新售貨法的展覽會，分配人員於合作社，組織會計制度，及其他類似機能。

中央購買協會，自己也設立種種製造工廠，大城市中的躉購組織，更設有製麵包的工廠，供給城市人民食用。有時也有很大的牛乳場，乳牛可至數千頭之多。此外就是冷藏工廠，保存容易腐敗的食物，不過，消費合作社的冷藏工廠，完全辦理不得法，有很多食物，都腐敗了。

中央購買協會，也營很大的進口貿易，這種貿易上最重要的一項，便是茶。中央購買協會和大英批發合作社有密切的關係，這種合作社，對於蘇俄的消費合作社很有利益，因為牠可以控制英國各地所供給的茶的大部分，再則牠對於全部茶葉市場的情形，也非常明瞭。至若消費品的輸入，差不多完全要經中央購買協會之手，不過這種輸入量，並不認為重要，因為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卻在把這些物品的輸入數量，減小到最小限度，俾得儲集貨價，向外購買資本的設備。

中央購買協會對於所屬合作社之較貧弱者，亦予以經濟上之協助。尤其對於人口稀少區域的合作社，協助最多。再中央購買協會及消費合作制度的其他部分的財政，一部分也賴全俄合作銀行（All Russian Co-operative Bank）的融通。在這個銀行中，中央購買協會是最大的股東。在過去，中央購買協會也向國家銀行大借信用貸款。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消費合作組織的金融，大部分是靠信用放款及利潤的儲集。但自從合作社徵收入會費的辦法改變後，已不再十分依賴銀行信用放款了。

消費合作社所出賣的東西，幾乎包括在蘇聯出賣的一切消費品。其營業的重要部分為雜貨及肉類的零賣。也賣新鮮果子及蔬菜，不過這一部分的營業還未十分發展。但除了雜貨而外，也有一些商店出賣棉織物、陶器、布匹等等。

合作社和躉購組織，在公共伙食的供給上，也佔一部分重要的勢力。合作飯館和『烹飪工廠』都歸牠們管轄。各工廠工人的伙食，通常都由各工廠的工人合作社包辦。公共伙食的重要性，現已逐漸增加，希望將來在城市中，私人的烹飪和飲食可以完全消滅。現在新

造的寄宿舍，就沒有廚房的設備。公共飯館和公共食堂的數目，近來增加得很多。

曾有一個時期，消費合作社，在鄉村中也是收買穀類及其他農產品的一種重要機關。但在農產品豐富的區域，這種工作，差不多完全停止，其他地方也逐漸消滅。因為這種工作，可以由農業合作機關來担任。又如皮貨，則直接在人口稀少的區域向人民購買，因為在這些地方設立這兩個機關，不很適當。

消費合作社也担任許多文化的和宣傳的工作。合作社的人員都要受特殊的訓練，也做有普遍教育價值的推廣工作。合作社且備有活動電影機，到各地開映特種合作影片。

消費合作社中的幹部人員乃是黨員，而這種組織也完全由黨支配。所謂民主的支配的夢想，是完全禁止了。重要人員的選舉，也完全依照黨部所擬的名單。國家對於消費合作社的管理，固遠不及對國家工業的管理，但受黨部支配的程度則甚大。

第二節 生產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的目的，是想在社會主義的軌道內，作一種小規模的工業。在革命以前，俄

國是一種開始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這種東西，在西歐已經發展之後，才介紹到俄國來，所以在俄國建立的機器工業，常常都是大規模的，機械性很高，每一工業單元，能產生大量的出品。所以不論從這些無產階級工人的心理上，或從工業組織的立場上看，這些大規模的工業較易於社會化。但手工業的工人，卻是另一問題。按大戰期間大工業生產破產以後，更加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城市發生飢荒，都市人民逃至鄉村者為數甚多，所以手工業者的數目便突然增加。這些手工業者的觀念和心理，即使不是小資產階級的，也很容易走入這一途。假若政府容許手工業者發展其個人的生產與貿易，則工商業發達之後，他必十分富足，並且違反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至若在農民方面，也常常有這種發展的危險，所以蘇維埃政府和黨，認為必須把這些工人組織起來，使他們的觀念變為無產階級的，而非小資產階級的。生產合作社便擔負了這種責任。

生產合作社除了把手工業者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範圍內而外，其所以被重視者，還有兩個理由：第一，成立了許多小規模的生產合作社，便可以把失業的緊急問題解決了一部

分；第二，這些合作社的生活品，一部分可以救濟時常所感受的貨物荒。因為這些合作社，不但生產國內市場的物品，也生產一些物品輸出國外。假若不組織生產合作社，這些貨物當然也要生產，不過有了這種組織，國內市場及輸出的貨物可以較多。並且，即使沒有這種組織，國家也能用較低的價格得到這些貨物，因為合作社必得把他們的生產品賣給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因為這種理由，所以政府和黨部便積極組織生產合作社及生產合作協會，並予以指導，以實現完全社會化的最終目的。

生產合作組織的基本單位，稱為阿台耳（Artel）。他們也許只有五六個社員，多則可至數千，但這種情形很少。阿台耳係由委員會管理，委員通常為三人，由社員中選出，其中一個為主席，處理阿台耳行政，工作訓練，生產品販賣，以及和其他經濟機關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又委任一會計，在規模較大者，則為會計部，負責分配利潤，增加資本。在理論上，委員通常是阿台耳工人的代表。這是在理論上和國家工業不同的一點。因為國家工業的經理人員，係由政府所任命，對於工廠不直接負責，也不受工人的支配。在鄉村中，阿台耳工人可以在

他們自己家中工作，只從生產合作機關接受一定分量的生產品單位。在這種情形中，係由合作協會負責買賣，並供給原料。不過這些協會，只把他們的生產品賣給國家機關和合作機關。一個協會的會員可由他自己的合作協會出售其生產物。

至若城市阿台耳的社員，係每週或每月領薪水一次，或如其他工廠實行包工。工資的多寡，並不直接決定於阿台耳的利潤。在一定時期終了，並不計算利潤，也不分配紅利。當然，工作的利潤，在相當程度內，也決定社員的工資。不過各人所得的工資數目，却有一定的限度：第一，有一個絕對的限度，一個人一月所得，不能超過五百盧布。第二，在國家企業上，同樣工作所得的報酬，通常也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便不能再有報酬。不過實際上却規定工作的種類，使工人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所以在有成績的合作事業，其報酬往往較同樣國家企業的報酬為高。但利潤和工資若有過高的傾向，便由勞工交換局派來一些工人，加入阿台耳，使原來工人得報酬機會減少。

阿台耳的利潤，係用以增加資本，擴張事業，故其結果，工人的數目亦漸漸加多。利潤也

有一部分用於設置工人俱樂部，改進工作環境。利潤的百分之二十五，存儲於全俄合作銀行，作爲特別資本，俾得放款給與合作事業，百分之十則作爲所得稅，繳給政府。

城市阿台耳的經濟來源有數種，一爲銀行借款，二爲社員的入社費，三爲社員的借款。前一種借款，係由國家銀行及全俄合作銀行借給，但現在大部分借款都只由後一種銀行借給。當阿台耳初次成立時，社員中若有多數資金者，得將大部分借與阿台耳，可得息八厘乃至一分。社員每人都要向阿台耳納費，若無力納費，得由其所得工資中扣除工資以每週計算，扣除數爲百分之五乃至十五。

這些工業生產合作社，有許多很有成績。因爲蘇俄無時不感覺貨物的飢荒，無時不懇求工業生產品的增加。所以合作社的市場問題，並沒什麼困難。而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也隨時準備購買牠們的生產品。牠們所製造的物品，種類極多。至若阿台耳管轄下的工人，並不屬於同業公會，不過假若以前曾是該會會員，也不退出，但會員資格，兩年後即失去。

蘇聯的一切工業生產合作社，都屬於聯邦共和國的生產合作會議。最高機關爲生產

合作社聯合會全聯會議 (All Union Council of Producers Co-operative Unions) 是全部合作組織的計劃指導機關。還有一個相關的組織，稱爲全俄生產合作協會聯合會 (All Russian Union of Produc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係管轄其所屬的生產合作社協會，並代協會供給原料，籌備借款，出售生產品。加入的工業約有一百八十種。加入全聯會議者，約有二百種協會。共產黨的目的，是主張生產合作社協會，應該把一切合作社，不論從事何種工業，都包括在內，並且把一切工人都組織起來，所以，最後沒有一個獨立的工人，也沒有一個獨立的生產合作社。

但是，此處便有問題發生，就是如何使在全聯生產合作會議所管轄的工業合作社的工作，和最高經濟會議所管轄的大規模工業的工作發生相互關係而不衝突呢？有些工業生產合作社，因爲逐漸擴充的結果，以致其規模可以和國家工業的規模一樣大。因此，在原料供給上，有時國家工業遂和合作工業發生衝突。有時地方政府且強迫機械化的合作工業，成爲國家工業，由地方政府管轄。所以後來黨便命令全聯合作會議要會議指導其所屬

的合作工業，把工作集中於當地原料豐富的那種工業上，以免和國家工業競爭，致使原料感覺不足。同時又命最高經濟會議：大凡新工業的建設以及現有工廠的擴張，應竭力避免重複。也命令合作工業，大凡製造一物品時，不必遵循一切步驟，因為有時半製成的原料，可以由國家工業以甚廉的價格購得，合作工業只消做最後的完成工作就够了。

新經濟政策衰落之時，私人貿易和私人工業也就消滅，而同時也就有許多私商獲得了經濟的救助，因為小的生產合作社組織成功，他們本人和家屬便在那裏找得了職業。而這種職業，差不多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因為大凡從事過私人貿易或工業的人，都失去了選舉權，所以，便不能被國家工業所僱用之故。據說以前的這些私商，頗賺了不少的錢，但這是和蘇維埃合作的基本原理相反，因為在生產合作社中有成績的社員，不能因為他的成績便得賺許多錢。所以舊日的私商或屬『被剝奪』階級的人，若被發見在生產合作社中，便即刻被排除，不論他對於蘇維埃合作制度的原理如何表示服從。因為自實行『消滅富農階級』以來，他們已有許多人設法加入了生產合作社。最近肅清富農的工作，更為加甚。

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照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計算，共有一、四六〇、〇〇〇人。由一九二六——二七年到一九二八——二九年，社員增加了三倍以上。這種加速的發展，係由於獨立工人受極端的壓迫所致，而這些工人，也不容易得到原料，或出售生產品。一九三〇年正月頒布了一個命令，禁止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對非合作社的社員供給原料，或購買其出產品。這種命令，當然也使社員增加。至若生產合作社生產品的總價值，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爲二、四二四萬盧布，比一九二六——二七年增加了五倍半。至若股本，在一九二九年計算，已達五千八百九十萬盧布。一九二八——二九年的贏餘爲八千二百九十萬盧布。

第三節 農業合作制度

蘇聯的農業合作制度，現在正經過一種大變化。蘇聯的任何制度，若從靜的觀點來看，極難描述，因爲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一種永久改組的狀態中。這種情形，尤以農業合作制度方面爲然。農業合作制度，在一九二六年，開始在一種新的基礎上經過了一番改組，但

是後來集團農場運動積極進行，又不得不把農業合作制度加以全部改組，那時這種制度尚未完全組織成功。一九二六年農業合作制度的改組，係以所謂「中心」(Centre)者為基礎。這種中心，分為兩大類，一類包括所有的農業中心，一類包括牧畜中心。前者為穀類中心，蔬菜中心，果、酒、蔬菜中心等八種。後者如牛中心、羊中心等六七種。

上述種種中心，都係依照俄國的政治經濟結構而組織，所以最低者便是村中心，其次鎮中心，再其次縣中心，省中心，最後乃至聯邦共和國的組織。不過實際上，並非各種中心都具備這種階級。一個鄉村中，往往沒有一個以上的中心，甚至全省中也沒有一個以上的中心，不過有時鄉村中可有數個中心的代表。中心都儘力設法，使一鄉村專門生產一種主要物品，因此在該村中設立一相當的中心。但實際上，除了該中心所處理的主要物品而外，往往還有其他生產品，所以大凡有剩餘的生產品，即使不是中心所處理的，也由中心收買，準備送到該中心的鎮組織、縣組織或省組織。所以一個村中雖只有一種牛奶中心的組織，但該村中若有少數剩餘的小雞或雞蛋，也可以由牛乳中心收買，不過家禽生產品應該在最

方便的收集地點轉到家禽中心去，各省中有一個中心聯合會，使各中心發生關係，而在各聯邦共和國，更有一種省聯合會組成的聯合會。蘇聯政府且希望成立一個全聯的中心聯合會，但現在 R S F S R 諸聯合會所組成的總聯合會，却具有兩重作用，可以代替這種計畫中的全聯組織。此外尚有一個中央購買機關，稱爲 (Selskospoyuz) 即農業合作的躉購組織。也有一種合作的保險聯合會及合作出版聯合會。

這些中心原來的職責，多半在買賣，代所屬合作社買賣生產品。但自發展以來，現在也頗着重生產活動。現在已創設了一種「契約」制度 (System of Contractation)，那是一種期貨的買賣計畫。例如穀類中心和鄉村或農民個人締結協定，由穀物類中心供給他們貨物或勞務，而鄉村或農民個人則承認於收穫之後，償還代價，並將穀類賣給穀類中心。依照原來的計畫，契約本可由中心與鄉村或個人締結，但自一九二九年收穫以後，已不再和農民個人締結契約了。契約的時間，可由一年至九年。根據契約，穀類中心承認供給肥料、種子，甚至用機器代農民耕地。假若契約上規定所耕的田地係包括全部，則鄉村承認把農田的

『條分制』取消，假若鄉村要自己耕地，則地要耕得很深很好。假若鄉村要自備種子，則鄉村應將種子挑選很好，然後才能下種。此外契約還有種種不同。至若鄉村穀類賣給穀類中心的價格，都較農民在私人市場上出賣的價格低。一九二九年契約制度頗為盛行。該年的穀類百分之七十五，都已規定在契約內。政府且希望一九三〇年的全部收穫，要採用契約辦法。但自由集團農場發展以後，情形大變，所有大部分的穀類，都經過集團農場而不經穀類中心。將來也許集團農場中心和穀類中心之間，要成立協訂，來補救這種情形罷。

穀類中心也創立了一種『機關拖車隊』(Tractor Columns)和『機關拖車站』(Machine tractor Station)的制度。在一九二九年，這種拖車隊已有五十九隊，每隊平均耕地一萬公頃。每隊有拖車十架乃至四十架，依據契約，往來各村代其耕田。政府認為這種組織很有利益，因為用這種辦法，可以養着修車的工人。假若每村各有一二架拖車，則拖車損壞時，修理必極感困難。這些拖車隊係停在機關拖車站中，在站上，各種用件都有，在農閒時期，即從事修理工作，該站也有一些機器，以供鄉村收穫之用。拖車站及拖車隊的數目，一九

三〇年增加很大，以後還繼續增加。一九二九年夏季，政府希望在一九三〇年的農忙時期，拖車隊數目可增至一百。

至若麻類中心的工作，與穀類中心相似，也採取契約制度，締結協定的種麻地，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牛油中心的工作也差不多。

合作中心的經濟來源共有四種：一、合作銀行的借款，二、農業合作信用制度，三、國家銀行借款，四、政府的補助。至若鄉村的收入，除了扣除應給各中心的數目而外，若有少許餘剩，也要儲集起來，作為公積金。

各中心的活動都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使農民養成一種共同的習慣，以為組織集團農場的準備。有一位穀類中心的職員說，他們估計，實行拖車隊契約制兩年之後，一個鄉村必會自動的成爲一個集團農場。農業合作社總聯合會的一個職員也說，這聯合會及其他經濟部門的目的，都在竭力縮短時間，設法使獨立的生產中心消滅，只有集團農場中心存在。有人問他，要經過多少時間，那種時代才會來到而現存的複雜而廣汎的制度才

會消滅呢？他笑說：『或者要十年吧！』但在蘇聯，各事都進行甚快，他說了這話之後，不到六個月之內，消滅的過程却已開始，關於這件事的特種命令已頒布出來了。

集團農場自然是蘇聯一種最重要的農業合作制度。因為牠非常重要，又和全聯農業狀況有關，所以另在農業一章中討論。至若農業銀行與信用制度，也在銀行制度一章中說過了。

至若合作機關中官員和職員的地位，和那些在國家機關中服務者並無不同。他們第一對黨要忠心，至若他們所在合作機關的會員利益，他們並不認為重要。黨所批准的經濟計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凡對於全聯經濟最大目標有利的事情，合作的人員無不盡力從事。所以蘇聯合作運動的大發展，並不是合作觀念的勝利，而是利用合作制度以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例子罷了。

第十章 勞動

蘇聯所僱用的勞工，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經濟年度總數已達九、六〇九、三〇〇，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七·四。按照計劃，這個數目，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經濟年度，要增加百分之二一·四。若照歷法計算，在一九二九年，適當工作年齡（由十六歲起到五十九歲止）的人數，則增加百分之二·七，一九二九——三〇年則擬增加百分之二·九。所以被僱用的工人數目的增加率，和勞動適齡的工人數目的增加率不相一致。而這種不同，乃由於人口向城市集中所致。無產階級人數的增加，固然是黨所最希望的，但這種人口的移動，却超過黨部所預料。因為城市中增加了這一大批人口，尋求職業便感覺很困難了。而城市人口的增加，乃由於城市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較農民的地位更高的緣故。這種變動，當然要受農業集團化運動的影響，但我們現在還不能說這種變動是否受着事件的推移。因為在一九二九年，蘇聯的勞動適齡的人口，總數已達八、四五一、〇〇〇人，可見無產階級所包含的人數，不過總數百分之十一。

至若工業上僱用的工人，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為三、二六九、〇〇〇人，其中純粹勞

動者，爲二，八四六，〇〇〇人，約合百分之八十七，其他事務員等約佔百分之二三，這個比例數目是很有趣，因爲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上，行政人員及事務人員的數目，應否過多，實在是一個問題。

至若現在的工作標準，爲每日八小時。但在工業上，快要改變爲七小時制了。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經濟年度終了時將有一百多萬工人，每日僅工作七小時。換言之，最高經濟會議管轄下的工業工人，將有百分之四五·五每日工作七小時。有兩條鐵路也採取此制。預計一八三〇——三一年終了時，將有工業工人百分之八〇，鐵路十條採取七小時工作制。政府擬在一九三一——三二年終了時，在工業方面實現七小時制。

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實行「不間斷的工作週」制。依照這種計劃，一週只有五日，並沒七日。每一個人工作四日，休息一日，每天有五分之一的工人得休息，第二天又有五分之一的得休息。這種計劃的目的，就在使資本設備能盡使用。同時，對於宗教，也是一個有力的打擊，因爲在星期日，只有五分之一的工人得休息。這種制度，已在學校、銀行、委員會，託辣斯及

其他機關中試行。在工業上這種制度，很易施行，但在運輸及其他非工業的機關上，却感覺困難。因為在數個委員會或數個機關中担任職務的人，在這種制度下，就覺得他們完全沒有休息日。而在另一方面，因為新曆尙未完成，不得不將舊曆保存，所以要知道某人的假期將在什麼時候輪到，差不多不可能。如在莫斯科常有一種流行的話：『有四天是我尋找旁人，而在第五天上，那是旁人尋找我。』又因為同一家庭的人，難於在同一日得休息，所以家庭制也被破壞了。

至若工人的工資，若以工業各部門的數目來平均，每月約合六九·六三盧布。不過以盧布的虛金價為標準，就不能把蘇聯工資與他國工資相比較。再者，也不能用統計的方法表明盧布的購買力，使與他國貨幣單位的購買力相比較。全聯財政委員會委員某君告著者說，他估計盧布實際的購買力，必須增加百分之二十，才能達到其理論的金價。一個貿易委員會的職員也說，盧布實際購買力與其理論金價之差為百分之三十。

國家銀行的一切物價指數，顯示着蘇聯批發價格水準為一九一三年批發價格之一

• 八一九倍。在英國方面，同年其批發價格爲一九一三年之一・四六一倍。假若一九一三年兩國的價格實際相等，我們可以說，蘇聯的批發價格超過英國批發價格百分之二四，這個價值，大致可用來代表國際的價格水準。不過若論到生產品的品質，則這種百分比則有二倍以上。至若食物零售價格水準，在美國方面，現在大於一九一三年之一・五〇一倍，在蘇俄，則大二・四二倍。假若再假定一九一三年的價格相等，則蘇聯的零售價格水準，即高過美國的水準百分之六十一。蘇聯所售的貨物，雖因品質惡劣，曾將價格一再改訂，但這種改訂，對於製造品無大關係。住在蘇聯的外國人，都常常感覺他們所用的物品，其價格超過國際市場的物價二倍以上。

其次，在工人工資上還有一種特點：就是工資必由政府強迫扣除，用以購買政府公債，並作紅十字會，航空及化學戰爭協會，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犯救濟會等機關的會費和捐款。例如一個速記員每月得八十五盧布的月薪，每月就被扣除二十盧布。此外，財政委員會還發行一種『工業化借款』，此款即由工資扣除，約合一個月的工資，該款自然可以分期

交付，但也可見負擔之重了。對於新借款的舉行，自然沒有誰敢反對。不過遇有新債舉行，工人爲保護自己起見，就把以前所購的公債抵押或出賣。政府爲維持政府公債信用起見，故銀行及其他財政機關，便不得不購買公債，作爲一種担保品，使價格不致比發行價格更爲低落。故其結果，發行新公債的收入，其大部分便只好用之於維持舊公債。蘇維埃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頗爲奇特。政府頒布命令，大凡一切舊公債都要固結於一個新公債，而新公債不准歸購買者所有，應放在銀行中作爲一種保障。不經特種委員會的許可，不得出賣，除非遇到緊急的必需例如疾病之類，經過委員會許可，然後才能出賣。這種辦法，很近乎抵賴，不過對於舊債和新債的利息，仍然照付。但看最後這一種辦法，可見這些強迫的公債，發行若干就是把工資降低了若干。縱然本金最後終歸付給，但不論現在工資降低了相當數目，後來又付較高的工資，工人是不問的。

這種扣除工資的辦法，既然引起工人的不滿，所以同業公會中央會議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發佈一個命令，規定每年的扣款不得超過半個月的工資以購買公債，而地方同

業公會若代爲工人收集扣款，要有大半數公會贊同，方可實行。

大規模工業上工人工資表面的增加，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中爲百分之九·七，但因物價增加之故，實際的增加，不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可是實際的工資，當然是降低的。在一九二九——三〇年，有許多事情發生使我們無法用貨幣單位來計算俄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事件中最重要，便是分配制度的發展，按照這種制度，食物和衣服的配置量，係以命令所規定的分量爲限，並且要憑分配簿，或合作社員證。或憑此二種東西，才能在政府商店或合作商店中得到。所以金錢工資的數目，和每月分配的用品分量比較起來，便不大重要了。不過每月分配的分量，是常常有變遷的。下表就是食物分配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食物分配量

手工人

麵包 每日八〇〇格蘭姆

肉 每月四四〇〇格蘭姆

非手工人

麵包 每日四〇〇格蘭姆

肉 每月二二〇〇格蘭姆

糖	每月一五〇〇格蘭姆	每月一二〇〇格蘭姆
茶	每月二五格蘭姆	每月二五格蘭姆
牛油	每月三〇〇格蘭姆	每月三〇〇格蘭姆
青魚	每月一二〇〇格蘭姆	每月八〇〇格蘭姆

但上表所列的食物分量，常有變動。假若領取食物者同時是一個消費合作社的社員，則茶的分量，可得兩倍。牛油也是這樣。不過有幾種食物，常須領了幾個禮拜才能領到；大抵的東西，是須等候數小時才能領到。牛奶只准給與兒童，且每月僅限二十五次，每一次半立特。但實際上所能領取的並沒有定規。又有些東西，也只有出示合作社員證才能領着。

這種領得的口糧，除了由公家發給外，還要在私人商店中購買，後來因為消滅私商，這些商店關閉後，這種補助辦法才停止。有些食物，也可以由農村的小販手中購買，但正二月為例外，因為這個時候禁止小販活動。有許多雜類生產品，可以在國家商店及合作商店中購得，並不採取任何正式的分配辦法。蔬菜、果子、罐頭及其他數種東西，就是如此。但這些生

產品，常常用盡方法都不能發見，可是，若一發見，往往能購買無限的分量。鋪店中若有某種物品，常常都是採取一種非正式的辦法售賣，直至售完爲止。

採取這種口糧制度後，自然可以把工業上種種僱員工資的差異，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間工資的差異消滅了許多，因爲一切手工勞動者所領得的口糧，大家都是一樣。但在實際上手工工人所領得的口糧，都較所謂『白領勞動者』(White Collar workers)所領得的爲更多。所以這種平均報酬的辦法，其效果很大。有時有些食物，在私人商店中，用兩三倍的價格，固然可以獲得較多的分量。但工資的差異減到極小限度。因爲一個盧布，若用以購買多於最小限度口糧的食物，其購買力必比在社會化商店購買口糧的購買力，要減少一半以上。自然，那工資較高的人，可以把錢用來購買不在口糧以內的東西，例如香水、糖果酒之類，但這些東西，就是在社會化商店中，價格也極高，所以這些錢若用來購買，其購買力亦必大減。又上面的口糧表，其價值固然表明蘇俄真正的生活標準，但實際亦不盡然，因爲工人普通都在工廠中吃一餐或兩餐，所以除了他們在工廠中所得而外，往往再得一份

口糧。在公共飯館中用餐的，也可以受這種優待。

我們比較蘇聯工人與他國工人的工資時，應該注意一種事實，就是蘇俄的房租，比其他國家低廉得多。大凡革命時代所沒收的房屋，就是這樣。房租不但以房屋的大小為比例，也以租屋者的工資為比例。這類房屋所收房租的總數，僅足够必要的修屋費及其他相關的維持費。市政府並不額外賺一錢。現在為工人所建的新的寄宿舍，其房租的徵收，也採這種辦法，但另外還徵收兩種費用，一種用以繳付建築的墊款，一作投資的利息，但為數都極少。

蘇俄工人，除了房租估便宜而外，還有種種便宜。例如上述工人俱樂部中修養上的便宜，工廠食堂中廉價食物的便宜，工廠洗衣作的便宜，公共食堂，託兒所，種種社會保險的便宜。不過這些便宜，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據一九三〇年的參照數字，準備把實得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三，其中一部分，就在把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減低百分之三。此種理想，已見諸實行，政府已命令把鞋、衣料及其他必需品的價格，減低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反之，紙

烟的價格，則稍稍增高，而酒、化妝品的價格有時增高到百分之一百。

因爲一九二八——二九年勞動生產力不會照着計劃增加，所以貨物的生產費，也不能照着所計劃的降低。依照計劃，一九二九——三〇年勞動生產力的增加速度，要比實得工資的增加速度快。勞動的生產力，必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然後生產費才能降低百分之三·七（即使實得工資已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但一九二九——三〇年上半年實施的結果，却發見工資已照着計劃增加，而勞動並不如所預想的增加。其結果，生產費也不能照着該年參照表所列的數字降低。

共產黨的理想，本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這種理想，在工資方面，不會達到。在蘇聯，熟練工人與非熟練工人間，幹部人員與其他工人間工資的相差，並不如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大。黨員每月所得的薪水，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二二五盧布，此數以美金計算，約合一百十六元。至若幹部人員，可以得到較好的待遇，例如住宅較好，得用汽車等，又若撰文或著書的黨員，得把他賣文所得的錢可保存一大部分，但這種優待辦法，並不就改變了共產黨的理想。

因爲共產黨是努力使其工作人員的生活趨於簡單。就是在非黨員中，也很少見經理或工程師每月的薪水，在五百盧布以上，這算是最大工資了。自然，大多數人所得工資，都比這數目少。

但現在蘇聯的趨向，顯然在使工資平等。這種運動，係由各方面努力。第一，每一年都擬出一種參照數目，各種工業上工資的增加，應該使一切工業上的工資逐漸相等。一般的政策，就在增加工資較少的工人的工資。但工人做包工者，若用加速的方法，趕完工作，也不能增加工資。一個工人所得工資，若超過規定數目，就教他做別種工作，以防止這種情事發生。在蘇聯有一個美籍工程師，曾鼓勵工人增加工作的分量。有些工人果然加緊工作，可是後來工人却向他，申訴因爲包工的速度會被截止。這個工程師向另一個代表蘇聯政府的工程師提出抗議，那工程師就告訴他說，政府的政策，乃在防止工人的工資增加超過規定數目以上。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和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這個期間，曾一度努力，在工廠各部中，甚至

在整個工廠中，設立『工人共產社』（Workers' Communes）工人把所有的工資都捐助出來，然後大家平均分配。其極端者，各人只得一點必需的生活費。然這種辦法，後來經同業公會會議決議，認為應立即停止，因為用這種辦法，必使得遇較優的工人的生產力降低。不過在將來十年內，工人工資平等的理想，似乎也許再要實施。

蘇聯的勞動法，規定男女應該平等，工作乃是一種普遍的義務，並無男女的分別。不工作的人便沒有選舉權。但管家的婦人，假若有人待他照料，或必須照顧那些工廠勞動者的家庭的，選舉權並不被剝奪。但是共產黨的政策，並不在使婦人成爲管家婆。只要社會經濟制度一經改變，婦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便會失去。而這種事情，只要家庭一解散，即可實現。這是許多共產黨所希望的一種目標。大凡未達學齡的兒童，只要進了託兒所，家庭便可解散。再則，公食制度立刻發展，飲食就可不必再在各人家中預備。此外，其他以前在家庭由婦女做的工作，現也設法變爲公共做的了。

至若男女的結婚和離婚，都很自由，只要他們願意，不必申述甚麼理由。實際上，結婚或

離婚是不花一文錢的。假若有了小孩，而又要離婚，則男子必得把他工資的一部分用來維持其生活。假若男子或女子有一方不能工作，或沒有其他職業，則他方必需付給相當的贍養費。

至若做同樣工作，則男女所得的工資，並無不同。女子也漸漸能得到較高的位置。有許多託辣斯和組合的經理，就是由婦女担任的。各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也有婦女。例如阿斯伯基斯坦（Tajikistan）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就是一個女子。女子也做最粗重的工作。電車上大多數的賣票員，都是女子。

三月八日乃是共產黨的國際婦女節，報紙都實行大宣傳，畫一張圖，圖中一婦人推着一張機關拖車走過廚房用具、碗碟及其他女性用的東西上。這種圖畫，標題為「新生活！」很代表共產黨關於婦女地位的哲學。在新生活中，男女的工作應該是一樣，從前單由女子負擔的工作，都應取消。

蘇聯現在的工會，差不多在革命時代就已完全組織成功。在俄皇時代，對於勞動運動

是積極壓制的，後來二月革命時代，只有單獨的工會組織，而其中大多數都是非法，會員人數又很少。及至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第二次同業公會會議，工會才委身於產業的聯合組織的基礎上，以前的工會組織遂完全消滅。我們應該注意，蘇聯的工會運動，完全是產生於革命。故其結果，工會對於蘇維埃政府及共產黨的關係，很是特別。假若在革命以前，就有一種有力的工會運動，二者關係必迥然大異。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工會也願意保持他們現在的地位，不想支配蘇維埃政府，或認為工人的代表，與政府訂立合同。反之，政府就是工人的政府，當然工人也不必再和他們自己的政府訂立合同。政府也不僅自認為代表工人，却是工人專政的一種機關，所以政府心目中常常只見勞動者的利益，並不代表其他任何階級。因為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政治的領導者，所以他當然也指導工會，這在邏輯上是講得通的。反之，工會也不過是黨與無產階級發生關係時所憑藉的一種機關，所以，工會、蘇維埃、以及黨三者間的關係很是別緻。

不過關於工會的職能，仍然有過三種分明的政策。在托羅斯基的意見，是贊成用工會

作爲促進訓練增加生產的一種機關。他以為若要增加生產效率，必需用國家的經濟機關，加緊訓練。可是向來的工會，對於這種政策的發展，却是一種障礙。反之，托木斯基（Tomsky）却不然，他很贊成工會應有多量的獨立和自主。他以為工會應與國家組織相分離而繼續存在，這樣，工人便得有一種特別的工具，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政府也許落在另一派人手中，而這派人並不完全代表工人的利益，或者即使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因為不和工人接觸，所以事實上對於工人毫無裨益。托木斯基的意思，是要把工會變爲一種國家機關，而有一種軍隊樣的形式，其職責就在訓練工人。但這種計劃固然失敗了，勉強要說托木斯基的成功，爲時亦甚短促。他不久退職，其後所採用的政策，有許多地方都相似於托羅斯基的政策。不過關於工會在社會經濟組織上的地位，黨所持的最後總政策，終歸和托羅斯基或托木斯基的政策，有重要的差異。工會並不如托羅斯基所理想，隸屬於國家。他們把工會完全放在黨的支配下，所以並不是黨來支配國家機關，而再由國家機關來支配工會（正如托羅斯基所希望者），乃由黨是直接支配國家和工會，而國家的支配力量並不增加。反

之，工會的主要作用，就在訓練工人鼓勵勞動階級的全部力量，以實現國家經濟機關的生產計劃。工會並不在保護工人的利益以免剝奪，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剝奪工人的利益，這話是說不過去的。

工會對於工業的管理，差不多完全無權過問。在理論上，工廠及託辣斯管理人員的任命，應該徵求工會的同意，但實際上，這是毫無意義的，那任命是全不經工會的同意。工會這種權利的喪失，乃是逐漸而來。因為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就覺得工會對於工業管理的直接支配，很不容易實行。自從托木斯基失勢以後，工業的管理，差不多完全不受工會的干涉。其後，黨為補救這種工人的損失起見，就宣佈工業上的行政人員，得引用工會的領袖。所以工會的領袖，便認為是工業管理人員的一種準備訓練。至若工會的領袖，要那些在黨中活動的人才，有被選舉權，遇到工業行政人員待補充時，也要那在黨中有成績的工會領袖才有被指派權。

除了工業行政人員用工會領袖來補充外，還設法使工人儘量參加工業，這樣使工人

可以自覺在工業事務進行上地位的重要。假若把工業管理部地位的重要程度加重，則管理部便可施行更有效的勞動訓練，這樣對於工業行政的支配者並不是工會，而是與工會有別的工人。後來設立了「其卡」（Чика）制度，（肅清機關）這種理想也就實現。大凡工業上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都常常受着定期的肅清（Cleaning Commission）這種肅清委員會係由人民工農檢查委員會所管轄，那人民工農檢查委員會，同時也是蘇維埃政府及黨的一個機關。當肅清委員會舉行時，工業上的一切工人都被請列席。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列席，任何人對於那被「肅清」的人都得發問。這種肅清方法，在那被審問的人，極為難堪，因為大凡一切可能的批評，都搜集出來，向他不幸的腦袋上攻擊。他過去可疑的行爲，不謹慎的談話，他的私生活，都要提出來公開檢查。一個看門的人，也可以告發一個託辣斯的經理，說他所用的領帶有資產階級的嗜好，或對於做危險工作的工人沒有適當的保障。那時候被告的祖先，更被仔細審查。要是他申述他的母親，「來自田間」，他的父親「來自機房」，那麼是他的幸運。要是他的祖先中有富農、資產階級或地主在內，那麼他就要被研

頭。至若黨員的肅清，當然是由黨部來做，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工廠的經理，假若是一個黨員，便可不十分怕被告發，因為大凡黨員對於生產，都是最努力的。不過這種制度，可使工人覺得很有權力，而使行政人員方面，不敢一味專制，因為怕有人在第二次的肅清會上報復他。至若其對於心理的影響，當然很大。可以保障工人方面不發生不快意的感情，因為工人若發覺他們實得的工資，不能如所希望的那樣增加，便可找得一種精神的補救辦法，去窘迫那些俄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工程師。

政府用種種努力，使勞動階級自覺他們在工業上是重要的分子，工人們組織一種糾察隊，訪問政府各機關，各經濟機關，各鄉村，大凡認為官僚政治的事情，都直接加以指導。大凡他們注意到的事情，他們都加以考查，例如銀行，他們可以要求銀行負責人解釋，並問職員、銀行管理上是否有過官僚政治的事情或其他錯誤，假若有錯誤發見，便報告到工農檢查委員會。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種糾察隊的訪問，對於那些向來習於小資產階級辦事方法的，當然感覺難堪。工廠也可以臨時召集一部分工人來協助肅清某政府機關或託辣

斯或組合，因為政府都認為工人似乎具有查出官僚政治的一種本能，但其實要實際從事體力工作的人，才能有這種本能。

和工人糾察隊稍稍不同的，便是由青年共產黨所組織的「輕騎兵隊」(Light Cavalry)。其任務就在撲滅真正的官僚政客。他們且盡力提倡自我批評的精神，所謂自我批評，即是工人有權批評在上者的態度和行為。其一種方法，便是「壁報」，其中包含文字批評和諷刺畫二種，貼在機關或工廠的牆壁上。一九三〇年正月莫斯科舉行國家銀行的肅清運動時，壁上常有很大的諷刺畫，批評國家銀行中居重要位置的人，甚至總經理都被批評。工廠的壁報固然比較粗劣，但批評却極深刻。這一切工人控制的方法，確實可以醫治那些面皮極薄的人，因為不但批評極端尖刻，而且受批評的人，也知道他們很容易失去職務。

工人參加生產管理，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採取保護制度。一個工廠可以保護一個鄉村或集團農場，鐵路工人可以保護財政委員會，或一工廠可以保護一隊紅軍，一隊紅軍可以保護一個集團農場。居保護地位的機關，對於所保護的機關，負着重大的責任。當舉行肅清

運動時，保護者必須出席，也得常常察訪，以探詢官僚政治是否發展。保護者也可以提議變更所保護的機關的組織。

最後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把工人分爲若干組，各教以某種工作的短期課程，然後把他們派到委員會、託辣斯、組合銀行及其他機關中。這些機關的職員，和這些工人接觸後，便不致壟斷政府或經濟的機關。再這些工人也使行政人員對黨表示忠誠，爲努力達到最大的效率。

蘇聯所有的報紙，都有工人通訊員，把他們所見的不適當的行爲向報紙報告。這些報告發表在報上，有時館員且把所申訴的事畫爲諷刺畫。普拉發達（Pravda）報就有一版專載這項通信，標題爲『在大衆控制之下。』官僚政客，就是這些諷刺畫家、通訊員的取笑材料。

黨爲增加勞動的生產力起見，常用工會做工具，所以工會已成了一種促進生產的機關而不是保障勞動的機關，工會也協助政府舉行各託辣斯間、各工廠間、工廠各部門間的

「社會主義的比賽。」凡此種種方法，都由工會計劃，以實行黨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命令。工會既然變為促進勞動力的一種組織，結果，工人對於工會本身就不能感覺興趣。要工人出席工會，聽長篇的演說，常常感覺困難。在常會中，工人的希望，就望會議趕快開完。因此常常覺得開會時，實有對於不列席者加以訓練的必要。有時甚至不得不把門下鎖，以防會員逃走。在莫斯科，一九三〇年時代，開會通常都要點兩次名，以防會員等應名之後偷偷。在理論上，工人有罷工之權，而在國立工廠中，也曾有小小的罷工事件發生。但自從私立小規模工廠及外人所設的工廠消滅後，伴着黨對於工會的嚴格控制逐漸增加，罷工事件已減少到零，因為舊日的小資產階級，既然完全消滅，不再居於工廠經理的地位，所以在黨的意思以為不再應有足以引起罷工事件的情形發生了。所以若有罷工事件發生，而能得到工會領袖的擁護，差不多完全不可能。政治警察的活動及共產黨和共產黨青年團的勢力，就是以使工人中不會有罷工運動的發展。假若在這些情境下，還有人想組織罷工運動，當然毫不遲疑地逮捕，而以反革命治罪。

工會既然努力協助工廠的管理，可是勞動訓練仍然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在報紙上，我們常常看見關於這問題的申訴。一個通訊員就報告某礦山常常發生逃工，生產力降低，反對機械化等等事情。對於這類事情，政府當然設法，以維持勞動訓練。例如在莫斯科有一個託辣斯發生十三件訓練衝突的案，都是工廠委員會告發工廠行政人員的，但結果有十二件是工人失敗。其他類此事件，常常發生，政府無不竭力設法維持勞動訓練。

但在另一方面，工會也竭力保障工人職業的安全。蘇聯的體力勞動者，若沒有錯誤，絕不怕失業。免職的手續非常麻煩，而且工人有申訴之權，況這種申訴，又常是工人佔優勢。假若有一個工人，被經理告發，則被告發的罪必經數次審訊，然後才能給他處分。蘇聯所僱用的外國工程師就對著者說，他們所不滿意的工人，簡直無法罷免。

同業公會不單為法律所認可，而且也是蘇維埃經濟組織之一部分，和託辣斯或組合一樣。同業工會係以企業為基本單位，例如工廠、作場、事務所或工人正在服務的其他場所。工人在開大會時，推出一個代表團，該團又選出一個工廠委員會。代表團有定期的集會，討

論並通過工廠委員會的報告。工廠委員會也可稱工人委員會或團體委員會，視其所在的企業的種類而定。假若企業的範圍很大，則工廠各部中通常都有工廠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工廠委員會中自行認定若干委員，如文化教育委員、生產委員、勞動保障委員等。工廠委員會每年改選一次。在小規模企業中，工廠委員會委員便不再盡其通常人的責任，可得相當工資，以酬其在工廠委員會中的任務。但不論企業大小如何，工廠委員會要用其全部時間從事於同業公會的工作。

在工廠委員會之上，便是鎮委員會、總委員會、省委員會、聯合共和國委員會，最後乃至全聯中央委員會。這種結構，可稱為直線式的，即可代表 U S S R 的同業公會。

至若同業公會橫線式的組織，係以全國同樣政治經濟的部分為基礎。每一部分有一個同業公會大會。地方大會，每年或每一年半舉行一次，至若同業公會全聯大會，則每兩年舉行一次。各地方、各共和國、以及全聯的大會，又組織一個同業公會會議，在任何政府機關或團體之中，各會議係代表同業公會的利益，並得指派代表參加任何政府的委員會或其

他機關最高機關爲同業公會全聯中央會議。這種中央會議並不履行同業公會的機能。牠不作集合的協定。不過問同業公會與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的衝突。不過視察同業公會的一般利益，調和諸同業公會的活動。

一般而論，我們可以說蘇聯的同業公會極其集中，很似蘇維埃政府及黨部的組織。

同業公會共有二十三個，都是以工業的基礎爲根據來組織。共有會員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婦女佔百分之二六·七。在理論上，同業公會的入會並不強迫。但在實際上，並沒有人不想入會。而同業公會會員的資格，實際上亦等於公民的資格。至若農民，通常固不是同業公會的會員，但他們仍是公民。同樣，那些管家的婦女，雖不是同業公會的會員，但仍不失其爲公民。假若公民資格發生問題，則持有同業公會會證，卽是具有公民資格的最有力的證據。一個人的公民資格若被剝奪，則其同業公會會證也被剝奪。有時職業也被剝奪。一個人也許單失去其公民資格，或同業公會資格，或其職務，但實際上，一種失去，他種亦必連帶失去。因爲有公民資格，也就有了領食物的簿子和合作社員的資格，所以不願加入同

業公會的人極爲少數。反之，入會都視爲一種最寶貴的權利，不惜犧牲一切以保持之。至若行政人員以及做書記的人，也可以如體力勞動者一樣加入同業公會。

共產黨對於同業公會的支配，和支配蘇維埃政府一樣。不論在任何同業公會大會中，黨部都預備好一張候補人員表，任黨員去選舉。但在事實上，同業公會開會時，黨員和非會員很少發生衝突。對於黨部所擬的候選人員表，也很少發生意見。絕沒有人敢出來反對黨的。不過這一張表也非全是共產黨。非黨員也得被選，不過同業公會一切重要位置，差不多都是共產黨把持着。

同業公會的會員，應該將月薪的百分之二捐助工會。在當初，這種會費，係由工廠事務處代爲徵收，但這種方法，現在已不實行，改由工廠委員會派人來收。所收集得的資金，全數歸同業公會中央委員會來支配。下級幹部，應該把他們的支出預算，呈報中央委員會，然後由中央委員會在所集資金中劃出一部分，但其數不能超過所集資金百分之五十。其餘用以補充會員，救濟失業，或用於教育及文化工作上。國家機關及合作機關，應將薪俸總數百

分之一，捐助於教育工作上。

同業公會所施設的教育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工作的大部分，自然是宣傳的工作，企圖使會員養成共產主義的及革命的觀念與行爲。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反宗教的工作，因爲共產黨承認宗教是勞動階級的最大仇敵。此外，還有其他工作，例如和大學聯絡，設立工人課程之類。至若電影，一方面爲娛樂，他方面也有教育的和文化的作作用。

同業公會的文化教育工作，大部分都集中於工人俱樂部。現在各業都想自己有一個俱樂部，這種理想，雖不能件件實現，但他們却盡力替那些還沒有俱樂部的工人，籌設種種臨時設備。現在往往是數個工廠同用一個俱樂部。以前被封的教堂，現在就用做俱樂部。這是使教堂被封的一個最大力量。工人們往往要求封閉教堂，可以使他們有一個俱樂部。但有些俱樂部却是新的建築，設備極好。例如莫斯科的赤色橡皮俱樂部就是一個新的建築，其中有一個能容數百人的戲台，有健身房、有酒館、有委員堂。我們可以說，俱樂部一般的佈置，頗像青年會一樣。俱樂部的戲台上，常有工人票友登台演唱，唱的雖然極壞，但亦可解除

工人生活的單調。有時亦演奏音樂，音樂演奏倒是極好。在健身房中，常有體育教師教工人以遊戲，設法提起工人對於遊戲的興味。有時亦舉行種種比賽。而最有趣的計畫，就是俱樂部的建築，能够兩用，大學生和工人都可使用。應用這種計劃，就是在訓練專門人材的時期中那些養成專家的大學，也可以和工人聯絡。

這些俱樂部也用作集會的中心，種種機關可在那裏集會。普通每晚映放電影後，就舉行遊戲，全體社員都要參加。一般而論，這種俱樂部可說是革命後工人所得的一種實在利益。在革命以前，城市工人的社會生活極其枯燥，甚至完全沒有。他們只有飲酒來解除他們生活的單調。俄羅斯工人實在無法取消他們對於酒的嗜好。可是工人俱樂部對於酒却是一種最有力的仇敵，現在俄國工人也能了解其價值了。

同業公會可以和託辣斯訂立團體協定，但這些協定，不得違反勞動法所規定的條件。尤其是工作條件，勞動法所規定者，已算是最低限度，故團體協定若有關於工作條件的規定，必不能比最低限度還少。協定成立之後，必須註冊，然後勞動委員會視查員，才得加以考

查是否違反勞動法。協定成立之後，則一切僱員，不論是不是同業公會的會員，都得享有所規定的工資、工作時間及其他工作條件。甚至同業公會和僱用工人的政府委員會，也可以締結團體協定。消費合作機關亦然。照慣例，同業公會都是和託辣斯先締結一個試驗的協定，然後將該協定送交各工廠工人開大會討論。工人有提議修正之權，同業公會亦得請託辣斯對修正表示同意。不過這種大會的通過，多半是一種形式的。

再則，這種協定，也不能違反各該工業參照數字關於工資及工作時間所規定的限制。公會固極力要求管理部增加工資，而營業部方面也覺得牠不能拒絕這種要求。但參照數字無論如何是要遵守的。故管理部得避免拒絕要求的責任（假若要求出了規定以外）。再則，公會締結協定的權力還受一重限制。就是假若參照數字，規定在某一時期某工業生產力的增加應該到什麼限度，工資的增加應該到什麼比例，則工資的增加，應該決於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假若生產力的增加未曾達到規定的限度，工資的增加已積極進行，則負責者便要受嚴厲的責難。每年的參照數字，都規定工資可以增加，但若物價高漲或物品分量

減少，則這種增加不過空有其名。參照數字甚至也指定各工業增加的百分數。所以在這類情形中，公會締結協定的權力，大受限制，不過在另一方面，在各種計劃機關中，工會都有代表列席，對於各工業工資的增減，都得參加意見。

勞動法中，關於工人與工廠管理部門的衝突，也規定有詳細的調解辦法。同業公會若與僱用機關發生衝突，普通都由 R. K. 調解，這是一種勞動爭議的調解委員會。R. K. 由僱用機關代表及工人或僱員代表組成，兩方人數相等。在 R. K. 中，兩方的衝突，須根據雙方所締結的協定來解決。但 R. K. 不能把團體協定的內容加以增減。這種委員會，在各工廠中是一種常設機關，一切衝突或爭議，最初都由其解決。

但 R. K. 不過是一種初級的調解機關，此外還有仲裁會 (arbitrational chamber)，民衆法庭處理勞動事件的專部，及三部合組委員會。假若民衆法庭沒有此種專部，則衝突事件由法庭常會處理。

假若關於協定的增減解釋發生衝突，或關於成立新協定發生衝突，這種衝突，便不歸

R. K. K. 調解，而歸仲裁會或三部委員會調解。仲裁會或三部委員會都是臨時組織，附屬於聯邦共和國人民勞動委員會或地方勞動機關。由僱用機關代表及有關係的同業公會代表組織而成。在仲裁會中，主席是由勞動機關指定，而在三部委員會中，則由衝突雙方推舉，或經兩方請求，由勞動機關指定。在仲裁會中，衝突的調解完全以衝突的雙方同意為目的，而在三部委員會中，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或由主席決定，不論雙方同意不同意。同業公會若與國家機關發生衝突時，勞動機關得應一方的要求，組織一種三部委員會。遇見這種情形，調解的結果，必須強迫雙方承認。假若協定尚未滿期，因為增減的原故而發生衝突，則這種衝突，並不交這種三部調解委員會處理。

不論R. K. K. 仲裁會，或三部合組法庭的決定，都是最後的決定。不許再經事實的驗證。只有主管勞動機關在視查時，得依特殊法定條款取消之。決定之後，若尚未履行，得依聯邦共和國勞動立法人民委員會規定的法則強制執行。

勞動人民委員會，對於勞動的保護及工作環境的改善，居於很重要的位置。牠設有視

察員，派赴各地視察其所製訂的勞動法的施行狀況。這種勞動法，乃是蘇維埃工人的一種憲章。關於加工時間，最大工作時間，婦女小孩的工作環境等等都有規定。若同業公會未能保障工人的權利，勞動人民委員會甚至可以越俎代庖。很可怪的，就是同業公會對於這種越權的行爲，也不加以防止。其原因就在關於增加勞動生產力一事，政府宣傳過甚，所以同業工會對於工人的保護就不甚注意。在事實上，公會對於完成工業計劃的責任，在道德上差不多和管理部一樣，再則，指派公會領袖做工業經理，也使那些未做經理的工人領袖養成一種經理的心理。

蘇聯的共產黨，以爲工業民主主義和勞動訓練是不相容的。再則，工會已經完全服從了黨的指導。在蘇維埃工會中，個人自由與民主主義完全不能立足。但他們說，工業縱然不是由工人直接支配，但黨的支配，却完全爲工人的利益。他們認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在完全沒有工業的平民主義，工業全爲資本家的利益。這話當然有相當的真理，我們不能不承認。

第十一章 社會保險

第一節 緒言

在蘇聯中，社會保險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為這也是共產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原則，即『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所採取的一種手段。不過社會保險制度，距實現這種原則，還是很遠。在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極端窮困的現象，像蘇俄那樣顯明。乞丐穿着的可憐，和外觀的窮困，沒有更甚於蘇俄。并且乞丐數目之多亦可首屈一指。然而U. S. S. R.却極誇張他們的社會保險制度，說這是工人由十月革命所得的最大利益。對於這種現象，究竟如何解釋呢？

第一，社會保險制度，乃是一種階級保險制度。在蘇聯中，有很多人都失去了公民的權利。其確數雖不能知，但若把失去公民權利者的家屬包括在內，其數約在八百萬之譜。這些人，就是昔日的地主、資產階級、貴族、俄皇時代的官吏、商人、富農、僧侶等等。不過所謂失去權

利，不但失了公民權利，也失了領取口糧證，合作社員證的權利，不能被僱用在國家機關，或合作機關中，不能進學校，不能在失業機關登記，也不能享受社會保險。

農民雖佔人口的大多數，却並不包含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內。不過政府也曾相當努力，用種種方法，保護較窮苦的農民，例如赤貧的農民豁免農業上的租稅的，約占百分之三十五。又每一個村蘇維埃中，都有一個貧農委員會，負責幫助貧苦農民。但因為貧農的數目太多，而農民中就是最富的農民，其生活程度亦極低，所以要救濟他們的困難當然極其有限。為什麼農民不得包括在社會保險制度以內呢？第一，因為政府承認農民不是無產階級，而這種制度乃是專為無產階級而設立的。第二，在現在的經濟發展階段若把農民包括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內，勢必使整個制度完全破壞，因為財政力量，負擔不了之故。自集團化運動發展以來，農民的地位當然大為改變。在集團農場，農民已分不出階級，一切分子都是。在同一平面上。所以對於集團農場還不會想到社會保險制度的設置，集團農場的農民，也許可以包括在一般社會保險制度之內。但這種理想，也許在四五年內不會實現，因為經濟

的負擔，總沒有法子解決。

蘇聯的社會保險制度，係以解除經濟困難為目的，共有數種如下：

- (一) 疾病保險，(二) 預防永久不能工作的保險，(三) 防止職業意外和疾病的保險，
- (四) 母親保險，(五) 喪葬保險，(六) 失業保險，(七) 不能工作的工人及死亡工人的家屬酬
- 卹金，(八) 醫藥治療，(九) 養老金。

第二節 疾病保險

被僱用的人，若在僱用期間不能工作，可以領得疾病輔助金。付給的時間，係由患病第一日起，直至康健恢復或永久不能工作的時候止。不過臨時僱員却不能照這種辦法。在患病期間，工資仍然照付。不過很可注意的，就是工資雖然照付，並不致引起工人裝病的惡習。所付工資的數目，係根據病前三個月該工人所得平均月薪計算。不過疾病輔助金也有一個最大限度，其數因工人所在區域而不同。蘇聯全國共分六區，在一九二九年，其數多至一百五十盧布，少至一百二十盧布。若因交通斷絕或因看護家中病人而不能到廠工作，也可

以得到同樣的補助金。工人有病，可由公共康健部治療，但對於請病假的准許權，則操諸地方保險當局手中。

第二節 醫藥治療

被保險者的醫藥治療，雖然是社會保險制度的一部分，並由社會保險制度的財源所供給，但其行政權並不操諸社會保險制度，而實操諸共和國衛生委員會及地方衛生部之手。至若醫藥治療、預防治療以及藥品、支給病人全不收費。被保險人的家屬、失業者、不具的工人、學生以及同業公會會員，都得免費治療。公民權利被剝奪者當然不得享受這項優待。療養院、康健修養所、休養家庭，也是保險制度之一部分。其經費一半出自社會保險制度，一半出自公立衛生機關。休養家庭，則由同業公會辦理。在地方療養院和休養家庭中，有病牀的百分之八十，是為工業工人和轉運工人而設。其餘則供薪水生活僱員及被保險者家屬使用。

免費治療的財源，全由地方補助，至若共和國及全聯的資金，則用以補助較窮的區域。

此外，社會保險資金也補助一部分。自私人醫院取消後，公共衛生服務的範圍，當然要大大擴充。現在已派遣大批醫生到集團農場服務，所以擴張醫務到鄉村去，也在積極進行。最大的問題，就是以有限的資金與人員，須照顧到廣大的民衆，這是公共衛生事務上最感困難的地方。

第四節 保險

不論任何人在僱用期間，若因為職業上的意外事件，或職業疾病，或普通疾病而全部殘廢或半部分殘廢時，都得領一種撫卹金。一切僱員，假若不能工作，不論僱用時間的長短，都得領一份養老金，不過，假若不能工作的人年齡在五十歲以上，則至少須在不能工作以前，工作過八年，才能領取撫卹金。

卹金的數目，係決定於不能工作的程度。不能工作的程度，可分爲六類：（一）完全不能工作而又必須到工作地點者；（二）不能工作，工作能力損失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一百，但並不須到工作地點；（三）不能做規定的正常的工作，但仍能做輕巧工作或臨時工作；失

去的能力為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四)不能做以前的工作，只能做工資較少的工作，或仍做以前的工作，但效率較少。失去工作能力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五)不能做以前的工作，不過效率大減，或不得不做工資較少的工作。失去工作能力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六)工作能力稍稍減少，失去的能力還不及百分之十五。

假若不能工作是由於普通疾病所致，那麼只有最前的三類可以領取卹金。

假若殘廢的原因是由於普通疾病，則卹金照下列辦法發給，第一類殘廢，得所得工資三分之二，第二類殘廢，得工資九分之四；第三類殘廢，得三分之一。

最多的養老金為五十盧布乃至一百二十盧布，依工人所在區域而定。在另一方面，也有一種最低限度。假若工人所得工資，月薪不過四十盧布，則撫卹金可得全薪，但第二類及第三類殘廢者，其數要略減。至若第一類殘廢及最初三類殘廢者的家屬三人的最低限度的撫卹金，係以國家最低限度的工資之百分之一百五十計算。

不能工作或死亡，係由於工業的意外或職業的疾病所致者，所得的賠償金較多。大凡

上述六類殘廢者，若不能工作的原因，都是由於工業的意外或職業的疾病所致者，都可領取賠償金。

被僱用者，曾領過社會保險金的殘廢者，或曾領過失業保險金的殘廢者，若其死亡，係由於工業的意外或職業的疾病所致者，則其家屬仍得領取撫卹金。一個家主，若因不知的原因而死亡，其家庭也得領取撫卹金。假若死亡是由於工業意外或職業病所致，當然也可領得較多的賠償費。再撫卹金的付給，也視領款者的收入而定，假若其他收入是够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撫卹金也可停止付給。再若領款者從事私人貿易，或僱用勞工以謀利，則撫卹金即停止付給。

不能工作者若不領取撫卹金，可以住在養育院中，或參加殘廢合作社以所得六個月
的撫卹金在合作社中入股，或者領取零賣證、販賣糖果、報紙之類。

第五節 生產優待

體力勞動工業上所僱用的婦女，在分娩前，八個禮拜，分娩後八個禮拜，都得免除工作，

工資照給，其費用由社會保險制度負擔。若不是體力勞動工業上的僱用婦女，則假期減短兩星期。此外，購買嬰兒衣服所需的費用，亦由公家供給，另外再付九個月的保姆費。不論被僱用或未被僱用的婦女，都得這種優待，被僱用工人或未被僱用工人的妻子，都同樣優待。不過未被僱用的人，若不會領取失業保險費，却沒有生產優待的資格。母親的結婚，也不是享受生產優待的必要條件。

和生產優待有密切關係的，便是託兒所的制度。大凡工廠、合作社的寄宿舍，有時鄉村和集團農場中也有。現在工廠中設立的託兒所，將來集團農場中也許要完全設立。大凡六個月到五歲的兒童，都由母親帶到託兒所來。由保育人員代為照料，直到母親回家。在這些託兒所中，都採用着最新的保育方法。母親可以隔一定時間，來託兒所撫育他們的孩子。這種公立託兒所，在訓練共產生活的兒童一事上，意義非常重大。兒童在這些地方撫育，當然沒有私人的家庭生活。自然他們長大起來，能自認是社會的一個單位，也不覺得家庭是離國家而獨立的機關。再這種託兒所，並不屬於社會保險制度，所以也不由該制度管轄。

我們可以說，這種生產優待及託兒制度，乃是建設男女真正經濟平等的一重要步驟，蘇聯的共產制度，差不多將舊日資產階級的道德制度完全破壞，資產階級婦女的障蔽也消滅了，將來家庭似乎也有消滅的可能。這些發展在某一意義上固然可慮，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必得承認蘇維埃政府對於婦女在近代工業城市中的地位，是持着一較重實際的眼光。蘇維埃政府完全承認，男女的權利義務，應該平等，但從生物學的理由，使這個原則的應用發生障礙，所以蘇維埃政府通過母性保護的制度在消滅這些困難。

第六節 喪葬費

僱員或曾受撫卹金或失業補助金的人死亡及其家屬死亡時，都得以社會保險制度付給一種喪葬費，其數由二十一盧布至四十五盧布，依地域之不同而定。若死亡的家屬，在十歲以下，則付給數為基本數之半。

第七節 失業保險

以前曾有過職業並在勞工交換局（或地方同業公會）登記過的人，後來若失了業，

可由社會保險機關領一點失業保險金。當然，以前要做過工作，才有資格領這種保險金。但也有些人却是例外，例如有技術的工人、專家，在十八歲以下的青年、退伍的紅軍及其他。至若以前的僱用期，以六個月到三十六個月為限。

一般而論，貧窮才是領取失業補助金的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假若不論在哪一個月，若有一種臨時收入，超過基本補助金之百分之一五〇，或收入是一種定規的，那就不能領取失業補助金。又臨時收入加上失業補助金，若超過領款者被僱時平均月薪的百分之七十五，也不能領取補助金。又，假若家庭中不論任何人獲得某種不勞而獲的收入，或家屬總共的收入超過一百八十盧布（此就第一區而言，其他五區，數目遞減），也不能領取補助金。補助金的數目，共分三類，並依失業者家屬的人數而定。沒有家屬的失業工人所得的補助金，最多為二十七盧布五十戈比。若失業者有一家屬，則付基本補助金中的百分之十五，有二家屬，付百分之二十五，有三家屬付百分之三十五。假若家屬另外還有收入，便不再付給補助金。又若失業者的妻或夫，有任何收入，其家屬也不再付給補助金。

技術工人，在一年內，不得領取九個月以上的失業補助金，非技術工人不得領取六個月以上的失業補助金。在一個失業期間，前一種工人所領補助金，不得超過十八個月，後者不得超過十二個月。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政府因為感覺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過多，曾設法減少，以圖減輕負擔。那時勞工交換局曾舉行肅清運動，大凡公民權利被剝奪的人，以及因何種理由在交換局記着過的人，及其他可疑的人，通通被排除局外。

一九二九年年末，失業人數增加很快。但一九三〇年初，又開始減少，其一部分原因，乃在集團化運動發生後，使城市工人感覺不安。他們都捨棄工作，到鄉村保護他們的利益。而一九三〇年夏季的資本建設大計劃，也有相當效果，使失業人數大大減少。蘇聯的失業人數，實在比資本主義國少得多，但這是有特殊原因的。

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季，大凡公民權被剝奪的人，都不得在失業交換局登記。不過這些人雖不得登記，他們實在是失業的。因為被剝奪公權的人中，也含有富農在內，所以這些富

幾，家產被沒收後，成千成萬的被充軍到西伯利亞，所以蘇聯的失業統計，並不會顯出真正的狀況。不過這類失業，在性質上是一種責罰，和那因經濟恐慌而失業的情形，全不相同。

在蘇聯，因為中央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直接支配，權力甚大，所以政府能使失業人數減至最低限度。這是蘇維埃制度勝過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最大優點。但失業人數的減少，不過近來的事。所以很難說這個緊要問題已經圓滿解決了。

政府為減少失業人數起見，曾設法將失業者再加訓練，使其得尋求相當的工作。所以在一九二九——三〇年經濟年度，R. S. F. S. R. 用於失業補助金的款項，達前年的一倍，但用於再度訓練失業工人的款項，却有上年的五倍。前項共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後項共用四六、二〇〇、〇〇〇盧布。失業的人有時亦得如殘廢者一樣，有零賣糖果等類之權。

因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勞動委員會的議決，制度發生了變更，結果以致失業保險制度暫時廢置。那時勞工雖然非常缺乏，可是仍有數千人，作失業登記，而領取失業補助費。因為他們說不能獲得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可是新的制度，對於這些人，並不給與失業補助金。再，

不做任何工作的人，也得在勞動交換局的失業名單上抹去他們的名字。不過殘廢者却是例外，但須呈報醫生的證明書。

這種制度的意義，就是說，失業的律師或伶人，都得獲得一種職業，成爲一種建設的勞動者。不過假若純粹的失業，再度發生，當然要付給失業補助金。這種改變非常重要，因爲蘇聯政府同時還限制人民，不得隨意選擇或放棄他們所喜歡或不喜歡的工作。

第八節 年老保險

蘇聯政府很想立刻採取一種完全的養老金制度。但經濟的困難，使這種理想，無法實現。不過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了。紡織工業上已實行該項制度，並計劃逐漸擴張到全部工業上。

社會保險制度的費用，係由勞動界的僱員負擔。但醫藥治療却是例外，其經費尙有他種來源。在社會保險經費中，還有一種是強迫捐款，用以建築工人的住宅。工業係依工人生活健康的危險程度分爲若干類，僱員的捐款卽以此爲根據。不過有些工業，因爲經濟薄弱

之故，得減少付款。尤其在重工業方面是這種情形。

在政府的意思，是想用這種社會保險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國家的慈善救濟。要有工作的義務，才能享受救濟的權利。這種原則，在許多方面，固然很可稱贊，但結果仍使很多人不能享受必要的救濟，例如跑到城市的農民，在他們未達到城市以前，就不能工作。除非他們在工業上謀得工作，然後才有必要的救濟，所以他們的情形很是嚴重。此外還有一些不得救濟的人，實是蘇維埃全部制度上的一個大缺陷，大凡到過蘇聯參觀的人，都有這種感覺。

但就享受到社會保險權利的那些人而論，對於社會幸福却是一種大貢獻。蘇維埃工業上的工人，他付的工資，固然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可是防止經濟危險的保障，却較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為大。蘇俄有了社會保險制度，再加上社會經濟制度上的其他原素，可以使為生活而作經濟競爭的危險性減少，而對於體力勞動者，更抵補了社會經濟制度上的其他許多缺點。

第十二章 計劃經濟

蘇聯的最高計劃機關爲勞動保障會議 (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ce) 稱爲「斯托」(Sto) 者便是。其任務，當初是在實行最高經濟會議所要做的工作。最高經濟會議的職能，本來實副其名，權力很大，現在已逐漸縮小，多半只在工業的管理。所以再創設勞動保障會議，使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和工業聯結。至若實際的計劃機關則是國家設計委員會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所謂「高士撲朗」(Gospplan) 者便是。

國家設計委員會乃是勞動保障會議的一種委員會，係勞動保障會議及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之一種諮詢機關。其重要作用有二：第一，設計，第二，考慮計劃實施的結果。其普通的性質，多半是諮詢的，並非立法的或行政的。其建議必經勞動保障會議、人民委員會及全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至若計劃實行期間，黨部、報紙、同業公會的直接督促也很重要。

設計委員會分爲三部，即社會經濟部、生產部及改造部。此外還有一種經濟研究的機關，最近中央統計行政，也劃歸設計委員會。在社會經濟部中，又分數股，如財政預算股、勞動股、合作股、貿易股、文化發展股。此外還有一種聯絡內部各股的組織及聯絡外界的一種組織。生產部又分四股，即農業、工業、轉運、水道。改造部分三股，即電氣股、工業區域發展股、同種經濟區建設股是。

設計委員會是通過兩重制度和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相聯絡。七個聯合共和國的設計委員會，係直屬於全聯設計委員會，而自主共和國、省及區的設計委員會，又屬於這些共和國的設計委員會。自主共和國、省及區這三種政治經濟區域，不過是組織形式之不同，所以其計議委員會，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在省、自主共和國及區之下便是縣；縣也有一個設計委員會，在縣之下便是鎮，鎮也有一種設計委員會，做相當的設計工作。在這設計系統之一半內，還有一種重複的交通行政制度。例如，縣的設計委員會，和省的設計委員會及縣的執行委員會都發生關係。牠一方面直屬於縣執行委員會，但同時也接受省設計委員會的指

導，並向省設計委員會報告。同樣，省設計委員會固然直屬於省執行委員會，但同時和聯邦共和國的設計委員會亦有關係，這樣一直到全聯設計委員會。

此外，在交通行政的第二個系統上，設計委員會和各種人民委員會直接發生着關係。各種人民委員會都有一個設計部，在機能上和設計委員會發生關係。所以，貿易、轉運委員會以及最高經濟會議都有一種設計部，把設計材料送到國家設計委員會，而國家設計委員會的設計計劃，也送回來請求貿易、運輸、工業各委員會的指導。至若消費合作、農業合作、生產合作三種大制度，也有一個代表在國家設計委員會中，傳達各合作社的設計資料，且視察合作機關對於計劃的實施成績。國家銀行也同樣有一個代表在國家設計委員會中，也有一個專門設計部。所以這樣看來，每個國家經濟部門，都有一個代表在國家設計委員會中，而且有一個設計部和國家設計委員會聯絡，同時這又直屬於他自己的指導下。

最高經濟會議，乃是一種工業委員會，其中有一個經濟設計部非常重要，而責任範圍又極廣。在其直接指導之下的，便是組合的設計部，再其次，便是託辣斯和企業的設計部。就

是一個工廠的各部，也要有一個生產計劃，有一個委員會來負責執行這種計劃。但在實際上，自然並不常是這樣，工廠某一部的委員會，其設計職權極有限度。大凡工業計劃所根據的資料，必須彙集送到國家設計委員會。委員會即根據各方所送材料，起草一種完全的工業計劃。但這種計劃，不僅決定於得自最高經濟會議的資料，也要根據其屬下的設計機關所供給的資料。國家設計委員會負責草擬的工業計劃，應該包括蘇維埃政府的議決在內，實在也就是要包括中央黨部的議決在內。至若其由下級設計機關得來的資料，通常也都含有這些下級機關的預算錄。不過關於政策的決定，最後的權力仍在黨，例如黨部決定生產的分量，要比各下級設計機關所計劃者多一些。所以，國家設計委員會最後發下的計劃，往往和下級設計機關所希望者不同。下級機關對此計劃固可表示抗議，但既經最後決定，則官方即認應該負責將計劃完成。這樣供給材料，起草計劃，參照下級生產機關的情形加以修正，最後獲得同意，其間經過很是複雜。所以在生產準備實行之前，老早就要計劃着。一九三〇——三一年經濟年度的參照字數，早就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開始草擬，而在一九三

○年一月加以修正。所以其結果，擬出來的計劃，在正式施行之前，已經是過時的了。

一般而論，上級設計機關並不計劃商品實際的分配，購買及出賣。這些事情，是由組合做的，假若沒有組合，則由託辣斯負責。國家設計委員會只是計劃某一年應該生產若干噸鋼鐵，若干部機關拖車，至若鋼鐵實際供給的情形，以及性質、種類等的條件，則由黑礦組合及農業機器組合去計劃。價格方面，則由兩種組合，根據最高經濟會議及人民貿易委員會所規定的標準決定之。不過關於一種工業材料對於他種工業的供給，兩種組合也要草擬一個協定（期限普通為一年），則所計劃的生產，方能實現。由最高經濟會議主持諸工業的聯席會議，種種組合的代表皆出席，得商量共通的問題。

國家設計委員會所擬的一年計劃及一季計劃，係先交到最高經濟會議以便送組合，又由各組合送各託辣斯，這樣一直到工廠的各部，這種計劃，便稱為「工業財政計劃」（Promfin plan）。大凡組合的工業財政計劃，其性質都是普通的，只涉及該組合所計劃問題的幾個重要原素，例如全部生產總數的估計，生產費減少的百分數，工資增加的百分數，

勞動生產力增加的百分數，原料的分量，及組合所必要的其他供給，必須向外購買的材料價值，組合預備出口的產量，以及所準備施行的資本建設的分量。組合必須有詳細的計劃，然後才能確知其所屬託辣斯是否能使組合履行該組合與國家設計委員會所同意的工業財政計劃。再下一層，便是託辣斯和組合草擬一個更詳細的工業財政計劃，等而下之，關於工廠的計劃，所擬更爲詳細。每個屬下的組織，固可提議修正其上屬設計機關所交下的計劃，但同時應負責完成計劃中所規定的項目，不過實際上，下級機關只能討論計劃實行的方法。組合對於工廠計劃的起草，也負有相當的監視責任，所以組合不但要指導託辣斯，而且監督託辣斯採用適當的方法使計劃見諸實效。爲達到此目的起見，組合特設一種委員會，去指導監督託辣斯的工作。託辣斯和同業公會舉行生產會議時，組合也有代表參加。反之最高經濟會議，並不監督組合代託辣斯所擬的計劃是否實施及其實施情形的如何。所以在國家設計委員會和工廠之間，設有三種計劃指導的機關——即最高經濟會議、組合、託辣斯——所以計劃指導的機關，實在並不簡單。

中央統計局係附屬於國家設計委員會，每三月向各工業收集報告一次。每月有報告一次，送到最高經濟會議統計部，又由統計部送中央統計局。因此，中央統計局和工業便較為接近，計劃實施的程度也可一目了然。報紙也把工廠、託辣斯、組合的計劃實施報告發表出來，希望憑輿論之力，指責那些報告不完全的人。

這種報紙監督的方法，非常有力。普通報紙上發表報告的地方，分爲兩欄，一欄是實施計劃十分成功者，稱爲『紅色表』。一欄是最缺成績者，稱爲『黑色表』。兩種表中，都把工廠經濟及其負責人員的姓名列出。對於成績甚劣者，甚至用圖繪出來說：『這些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同業公會對於計劃的實施，也負有相當責任，假若成績太劣，公會領袖即被免職。報紙也常常提醒公會領袖，要他們防止計劃的失敗。負責人員若不能完成其所負責的部分，不但要被大眾所注意，而且要受法庭審判，科以疏忽之罪，或妨害經濟活動之罪，而稱爲反革命。

蘇維埃共產主義學說有一個重要之點，就是因了『計劃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制

度便可避免資本主義的許多浪費。蘇維埃政府希望用這種方法後，則經濟進步的速度，可以達到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達到的速度。並且因了計劃經濟，可以取消蘇俄工業技術的落後，可以永久不依靠外國的製造，而經濟的發展，亦可超過亞歐各國，甚至超過美國。這種對於計劃經濟的信仰，曾大大的宣傳在五年計劃中。計劃經濟的嘗試實在五年計劃以前。政府最初的意思，本擬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開始五年計劃，但後來因為計劃的修正，故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才正式施行五年計劃，計劃的時間係由一九二八——二九年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施行時極為努力，在共產黨中，都把五年計劃的完成當做一種宗教。

共產黨常覺得俄國的工業，實在落後得利害。雖然斯大林派強辯說，社會主義可以在蘇聯單獨建設成功，但沒有一派人相信在全國不工業化以前，社會主義就可成功。共產黨也覺得，假若資本主義已被推翻的國家，其工人的生活程度，還不及那些資產階級正在吸取工人血肉的國家的工人的生活程度，那便配不上宣傳世界革命之福音。所以五年計劃，

便是實行全國工業化，建立真正社會主義制度基礎，確立世界革命穩固根據的一種大計劃。因為這個原故，五年計劃差不多帶了一種神祕的意味，黨部不管人民的意志如何，以及巨大投資所引起的痛苦如何，決意要完成此種計劃。

但五年計劃不過是建設新制度，創造新文化大計劃的一個步驟。此外還有一種十五年計劃不過還不曾正式確定。但五年計劃完成之時，政府總希望蘇維埃經濟制度可以使工人生活的標準，與歐洲工人生活標準相等。

關於五年計劃，蘇俄官方已有三冊書出版，其第二卷分兩部出版，三卷共有一千六百餘頁。此外，國家各經濟部門，也各有其五年計劃。在我們有限的篇幅內，對於這樣大事業，當然無法作一種相當的說明。不過有些統計，可以使我們大致明瞭計劃的性質。

人口 希望在五年計劃實施期間，人口可以增加百分之二一·八。據說這個數目，就是沒有計劃，也會實現，因為論到俄國人民的生殖力，似乎可有此數。所以這個估計，可以沒有什麼變化。至若其他數目，則有一種最低數與最高數，有了這種限度，可以使計劃有相當

伸縮性。但爲節省篇幅起見，以後只列最高數。照五年計劃，城市人口要增加百分之二四·四，鄉村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九。僱用工人數目增加百分之三八·九，這不但反映人口的增加，也反映國家農場的增加。

工業 全部工業富源，要增加百分之八十二，新投資增加百分之二二·八，國家收入增加百分之一〇·三。電氣比第一年增加百分之四二·五（資本），至若電力產物增加百分之三三·六。工業資本增加百分之二二·一，而工業全部生產品增加百分之一三·六。

國家從工業方面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三一·六，至百分之三四·二。每年投資於工業上的總額，增加百分之二三·七至百分之二六·二。生產工具的出產，增加總生產量百分之四〇·三至四七·八，消費品的生產減少百分之五九·七至五二·二。

煤的生產量，比戰前增加百分之二五·九，石油增百分之二三·三，泥炭百分之一〇〇〇，生鐵二三八·一，農業機器百分之七四三·三，過磷酸鹽百分之一七八五，至若消費品的生產上，棉紗增加百分之二二·八，糖百分之二〇·一，厚底鞋百分之二六

七·九。

至若一切工業的全部生產，要從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二千八百三十盧布，到一九三三——三三年，要增加四千三百二十萬盧布。所以在五年計劃中，全部生產的價值，每年增加兩倍以上。

農業 農業方面所計劃的增加數，並不如工業方面那樣可驚。資本財源準備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全部生產增加百分之五十五。不過市場生產品，要增加百分之一〇五。穀類生產上的社會化部分，要增加百分之六五二·四。這個數目，包括國家農場和集團農場在內。集團農場的全部生產量，增加百分之一〇三〇·〇。

耕地面積總數，要由一九一三年的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九·一，增加到戰前的百分之一二一，不過穀類耕地面積，只增加百分之一〇八·五，而棉花、蔗等，則增加百分之二一四·五。耕牛總數增加到一九一三年夏季總數之百分之一三三·七。穀類生產量要增加到戰前的百分之一二九·五，棉花百分之二五六·四，蔗百分之一三六·五，甘蔗百分之

一七九·八。農業生產品的總價值，若以戰前的價格計算，要增加到戰前生產價值的百分之一六一·九。

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在五年計劃中，要增加百分之一四八，工業體力勞動合作社社員，增加百分之三二四，城市消費合作社社員增加百分之二二九，鄉村增加百分之二五四。至若在合作機關中服務人數的百分比，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不過百分之三·二，到一九三二——三三年要增加百分之一四·四。全聯合作社所有的資產，要由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八，增到一九三二——三三年的百分之九·三。

運輸 運輸的總資產，要增加百分之八九，而其中鐵路的總資產，就要增加百分之六七。五年計劃最末一年投資的總額，比較施行五年計劃前一年在運輸方面，要增加百分之三九〇，而鐵道一部分，就增加百分之三〇七。

建築 建築（農民的建築不在內）增加百分之三八二。

預算 國家預算要增加百分之一〇〇。行政費增加百分之四一，社會文化機關的費

用，增加百分之一四五。

價格水準 國家工業生產品的價格，在五年計劃之末，應該只有實施五年計劃前一年的價格之百分之七六。至若其他生產上所用物品的價格，比一九二七——二八年的價格水準，增加百分之七〇。一、消耗品增加百分之八一。七、農業生產品的批發價格，要比實施五年計劃前一年的價格，降低到百分之九六，工業品降低到百分之七七。農產品的零售價格，降低到百分之七九。四、工業品降低百分之七七。一、生產費降低到百分之五八。七。

勞動 勞動生產力要增加百分之一一〇。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百個工業工人中，應有四。一。三個是技術的工人。六個專家。六個工程師；到一九三二——三三年，一百個工人中，應有六。二個是技術的工人。一。六專家。一。三個工程師。

工作時間指數，若與戰前的工作時間相比，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應降低到百分之七七，一九三二——三三年降低到百分七〇。五。實得工資指數，若與戰前相較，一九二七

——二八年，應升到百分之二二·五，一九三二——三三年升到百分之二〇八·九。

文化 識字人數，在城市中，若就八歲以上的人口而論，應由百分之七八·五，升到百分之八六·七，而在鄉村方面，則由百分之四八·三，升到百分之七四·六。因為在理論上，城市中所有學齡兒童都已就學，所以學童數無可再增。但在鄉村則不然，其數應由百分之七九·三，升到百分之九二·四。

生活狀況 城市中每個人居住的面積，平均要由五·七〇平方米突，增加到六·三〇平方米突，但在工業工人，則由五·六〇增到七·三〇，至若城市人口的食物，每人的消費，則有如下變遷：麵包的消費如舊，肉的消費增加百分之二七·七，雞蛋百分之七二·〇，牛乳百分之二七·七。至若鄉村人民，麵包消費量要增加百分之五·七，由百分之一六·七，雞蛋百分之四五·二，牛乳百分之二四·七。

工人預算的編造變遷如下：收入用於工業品者，由百分之三四·二，減至百分之三二·五，用於農產品者，由百分之四三·二，減至百分之三九，用於居住者，由百分之八·七，增

至百分之九·五，至若用於社會文化的需要方面者，則由百分之五·二，增至百分之八·二，其他雜項用途及儲蓄，則由百分之八·六，增至百分之一〇·八。

五年計劃實施後第一年的結果，現在已經知道。那麼所得的材料，是否證明這種計劃可以實現呢？我們可以把工業部分的結果考察一下。大規模工業生產力的增加，據計劃說，一九二七——二八年，應增加百分之二一·四。而實際結果，據蘇維埃統計家說，却增加百分之二三·四。生產工具的增加，照計劃是百分之二五·三，而實際是二六·二。消費品的生產，本擬增加百分之一八·六，而實際却為百分之二一。不過有些重要工業並不會達到原來的計劃。煤的生產本擬增加百分之一六·一，但實際只有一二·五。生鐵本是二四·三，而實際只是二二·五。鋼鐵本擬增加百分之一八·四，而實際只一三·五。過磷酸鹽本擬增加百分之七·四，實際只有百分之二·一。棉紗本擬數目為百分之一〇·七，實際只有百分之九·一。皮鞋本擬增加百分之八二·六，而實際只百分之六六·五。

工業上的資本建設，據不完全的統計說，比計畫所擬數較大。工業上的資本金，比前一

年增加百分之一八·七，比計畫增加百分之一弱。

生產品的品質，甚至比前一年最低的標準還要不如。大凡消費品及生產工具，都是這樣。工業品的生產費，本擬降低百分之九，但實際只降低百分之四。

農業發展的結果，也並不很好。關於耕地面積的增加，只達到原來計畫的百分之九七。四、一九二九年穀類的收穫量，雖有原來計畫的百分之一〇三，但這是用最苛刻的聚斂方法，使農民手中一顆穀米都不得存留。但是集團化的農業生產品，其進行的速度，又出人意料之外，超過計畫所擬的數目。

國家農場的耕地面積，一九二九年春增加百分之二七·五，而計畫上只擬增加百分之七·一。集團農場耕地面積，則增加百分之二〇七·一，而計畫數只百分之九一·四。二者的穀類收穫量，為百分之二·六至百分之五·六的增加，而計畫則為百分之四·九。

至若工資，在五年計畫的第一年已增加百分之五·二。表面上工資雖然增加了，但因為一九二八及一九二九年間的歉收，故只好採用口糧制的辦法，因此工資實際是降低的。

不過官方仍說已增加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量，本擬增加百分之十七，但實際只增加百分之一五·一，這也是實得工資不能增加的原因。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失業人數的增加，其速度比所計劃的還大。不過，到了第二年上半年，失業人數已開始減少，工人數的增加，其速度較計劃的速度更快，這大半是因為城市生活較優，很多人向城市移動之結果。

照五年計劃，在五年內，國家銀行的準備金（由貴金屬的所和穩定的外幣所構成）得增加到五億盧布，但第一年實施結果，實際增加不過九千萬盧布。同時，流出國外者，其數却大於原來的計劃。至若實際通用的貨幣，約增加百分之三十四。鈔票發行額對於準備金，始終保持百分之二五的法定比例。當錢幣發行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時，國民收入只增加百分之二一·四。再者，這種增加數，實際要大打折扣，因為牠並沒有表示出農業生產的降低，其增加乃由於抬高物價水準所致。在五年計劃中，國家收入的增加率，乃是決定貨幣發行的一種基本原素。所以即使承認準備金缺乏不一定是貨幣膨脹的明證，但貨幣膨脹實更

有他基本的原素。

在不留心的觀察者，總以為五年計劃第一年的結果很好。就工業方面而論，這種計劃，確已成功。可是，即使撇開品質的低劣不論，我們也不能說，工業的成功，就可以保證將來也有增進的希望。這種說法，並不是故意看輕五年計劃成功的價值。即使把小工業包括在內，平均數內，我們也只能發見那生產的增加，比前年超過了百分之十五或十六。這種速度，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數倍。但有幾點，我們應該注意。第一，煤、鐵、鋼的生產量，已如上面所說，是比計劃數目更少。第二，耕地的擴充，也不如所希望的大。第三，技術農產的收成，也大失所望。而這幾種原素，都是國民經濟的基本。至若穀類收成，由第一年的成績，也可見最初兩年沒有什麼餘穀可以輸出。所以，必要的資本設備及原料的輸入，便感覺困難。

不過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已決定要大大的增加數量。五年計劃原有「參照數字」(Central Signes)的辦法，以便每年增減原來計劃所擬的數字。例如照計劃，第二年大規模工業的生產力，應增加百分之二一·五，而參照數字則加以修正，要增加三二。又如生產

費要降低百分之六·五，但因為第一年不能如數降低，所以參照數字決定降低百分之一。又如國家工業上的投資，則要增加到三十四萬二千三百萬盧布。本來照五年計劃，這個數目，要在第五年才能實現。至若勞動生產力，參照數字也加上百分之二十五。工業資本建設，本擬增加去年的百分之五十二，但參照數字則要增加百分之九十一。

至若總預算，本來計劃是八十六萬三千四百萬盧布，而參照數字則增加到一百一十二萬六千萬盧布。

集團農場的耕地面積第二年的增加數目，差不多有第五年的兩倍，這是參照數字所修正的。

機關拖車及農業機器的生產與購買的增加數，照參照數字計算，也大過原來的計劃。關於全部耕地面積增加的估計，原來計劃擬增加到百分之八·三。而增加方面尤其可以注意的，就是耕地面積及技術農業品（尤其是棉花）的增加。照原來計劃，棉花增加的數目，在五年中為百分之四四。可是後來單是第二年，就增加百分之四八·七。

因爲採用參照數字之故，使計劃發生大變動，其結果，使計劃經濟的問題，越發複雜。本來五年計劃有一種最低限度及最高限度的規定，使國家經濟在這個範圍內活動。可是參照數字所規定的數目，往往超過計劃所規定的最高限度。此外，行政上對於計劃也常有改變。因此，計劃的優點，大部分失去。而且有時很不容易將材料加以比較，因爲這些材料有時是從官方每年的參照數字得來，有時也從行政機關所規定的估計得來，而行政機關中，計劃又常有變動。

爲什麼一九二九——三〇年的計劃經濟，要有這樣大的變動呢？其原因很是複雜。因爲政府決定採用不間斷的星期制，星期及一切假日，都變作工作日，俾資本設備得盡其最大的效用，以增加生產。其次，由第一年的生產結果，認爲五年計劃對於生產可能性的估量實嫌過低，而參照數字即修正這種過低的估量。但最重要的，還是農業集團化的影響，在一九二九年期間，農業集團化的運動，加速地進行着，集團農場的數目及耕地面積，較諸原來計劃增加若干倍。其結果，當然需要較多的化學肥料、機關拖車及其他農業機器。因此，鋼鐵

的產量，也不得不增加，其次，煤及其他生產工具都不增加。但因為U.S.S.R的工業，不能充分出產機關拖車，故不得不向外購買，因此，工業品及農業品的出口，便不得不儘量增加，俾得付輸入品的貨價。所以，全部計劃便不得不根本修正，而生產制度及人民方面的緊張，當然也大為增加了。

現在第二年上半年上的實施結果，已經發表，由這些結果，可知計劃機關在新的參照數字上，實未免持之過激，所得結果，較諸前年固屬可驚，但並不見得已達到了參照數字。其詳細情形，因限於篇幅，從略不論。

總之，最初兩年的結果，都顯見五年計劃是有實現可能的。但縱令客觀方面還有種種的困難，講到那客觀的困難，就是缺乏外國的信用借款。因為要計劃成功，必需有大批的資本設備及數千外國工程師及技術。但長期信用借款，却無法得到。其結果，便不得不採用同時付款制度 (Pay as You Go)，並且每年要輸出大批貨物，以便獲得必需的國外貨幣，因此，食料、織物及其他消費品，本是國內所必要的，也不得不向外輸出。所以五年計劃的担負，

覺得是很難堪的。

另外一個困難，便是原料的缺乏。棉、毛、皮革、鐵、煤，差不多一切原料，都常常感覺缺乏。只有石油和材木出產很多，足夠向外輸出。爲解決這種困難起見，五年計劃準備將重工業的資本建設大大增加，並準備農業集團化。自一九三〇年春耕地面積增加，土耳其斯坦實行灌溉大計劃後，棉花的缺乏已逐漸減少。至若煤、鐵、鋼鐵等的產量，也逐漸增加。

其次便是運輸的困難，這種困難到第二年終了時即開始發生。現在的情形，是工業的生產品增多，而沒有充分的鐵路設備。再則，大部分投資，都用在未開發的地方建築鐵路，而已有鐵路，則不加以改進。所以在第二年中，就建築西土鐵路（西伯里亞、土耳其）。

因爲要實施這種資本建設的大計劃，不得不需要極多的資金，所以，貨幣及鈔票的發行便過多，而貨幣制度的穩定，似乎又在發生危險了。

其次，訓練充分的工程師和技師以供新工業發展的應用，也是一個大問題。現在雖然設立短期訓練學校，但能否養成適於將來的工程師和技師，還是問題。現在雖有大批的人

員養成，但其訓練，實在不及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材。而最重要的障礙，就是這些學校要把舊知識階級分子排除，努力增加工人階級的子孫，甚至他們不能接受這類教育，也要把他們強迫納入工科學校中。

此外，對於五年計劃成功的最大障礙，就是負責者每易情感用事，不作真實的計劃。計劃專家若對於估算，過度保守，或國家某一經濟部門，因了他的計劃，受了限制時，那麼這些不幸的計劃專家，便被當局認為破壞經濟活動，處以反革命之罪。有一個在國家設計委員會服務的人對於鐵生產的估計，就被認為太保守，後來他在第十六次黨大會上解釋生產的困難，出席者大家就罵他破壞經濟活動。有幾個計劃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濟家，就受到政治警察的不好待遇，所以他們的同事，便決定務必把自己的估計，不要再犯保守主義的過失，其結果，一切估計都提高，而真正的計劃反不注重。這種運動，即所謂「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共產黨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在著者的意思，以為乃是因為政府當局能直接支配國

家經濟，解決經濟的困難，並不由於計劃的效果所致。計劃及參照數字所列的估計，並不是一種限度，實在是一種目標，以為努力的趨向。假若負責計劃的專家，在草擬計劃時，能有相當自由，則計劃的原素，也許可以較為重要。但如上所述，在經濟學上有真實本領的人，因為怕被治以反革命之罪，遂致都不能應用他們最好的知識。現在舊派的經濟學家漸被排斥，而代以由共產黨所提拔的工人（*Vydvizhenitsy*）這些人只是富於感情，真所謂十足的黨員，但顯然不是有訓練的經濟學專家。

所以現在可以明瞭，第一年生產力雖有大量的增加，但不能認為將來更有擴張可能，前文也曾說過，內戰後數年中生產力的絕對增加，雖則不多，但在統計上，其百分比已是大。能在第一年內維持同樣的增加速度，也確實不容易。但在現狀下盼望增加，在共產黨差不多成了瘋狂，這對於原來計劃所立目標的成功可能，却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所以現在過分樂觀的參照數字，必須加以修正，應該仍回到原來計劃所規定的數字。這樣，五年計劃才有成功的希望。

生產力繼續的增加，全賴食物供給的改進。在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〇年期間，勞動的生產力就被糧食不足所限制。就是五年計劃最末一年，生活標準的增加，也不見得十分顯著。自實行農業集團化及消滅富農階級以來，農民對於家畜大批殺戮，再則，在社會化農業之下，副產食料不易生產，這兩種困難，就是到五年計劃之末，恐怕也難於完全取消。不過，除非有飢荒或戰事中途發生，實施五年計劃的結果，對於五年計劃期間的生活標準，確可以有一種很顯著的改進。

第十三章 俄國共產主義與人類幸福

在經濟的和社會的意義上，蘇俄對於人類全部經驗，有任何貢獻嗎？人人都知道，在歷史上，絕沒有一種經濟社會實驗，能和牠相比擬的。就重要性而論，法國革命倒可以和俄國革命相比，但法國革命的結果，並不會創立新的未經試驗的經濟制度。俄國革命是想推翻宇宙，另外新創一種新天地，而這種天地，並不模倣以前的任何模型。人人都知道，俄國革命，

犧牲了不少的生命，受了多少苦。可是現在血仍然流着，犧牲和痛苦仍然繼續着。那麼，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的試驗所獲得的結果，可以補償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嗎？

自經過一九二一年的大飢饉，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人人都說共產主義是失敗了，俄國也許仍然要回到西歐的那種資本主義制度。依據這種解釋，俄國不過是異地異時的法國革命罷了。這種解釋是很對的，因為新經濟政策時代對於農民的讓步，即表示那種維持歐洲保守資本主義的地主制度隱然在發展着。私人貿易的恢復，對於外國資本家的讓步，以所謂金本位的基礎上謀貨幣的穩固，凡此種種，都顯見俄國難免要回到資本主義。這種關於社會主義失敗的議論，更因托羅斯基關於俄國熱月（Thermidor）法國共和政曆之第十一月）的題跋而得到根據。不論過去的事情如何，托羅斯基早就預料到他要被斯大林打敗的，而他的失敗，即熱月派反動的勝利。

過去的事實，雖表明蘇維埃經濟社會制度，有變為『準資本主義』形式的可能。但自從私有財產制度完全破壞，土地國有，私人貿易消滅，富農階級消滅後，完全的共產主義已

經快要實現了，共產黨人心中，都相信那種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世界革命，必將實現。世界革命何日實現，黨部中雖然還有討論，但大家都相信世界革命終久會實現的。現在黨中一致相信世界革命的時期必不遠。

名義是爲現下人的幸福而實際也許只有利於俄國人民的子孫的；要是事態的進行照着常規而且社會主義的實驗就在新政策時期的中途宣告停頓的話。在將來十年中，即使共產黨的大計劃實現，俄國人民所得的利益，仍不及其革命以來所受的痛苦。

現在俄國的生活情況，比大飢饉及新經濟政策時代後的任何時代還要壞。有數百萬人民，不能得充分的食物，有些地方，差不多近乎飢饉。但蘇維埃政府雖遇見這種情形，仍毫不顧及，只圖保障大城市工人的生活標準，而犧牲其他一切人民的利益。莫斯科一切用品的供給，較蘇聯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優。有很長時間，莫斯科工人的麵包口糧較其他城市多。農民只領得最低限度的維持生活品，可是在許多情形中，農民實際上並沒有穀米或麵粉。國中假若有一個地方收成不好，農民只得自行遷移。因爲黨部決定，革命決不因爲有少

數農民的受餓而作罷。

因為食物供給這樣不足，所以時有不滿意的報告從俄國發出。有一個農民逃到芬蘭境界上，報告他所在的區域的飢荒情形。報紙也報告西伯利亞的災荒形容得極其刻薄，說是連老鼠也都游過烏蘇里河，跑到中國境內。一九二五年或二六年到過俄國考察的人，現在重來俄國，很為驚訝，說現在的食物情形，比從前他們來時還要壞。蘇維埃的統制，似乎是要崩壞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國工程師和資本家去到俄國的，都看見新的大工廠正在建設着。他們報告說，蘇俄正在向前猛進，致使資本主義世界莫知所措。這兩種報告，當然都不能十分確實。

很奇怪的事，就是兩種報告，大體上都是對的。因為在偏僻地方，確實是近乎飢荒的狀態。除了麵包而外，什麼東西都感缺乏。其原因，就在過去數年內農業的情況不良，再則政府決定儘早實行全國工業化之故。但這些情形，不能認為蘇維埃經濟制度已經失敗。反之，工

業方面的成功，也是值得注意的。

現在工人的生活狀況，在衣食住三方面，確實比俄皇時代要壞一些。不過我們若想到工作時間較短，假期，工人俱樂部，社會保險，及其他種種利益，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就是在現在，勞動者也由革命獲得了相當利益。至若農民個人的生活狀況，顯然比以前壞。尤其是舊的知識階級，機關工作人員，學校教師，一般『白領』工作者為更甚。若把俄皇時代平均的生活程度和現在的生活程度相比較，則前者確較好。因為由『掠奪階級』得來的利益，並未完全給與掠奪的那些人。

不過現在生活程度之所以這樣低，大半也因為黨決定抬高生活於將來之故。只要再過五年，民衆就可知道革命究竟有利還是有害。假若人民能在這個時期內繼續忍受一些痛苦，則將來農業的集團化和國家的工業化，必可使生活程度提高。

將來蘇俄的生活程度，也許永遠達不到比較豐富的階段，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所得到的一樣。並且，即使蘇維埃制度的生產機關，能使這種理想實現，並普及於大

衆，這種生活程度也是違反共產主義精神的。在蘇維埃統治之下，絕對沒有用廣告來刺激人類欲望這回事，也不該有一種欲望招致有閒階級，去創造一種不必要的的生活程度，所以蘇維埃政府不久也許就要規定最高生活程度的經濟基礎。簡單的食物，公共的住宅，無產階級的俱樂部，簡易的衣服，摩托的運輸，短的勞動時間，在國家娛樂機關中的消遣，都可用來代表共產黨努力的最後目標。這樣一種目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大部分農民，甚至上級工作人員所能接受的。不過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報酬微薄無智識的人民，當然極爲歡迎。

假若說蘇維埃制度的生產可能性較大，那我們必得承認，在這種制度的心理方面，成績實在是使人掃興。初次創造理想社會制度的哲學家，都把這種制度當作一種烏托邦，在這種制度之下，人類並不是產生更多的東西，而是過一種理想的生活。人類生活中的那種惡魔、卑陋、小氣、貪鄙、忌妒等，都一概消滅。俄國的共產黨，雖然承認馬克思（他是輕視烏托邦主義者）是他們精神之父，但世界上還有許多共產黨，以爲烏托邦已經在俄國實現了。

但我們必得承認，蘇俄到烏托邦的路程，比資本主義國家到烏托邦的路程遠得多哩。在蘇俄中，痛苦並未減少，却反而增加。共產主義所給與俄國的，並不是和平，而是寶劍。是用權力的爭鬥來代替財富的爭鬥。在國家託辣斯及組合之內，在黨部之內，權力的爭鬥，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爭鬥更甚。今天正是統派的黨員，明天也許發覺他的正統理論却被一位黨員攻擊。蘇俄的一切機關，都應用肅清的組織來控制猜忌與嫉妬。

那麼，蘇俄的新生活，會使人與人之間發生了友愛的關係嗎？在重要地位的人彼此權力的爭鬥，我們已經說過了。再，我們也不能說，上屬對於屬下的態度，較諸資本主義制度下者，有任何改進。工人們誠然成了一種優秀的階級，他們的待遇，比其他任何階級都好。但公務人員、書記，以及其他『白領』的工作者，不過比那被剝奪階級稍好一點。至若服務在共產制度下的舊日知識階級，也處於同樣的情形。在政治經濟機關服務的人，常常被肅清機關及政治警察清理出來。他們被以前的無產階級命令着，這些無產階級者，現在是有了地位，覺得他們很重要了。白領的工作人員，雖也是同業公會的會員，但他們的同業組織毫無

權力。他們受到種種的挑剔。他們是無產階級國家中的新無產階級。

沒有一個人能說，工業工人中已有友愛的精神。稱呼的普通方式所謂同志者，並無實在的意義。莫斯科擁擠的電車中，自然不能使彼此發生友誼的關係。但興奮和惡感的空氣，確使旁觀者不得不為之驚異。我們很少能看見一點笑容，或聽見一點笑聲。這其原因，一部分當然是由於食物缺乏，使蘇聯現在的生活感覺很苦。但緊張及抑制的忿怒，似乎還有其他原因。

人民思想精神的不自由，在歷史上再沒有更甚於蘇俄的了。不但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完全沒有。就是單不依照官定的行為去做，在黨部也認為不滿意。人們必須要公開否認他們的真實思想。單接受一些信仰和原則，就可以保障生命的安全，這在正統派原則之內事情絕沒有這樣簡單。當斯大林派攻擊托羅斯基左派時，那時最要的一件事論，就是須輕視富農的危險性，且對於富農持一種調和的政策。可是兩年以後，富農又被斯大林認為根本的危險，必須根本消滅。著者曾參加過一個黨部肅清會，有一個女黨員

被肅清着，大家要她解釋布哈林之說何以稱爲異端，繼續不斷的質問，差不多使那女黨員變爲瘋狂，最後只得大聲地叫『有一次，曾有人告訴我布哈林的學說是極對的。但現在又有人告訴我，這些學說全錯了。我又如何知道呢？』

大凡布哈林、托木斯基、里果夫的政策，都被斯大林認爲異端，強迫他們在大眾前而悔過。但是這還不足。擁護斯大林的人，還要他們更加自己卑賤。

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在蘇俄，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不過是句話罷了，大家並沒有了解其重要。大多數工人並不覺得他們的自由已被剝奪。一個人只要不想跳出勞工羣衆就不覺得他們的自由已被限制。去年食物缺乏時，城市無產階級倒表示極端不滿，可是他們的自由受限制，他們不能得到烏托邦的心境，他們也不感覺不滿。

所以蘇維埃統制乃係建立於權力和恐怖之上。但俄皇的統制，也是建立在這樣基礎上。再則，不能隱晦的，就是蘇俄現在革命仍然繼續進行中。關於土地國有及農業集團化，黨與農民時時發生衝突，似即證明托羅斯基的永久革命論。這種衝突之後，常有農民的暴動，

數千人被政治警察處以死刑，即證明革命的爭鬥，仍在繼續進行，一直到現在。

在共產黨的意思，以為這種衝突，乃是過渡期間必有的特徵，只要全世界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真正的蘇維埃國家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專政，那麼這種現象就會消滅。

共產黨說，為維持革命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性質，故不得不有現在這種暴力政策。假若沒有政治警察的活動，則從前的資產階級，得着外國資本家的協助，必將舊日的統治，重新建立起來。對於經濟異端作不斷的攻擊，就在使革命內部不致腐化。只有用黨部領袖的殘忍和反對調和的精神，才能使革命不致變為資產階級的革命。

共產黨說，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即可證明非用武力政策，則社會主義不能成功。在事實上，這兩種黨確是受了小資產階級觀念的毒，所以共產黨人的批評，我們不能不認為很對。試看社會黨在英國和德國的成績，確使我們不能不疑惑：假若沒有武力，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能夠成功，能夠維持。

反之，對於近代社會經濟生活上最困難的問題，俄羅斯共產黨也首先設法解決，至少

他們會有勇氣，對於社會經濟問題，例如農業問題，失業問題，婦女在近代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問題，予以根本的解決。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確又有了相當進步。可是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並沒有什麼大貢獻。

假若我們承認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制度是可以得到的，那麼，我們對於俄國共產黨應該予以充分的信任，因為共產黨已經保存了革命的動性，而且創造了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即使我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但蘇維埃制度對於人類知識經驗的貢獻，也無論如何不能否認。現在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的國家確能存在，而且能實施其生存所必需的機能。從前有人否認社會主義國家完全不能進行，但現在已證明這種否認是不能成立了。至若社會主義的統制和資本主義的統制兩相比較，哪一項較好，則是另一問題。

俄國革命使用武力，并且經過了連年的內戰，我們確信其有相當的根據。不過自十月革命以來，於今已十有三年。武力仍然繼續着。在外國的觀察者眼光中，武力彷彿是和共產主義不能分離的東西。不但在鄉村中，有階級爭鬥鼓吹着。我們無法相信「消滅富農階級

一就可以使武力政策完結。於今雖然過了這十多年，但是從前資產階級及其他特權階級的子孫，仍然不斷地被處死刑。新的異端，不斷地在黨員中發見。掠奪階級的最後餘孽雖則已被消滅了，而被處死刑者仍有人在。所以，戰鬥的忿恨，差不多成了俄國共產黨一種最顯著的心理特徵。

蘇維埃制度還有一種特徵，就是個人經濟爭鬥的緊張，大為減少。雖然權力的爭鬥，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較為強烈，但是大多數民衆並不覺得有保障或改進其個人經濟地位之必要，也不想升到較高的地位，儲蓄金錢，或增加賺錢的本事。個人若發洩了小資產階級的特性，爲自己家庭造一種優裕的生活，是爲共產主義所極端痛恨的。個人若要改進他的經濟地位，必待他所屬的階級改進了經濟地位以後。工程師和專家要隨時有準備，能立刻從這個工廠掉到別個工廠，以免發生把持的弊病，同時，政府也極力防止這階級的收入，不致過高，以免這階級的人獲得一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標準。所以沒有人能蓋一所有永久性的房子，個人也不能在這種房子上花費許多時間和金錢。所以，在蘇俄，社會的競爭非常少。

再則，因為前途非常不確定（就是在黨國要人也是這樣）所以更不能置造一種小資產階級式樣的房產。況且家庭的解散，也使個人不再想準備經濟的保障以備將來。在蘇聯中，不但積產不可能，就是整個的生活態度，在這種新制度下，也使人不曾發生財產的欲望了。蘇俄的社會保險制度，雖然尚未十分發達，但也是減少經濟爭鬥緊張的一個要法。其另一原因，便是這種制度正在擴張，大凡有助於擴張的，無不盡力利用。再則，貨幣跌價的經驗，也使人民不敢儲蓄，不再預想將來。但是使個人不注意自己經濟的成功，而注意於五年計劃的成功，才是共產主義的最大的勝利。

在外國的觀察者，必覺得蘇聯人民生活鬧到這個田地已成了一種無味的東西。但共產黨說，這種說法純是資產階級的一種偏見。經濟的爭鬥，固然可以使成功者得到生活的樂趣，但大多數失敗者，不惟毫無報償，而且感受經濟的恐慌，不能應付日常的需要。

此外，蘇維埃制度對於人類幸福還有一種貢獻，就是創造一種生活制度，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中那種用金錢來做測量標準的生活制度。權力的爭鬥固然代替了金錢的爭鬥，

但這種事實，並不就把蘇維埃制度中這種原素的價值完全破壞。在蘇俄中，人們並不用他們全部的時間在從事賺錢的活動，以圖達到有錢階級的生活標準。人們的服務，並不在圖得金錢的報酬。零售商店中的國家僱員，並不十分關心顧客是否買一件東西。所以他對於顧客，也不諂媚。他對顧客並不稱『先生，』也不把顧客看做高一等的人。這種情形，由顧客方面看來，當然是不大好的，但精神的進步無論如何不能否認。酒館的侍者，旅店的僱員及其他做人事工作的服務員，都失去了資本主義國家中這類人員所特有的那種態度。在蘇俄，他們固仍然接受小費，但俄國人很少給他們。外國人在習慣上都給小費的，但他並不能因此就買得侍者的歡心。輪船上有些茶房固仍然對外國人稱『先生，』但這事並不常有。有時，甚至外國人給他們小費，也被他們拒絕。在蘇維埃生活制度中，小費這種東西差不多完全消滅了。

在蘇聯中，沒有那一個階級，因為有錢之故，立於特殊的地位。沒有本事的人，就是有了錢，也不能得到勢力。諂媚的人，是不會得勢的。在蘇聯，也不用錢來做一切價值的標準，勢力

已經由有錢的人轉移到共產黨中那一些統治領袖的身上了。

我們向來一說到蘇俄時，都以為蘇維埃經濟制度是能成功的，因為共產主義本來就好，或說蘇維埃經濟制度一定失敗，因為共產主義本來就壞的。但人們就不知道，即使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代表人類進步上的一重要階級，而這種經濟制度，在技術方面也許不能成功。再則，即使經濟制度已經成功，而同時共產主義在蘇俄中所實現的主觀價值，也許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實現者還要低一些。所以人們向來對於蘇維埃制度的經濟價值，都是從目的的觀點來看。好的一定要存在，壞的一定要消滅。總之，事實如何，最後終歸會證實的。至少這樣看蘇聯所發生的種種事件，是一種適當的態度。但就現在而論，我們應該承認，蘇俄現在的文明，距離哲學家的烏托邦還遠，但仍有經濟成功的可能，在將來，對於資本主義也是一種威嚇。

那麼，俄國全體人民對於蘇維埃的統制的態度怎樣呢？已經得到大多數民衆的擁護嗎？或只得到少數共產黨員的擁護呢？蘇俄的人口共有一億五千萬，而共產黨員不過兩百

萬，但蘇維埃統治仍得到黨外多數人的擁護。我們應該知道，在蘇聯，入黨很不容易。近年來，入黨的限制已經放鬆，可是仍不失為一種極嚴密的組織。

過去數年內，雖然食物大感缺乏，但是許多工人對於蘇維埃政府都積極擁護。其餘多數工人至少都在消極的服從。這種情形自然應該如是，因為蘇維埃政府本來就優待無產階級。工人們知道，若有何種變化，只有使他們的情形變得更壞。

不過就是在城市工人中間，也有一些人表示不滿。一九三〇年三月初，著者在莫斯科，有一晚陪着兩個外國工程師回家，我們三人都穿着皮外套，所以外表的衣服，比大多數俄國人都好。當時有一個衣服破舊的男子走過，那男子顯然才喝過酒，他說：『你們這些黨人！你們的時候快到了！我們要把你們碎尸萬斷！』因為在無產階級眼光中大凡穿着好的人，一定是黨的領袖。在兩三年前，他一定要罵我們是新興資產階級，但現在這種階級已經消滅了，所以他的忿怒便向着比他稍好的一階級而發。

至若農民方面，現在對於蘇維埃的統治也極其痛恨。因為他們的穀物，被政府收去，而

土地也被強迫收歸國有也許大多數最窮的農民，才對政府表示擁護，而其原因，也和城市無產階級擁護政府一樣，因為他們享有特權。現在農民中積極擁護政府的，大約有百分之二十。

假若事情憑自由選舉來決定，著者相信現在大多數農民，必贊成回到舊日俄皇時代，而不贊成現在的統治。但這種事情，顯然不能實現，而且也不是一種正當的說法。在這個時期，實足以決斷蘇維埃政府的命運。現在生活的狀況，比兩年以前還壞，而今後兩年，也更壞。再則反對現政府的人，大多數都來自農間。現在的農民，被民府連根拔起而移植在一種新奇的土地上。他當然覺得這種辦法痛苦。在十年之內，農民也許才能忘却現在的憂愁，對於集團農業的新制度表示擁護。再則，也沒有黨或統治團體，會應許農民自由決定他所喜歡的政治經濟組織，因為他們知道農民就只贊同原始鄉村組織及無政治的政府。

蘇維埃統治的將來，全決定於共產黨是否誤算了俄國人民的破壞期。只有具有亞細亞民族性格的那種人民，才能忍受過去十六年的經驗。在過去十六年中，俄國總是在一種

戰時的情狀下，只在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二六年，稍得休息。不但物質的生活環境很壞，就是心理的緊張也是極大。任何一個人，不論黨員或非黨員，只要其地位稍顯著一點，其生活始終就在祕密警察監視之下。警察在任何階級中都可發見，所以人們簡直不敢互相信任。新舊知識階級的分，沒有那個能希望過一天安靜的生活。生活的法門就是爭鬥，地位比較顯著的人，一定要忍耐得住懷疑或輕視。生活是極其艱難，極不自由，所以人們一走出蘇維埃的境界，便覺得已從黑暗走到光明。

此外，關於黨務人員工作的極度緊張，也不得不考慮一下。大凡黨部的負責工作人員，一定要知道他們是在不斷地從事爭鬥。例如農業方面，在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〇年期間，最初的運動便是要吸取農民的穀物，這種運動尙未完結，強迫農民加入集團農場的運動又已開始，而即刻又要勸誘農民把耕作動物歸還集團農場。其次便是收集穀種以備春耕的運動。同時，斯太林又有論文發表，不贊成集團化運動採用強迫的方法，不久農民又開始從集團農場逃出。因此又不得不努力勸誘他們回來。在這種紛亂當中，春耕運動又待開始。

而同時，黨中又發生派別的爭鬥。在工業方面，黨部工作人員，因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已有大部分成功，又開始計劃一種擴大的第二年計劃。及後發覺擴大計劃不能實現，政府仍敢負責者繼續努力。

一九三〇年初，居住在俄國的外國人，大多數都和著者一樣意見，覺得破壞期是正在迫近了。人人都覺得向來蘊伏着的歇斯特利亞病，必得會爆發出來。假若西境有戰事發生，絕沒有人會表示驚異。到處蠢起的農民反抗，實際上確已發生。不過暫時的讓步，可以解救這種危急情形。

由這種情形，可見我們對於蘇俄，不能用西方資產階級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過去受痛苦的時間，比蘇俄長，又因為沒有一種狀況來代替現在的狀況，所以現狀始終維持着，毫無希望。蘇俄人民具有亞洲人民的耐苦的能力，所以也許能忍耐較長的時間，而黨的計劃又給人民以一種希望，說將來可以有較好的物質環境。

假若蘇維埃經濟制度能渡過現在食糧的危機，即可表明牠實具有穩定的能力。現在

的食糧情形固然極壞，但在兩年之內，必將有所改進。而農業生產量，明年也將比今年多，因到了明年，集團農場可以有較好的設備，管理及技術，也可有所改進，再則，又有一些灌溉的田可以增加生產。不過因為肉類和乳牛的缺乏，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食物的供給才能有所改進。

著者相信蘇維埃制度會使食物的危機永久存在。假若必要的話，蘇聯食料的出口，可以完全停止，甚至必要的脂肪，也可由外國輸入一兩年。但若採這種辦法，對於五年計劃的完成，當然又是很大的阻碍。共產黨對於五年計劃既極狂熱，這種極端的方法當然不會採取。

共產黨為促進世界革命起見，必使蘇聯和外國發生戰爭。只要蘇維埃的經濟制度，已經有了穩定的基礎，這種事必然發生。在未有穩定基礎以前，也許不會發生。假若不幸發生了，蘇維埃的經濟發展，必無限地向後倒退。關於這一點，黨部非常明瞭，所以現在的困難尚未解決以前，蘇聯總設法防止不和一等列強發生衝突。不過就其對滿洲的進襲而論，蘇聯

似乎並不實行『百事但求太平』的政策，所以這種偶發事情，也不得不注意到。

蘇聯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意味，我們是不能過于誇張。假若現在的危機能夠度過，則蘇聯在最近十年內，必能有一種生活標準，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中工資較少的工人生活標準相當。所以除非資本主義即時改進其販賣與分配的方法，以防止生產過多及失業的危險，並且在物質方面增高工人的生活，世界革命必將開始猛進了。

陳德安先生

四十四

蘇俄五年計劃概論

國際叢書

——五年計劃的理論與實際——

一冊 五角

關於蘇俄的五年計劃，外國出版的書，固然很多；但要一本立論公正或不帶宣傳色彩的，却不可多得。本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一）蘇俄五年計劃有何理論的根據？（二）蘇俄何以要有這五年計劃？（三）蘇俄五年計劃的內容如何？（四）蘇俄五年計劃何以會成功？（五）五年計劃成功後蘇俄的情形怎樣？著者純以客觀的態度，自理論以至實際，把整個的五年計劃，赤裸裸的介紹出來。一般人懷疑蘇俄究竟是世界樂園，還是人間地獄？讀本書對於這現在世界上的一個「祕密」——蘇俄的真相，可以瞭然。

中華書局出版

英美日產業問題

歐陽瀚存著
一冊六角

自歐戰終結，而當事各國之財用亦隨之告竭；於是英美各國無不以全力拓治生產，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經濟界發展之速，亦為並世所罕見。本書對於該三國產業之概況，發展之情形；以及改革之經過，均詳述無遺，可為研究世界經濟概況及各國戰後大勢者之參考。

蘇俄新經濟政策

顧樹森著
一厚冊二元四角

共產的蘇俄一變而行新經濟政策，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但是共產如何失敗？新經濟政策如何代興？新經濟政策內容如何？這是人人想知道的。顧樹森先生歐遊數年，最後到俄國，就考察所得，參攷各種書報，輯成此書，內容要點凡四：（一）共產政策失敗之經過，（二）對內新經濟政策，（三）對外新經濟政策，（四）合作事業之變遷及現狀。全書材料極新，敘述明白。欲知蘇俄國情，欲知共產主義之難行，欲知新經濟政策之真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 國際蘇俄經濟生活 (全一冊)

定價銀一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譯者

劉炳

蔡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雲南 瀋陽 香港 新加坡

(七三九一)



4

11

72

1

74

標商冊註

